简介

为什么现在数字劳动力很重要?

Trebor Scholz

2009年，在纽约市一所批判理论和学生行动主义历史丰富的大学新学院(the New School)举行的“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及其剥削劳动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互联网上新兴的价值获取模式?这本书就是我召集的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

今天的数字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加入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和娱乐的网站和实践越来越多地将人们作为少数寡头所有者改善经济状况的资源。互联网上的社交生活已经成为“常设储备”，成为通过越来越难以捉摸的商业监控渠道创造价值的场所。这项调查对隐私权、知识属性、青年文化和媒体素养等方面的斗争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们共同致力于理解新形式的有薪和无薪数字劳动的复杂含义。在这本出版物中，你会发现对数字劳动的一致分析是围绕传统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的延续。在探索不连续性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被描述为传统无偿工作经济的强化。

在过去的六年里，基于网络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即使是最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工作也没有工人保护。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新的劳动形式，但也是旧的剥削形式。没有最低工资或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也没有干预。数字劳工事务;在思考认知资本主义时，这种低薪、有工资的职业绝不能被忽视。

但本书的几位作者也在思考无薪劳动，即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被激活为可货币化的劳动。这一论点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与传统劳动相反，休闲的数字劳动看起来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支出，是在通信系统中成为演讲者的行为。它感觉、看起来或闻起来根本不像劳动。这种数字劳动与那些不太显眼、不为人所知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很相似,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代孕。

2011年，Facebook的估值为1000亿美元，这可能与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有关，但也与该公司在7年时间里收集的用户数据有关。人类社交的亲密形式正在为Facebook带来利润，这使得它成为一家如此昂贵的公司。Facebook将其用户数据出售给客户，这些客户大多是第三方广告商。社交网络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免费使用的，但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寡头们捕获并金融化了我们的生产性表达，带着我们的数据飞走了。作为“用户”的我们，被当作产品出售。我们隐私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心理和政治后果，为我们换来了“免费”创新服务带来的便利。所有的生活都被投入工作，不公平地利用隐性参与来获取暴利。

但是，我们真的能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基于分享创造性表达的价值生产活动吗?《哈利波特》的粉丝们制作同人小说，并将自己的创意作品免费赠送出去，以换取被拥有原创内容的公司所忽视。这种无偿劳动行为还包括“游戏改装”和提交“验证码”。把这些活动或者状态更新的更新和“点赞”看作劳动，真的有意义吗?当代许多关于生产力的讨论都以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快乐为出发点，并将其与工作和娱乐之间逐渐消失的区别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写道，要明确区分存在于游戏领域内的非生产性休闲活动和存在于工作场所领域内的生产性活动是不可能的。

作为读者，无论你站在争论的哪一边，数字劳动的话题都是在邀请你重新拾起关于隐私危险状态、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私人利用公共互联网的争论。

这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867年，当时卡尔·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完全以工人生存为目的的劳动，而后者则是用来描述任何额外的劳动时间。1966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警告说，响应式机器将加剧对工人的剥削，甚至完全取代工人。1981年，达拉斯斯迈斯提出，观众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卖给广告商的。斯迈斯写道，观众投入了无偿的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观看带有广告的节目。20年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这种非物质劳动定义为一种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早在2000年，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就研究了资本主义剥削无偿自由劳动的新形式，思考广播媒体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观众。

观众制造是数字劳动讨论中的一个突出话题，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度，当时广播开始在美国各地的郊区居民中建立共性。以前通过全国性报纸联系起来的社区开始通过广播联系起来，并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通过广播电视联系起来。也有电影院

在捕捉大众和创造共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人们正在逐渐地、但越来越多地抛弃电视机，转而通过数字网络进行交流。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外，《*数字劳动:作为游乐场和工厂的互联网*》也包含了那些对数字劳动的讨论持谨慎态度的人的声音。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等人评论说，我们可能会成为技术官僚对互联网的拜物教的受害者，这种拜物教剥夺了我们对“真正的”剥削场所——即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的充分承认。过度发达国家的数字劳动依赖于中国等国家被剥削劳工的汗水

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盗窃和沉迷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坦率地说，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阻止了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感情，也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推进破坏资本主义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仍然在农场和工厂里劳动，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贫穷的工人、无证工人和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入互联网的机会。

“数字化”并不能概括我们的全部状况。技术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技术。但是，在不被“推特革命”的谬论所迷惑的情况下，数字媒体也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是时候通过承认在线社交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转变来重新思考数字鸿沟的陈旧概念了。虽然20亿互联网用户确实是全球的少数群体，但使用手机的50亿人和他们的家庭却不是。Facebook在非洲各地的手机上都可以使用，我们应该明白，数字劳动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困境。我们的沉默并不能使我们免于数字劳动的暴政。

关于本书的组织

按照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会议的结构，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地点”，介绍了辩论中最广泛的问题。第二部分“数字化劳动的审问模式”提供了新兴数字化工作环境的例子和案例研究。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Participation)聚焦于剥削问题。第四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反思了近未来的情景，包括点对点的替代方案。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鲁·罗斯对数字技术和可货币化劳动力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发人深省的概述。他指出，b谷歌或Facebook所有者的利润是当前租金提取热潮的证据。罗斯也在考虑对赫芬顿邮报的集体诉讼。问题是，《赫芬顿邮报》是否有合同义务与为该网站创造内容的博主分享出售给AOL的战利品。

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场所的辛劳，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罗斯指出，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基本上无薪或低薪的实习中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补贴。罗斯还要求我们考虑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劳动都是无偿进行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动力享有固定工资和薪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免费劳动力，但事实证明，它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工作安排的推动者，效率很高。

在“自由劳动”一章中，蒂齐亚娜·特拉诺瓦讨论了她所谓的自由劳动，即不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无偿无偿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很明显，数字经济中新的附加值来源是用户参与。特拉诺瓦说，“1996年，在志愿者(AOL聊天室管理)的高峰期，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帮助AOL每月至少产生700万美元的收入。”

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继续了这一思路，他描述了社交网络如何将劳动的天赋商业化，不是作为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偏离平均水平的异常现象，这可以被解读为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利用。他写道，互联网之战尚未结束，但在编解码器和HTML5等关键战略和战术领域，资本正在取得胜利。技术规则的制定直接决定了网络上的公民自由。MP3、mpg和蓝牙等技术标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或混合私人/公共机构决定，这些机构成为全球信息架构的控制点虽然设计决策可以有

这对我们的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在这个层面上有重大的战斗。例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除非使用ie浏览器，否则无法注册联邦紧急救助。技术标准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McKenzie 沃克指出，他在《*黑客宣言*》(Hacker Manifesto)中提出的矢量阶级(vector class)一词，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可行性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可以没有工厂。沃克还对“游戏化”的说法提出了警告，因为它可以被认为是让人们不花钱就去做事情，以换取象征性的奖励。

在第二部分“数字劳动的审问模式”中，Patricia Ticineto克拉夫阐述了劳动指标和影响。她想知道，在社交网络的寄生平台上，劳动是否可能是不可衡量的。克拉夫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产生的，或者是在资本通过生产积累之外产生的。她写道，哲学正在记录劳动、度量和影响的持续重新配置，同时努力使物质本身的微观影响具有生产性。

阿伊汉·阿伊特斯在他的章节中提出，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装配线，那么土耳其机械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对阿伊特斯来说，众包是一个混合概念，将新自由主义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融合在一起。他继续说，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不受监管的*本质*，让人想起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客工计划。德国的*客工计划*是建立无权利移民立法制度的一个突出模式。

Abigail 德科斯尼克调查了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和评论的粉丝版主、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的人数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免费劳动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在线每月7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一点在蒂齐亚娜·特拉诺瓦的章节中也提到过。她写道，粉丝对互联网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劳动。粉丝劳动可以提升产品的热度和声誉，粉丝被引导进入这个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德科斯尼克的结论是，企业应该把粉丝劳动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他们应该补偿那些能够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获得声誉阶梯的第一梯级的粉丝。

乔迪·迪恩在考虑写博客。她写道，作为博主，我们暴露了自己，暴露了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与恨、欲望和厌恶，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性、脆弱性和最终的缺乏控制。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对迪恩来说，宣传是沟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建议工作而不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和玩耍而不玩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而玩耍)

有偿的和以享受为代价的玩)。便利胜过承诺。迪恩的结论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少数幸运儿几乎会得到一切，但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什么都没有。

在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中，Mark Andrejevic从数据挖掘的新前沿报道。他提出，信息的商业占有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Andrejevic认为，这确实是某种物质奢侈的标志，能够在网上被利用——有闲暇时间和资源参与被监控和跟踪的活动。谷歌跟踪其10亿无报酬用户，并将他们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客户，广告客户因此向用户投放广告。劳动、休闲、消费、生产和娱乐的相互交织使对剥削的理解变得复杂，但Andrejevic指出，基于剥削的在线监控批判的潜在有用之处在于，它邀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构建个人选择和个人快乐的问题。

Andrejevic还讨论了同侪压力和网络义务，这正变得制度化，这种劳动的成果被认为是价值的来源。他观察到，商业监控已经成为我们交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剥削并不意味着工人不会对合作努力的成功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正在失去对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控制，但仍有快乐的时刻。虽然他对剥削的批判并没有贬低工人的快乐，但也没有否定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认为，金融化和数字化之间并不容易区分。在他看来，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Los Indignados)和2011年的全球抗议活动都传递了对资本主义代表性组织的激进不满，并断言了起义的鲜活历史和潜力。

丽莎·中村(Lisa Nakamura)的章节研究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中中国淘金者对数字劳动力的种族化。这些“金农”生产并向其他玩家出售武器、服装、动物等虚拟商品，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虚拟形象，以换取真实的美元。在《魔兽世界》的文化中，亚洲的淘金者被塑造成不受欢迎的外来工人。虽然在明确提及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冲突时要保持警惕，但游戏是以虚拟环境中的种族战争为前提的。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结语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讨论了网络逻辑的替代方案。今天，在放下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切实可行且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让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付诸实施?

对于用户来说，网络标志着一种双重束缚，一方面是弱关系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找到工作的真实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一种意识

他们的参与使企业互联网的车轮更加顺畅。社会应该给互联网上的主要网站分配多少权力?至关重要的数字平台不应该受到监管甚至国有化吗?主导地位的诱惑是什么?谷歌是否应该能够规定谁有权访问谷歌图书，也许只允许出价最高的人完全访问?

根据马克·扎克伯格的说法，“分享和联系是人类的核心需求。对他来说，消费者沟通是他所提供服务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从基本需求的角度来谈论自我表露，就会被误解。我们并不是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投票赞成或反对时，这真的是自我表露吗?为了寻求赞美和同行的认可，数以亿计的离职后职场人士像飞蛾扑向阳光一样涌向社交网络，试图通过把自己变成相当普通的东西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其投射出符合雇主期望的身份，难道这不是一个集体自我完善的机会吗?

如果说跨社交网络的阶级意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提议，那么对政治意识的呼吁可能会导致一场反对盲目的个人主义或中间人与用户之间权力失衡的斗争。

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认为，在社会冲突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公司可以转变为工人所有的、自我管理的实体，创造他们自己的共享知识、代码和设计的公地。他写道，劳动的认知形式运动的任务是试图为社会变革创造一种新的霸权和一种新的以公共为基础的联盟，挑战资本的统治。

内德·Rossiter和索恩克·Zehle解释了当前网络向自主的政治和文化“网络的网络”的转变。Zehle和Rossiter强调，为了在其计算领域影响普遍的政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变分领域和代码拓扑的条件。他们写道，这样的行动干预了算法层面。

当网络互动的无摩擦共享破坏了我们的隐私，当控制的数字基础设施无形地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取价值时，我们如何为创造性抵抗开辟自主空间?哪些实践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力量——集体行动和形成共同关注的公众的力量?

我们是否愿意坐在桌前与中介商谈未来的情景，还是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启动我们行动的先决条件?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呼吁，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他要求社会的交流公地不应该被私人拥有或控制。公地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付费或其他访问要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务实的方法是建立法律管辖权，对公共资源施加限制

将服务外包到网上，为工人提供一些基本权利。

Digg.com的“数字波士顿茶党”(Digital Boston Tea Party)，以及所谓的Facebook关于新闻推送、Beacon和其他各种隐私问题的骚乱，都被频繁提及。社交网络通过这些我称之为“民主的景象”，确实赋予了消费者协商自己消费活动规则的权力，但却没有给公民争取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权利。我们看到的不是骚乱，而是及时的用户反馈循环。

除了这些反叛之外，进一步的考虑包括建立实际的替代方案——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拒绝或退出互联网的可能性。

有一些非专有的社交网络服务，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达到相当大的成员。我希望有一天Facebook会出现大规模流失。社交网络服务Diaspora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其他倡议包括独立公民媒体项目“蟹草”，这是专门为满足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的需求而设计的我们可以想到像克雷格列表这样的网站，尽管最近有争议，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在线商业例子，它不关注利润最大化，而是关注用户满意度。

但互联网是如此强烈地屈从于企业利益，即使你跳船，如果你今天放弃Facebook泰坦尼克号，你很可能会跳上下一个救生筏，很可能同样以利润为导向。维基百科、蟹草、Diaspora和克雷格列表是例外;它们不是整个互联网的实用模式。在互联网上，即使是点对点的共享实践，这种几乎总是发生在企业地盘上的“礼物”交换，也为那些我们租用这些平台的人创造了资本。正如麦肯齐·沃克所说，在友谊营销时代，我们租用的是自己劳动的产物。

那些呼吁全面拒绝没有阳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周期的人，需要承认这种地位的罕见特权，需要明白，用户的参与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参与的暴力一方面与数据挖掘有关，另一方面与他们为拒绝主流社交媒体服务而付出的个人和职业代价有关。拒绝就等于社会孤立。此外，在*《趋同文化》一书中*，Henry Jenkins准确地指出，这场争论一直在被框架，似乎唯一真正的选择是完全退出媒体，住在树林里，吃橡子和蜥蜴(Jenkins, 248-9)。相反，我们可以产生真正的反公众，支持非暴力反抗行动，并通过多样化/杂交我们的社交媒体实践创建团结网络。

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正在被使用，我们在互相利用，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哪些社会实践更容易让我们一起变得强大?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将我们自己与特定的网络或服务保持一致?当然，我们会想要质疑所有那些只关心底线，而不是真正用这些新兴的在线平台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的亲爱的朋友。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嗯，难道你不想在工厂这个游乐场里掀起一些严重的浩劫吗?

注意事项

1 Recent reports about Foxconn showed the atrocious working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Pads are produced. Nick Wingfield, "Apple's Suppliers Pressed to Improve Workers' Lot,"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12. Web. June 13, 2012.

2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see Laura Denardis's two recent books, *Protocol Politics: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and *Opening Standar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Interoperability*. 1st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3 Justin Smith, "Exclusive: Discussing the Future of Facebook with CEO Mark Zuckerberg," *Inside Facebook*, June 13, 2012, http://www. insidefacebook. com/2009/06/03/exclusive-discussing-the-future-of-facebook-with-ceo-mark-zuckerberg/.

4 "Diaspora*," *Diaspora**, June 13, 2012, https://joindiaspora.com/.

5 "All about Crabgrass—Groups," https://we.riseup.net/crabgrass/about.

参考文献

Galloway, Alexander. 2007. “We Are All Goldfarmer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ttp://cultureandcommunication.org/galloway/interview_barcelona_sept07.txt.

Jenkins, Henry. 2008.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Revised. New York: NYU Press.

Lazzarato, Maurizio. 1997. “Immaterial Labor.” *Generation Online.*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labour3.htm.

Marx, Karl. 1867. *Capital. Vol.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reprint 1992.

Smythe, Dallas W. 1981/2006.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eds. Meenakshi G.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230–56. Malden, MA: Blackwell.

Wiener, Norbert. 1954.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 Jackson, TN: Da Capo Press.

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转移

1
寻找丢失的薪水支票

安德鲁·罗斯

2011年2月，《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被出售给美国在线(AOL)，公平劳工权益倡导者终于有了一个高调的工具，可以与免费在线内容提供的剥削者作斗争。当网站所有者阿里安娜·赫芬顿从出售网站中获得了整整3.15亿美元时，多年来为网站增光的博主们被忽略了。《赫芬顿邮报》ArtScene和Visual Art Source的定期撰稿人宣布了一场抵制活动，在《赫芬顿》嘲笑无薪作家的行为后，这场抵制活动迅速发展为一场全面的电子罢工。“去吧，去罢工吧，”她嘲笑道，认为没人会注意到，也不会在意。3月，拥有26000名会员的报业协会(Newspaper Guild)支持罢工，全国作家工会(NWU)/UAW Local 1981也支持罢工，并竖起了一条电子警戒线那些越界为《赫芬顿邮报》(HuffPo)撰写文章的进步人士遭到了激烈的抗议，有些人还被贴上了“结痂”的标签，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署名放在了呼吁职业团结的文章之上。今年4月，媒体劳工活动家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 Tasini)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这些未获补偿的博主赔偿1.05亿美元，他将原告描述为“阿里安娜·赫芬顿种植园的现代奴隶”。塔西尼有良好的记录。在此之前，在2001年，他赢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纽约*时报公司等人诉塔西尼等*人案中)，*出版公司*在电子数据库中重复使用自由作家的作品之前*必须获得*他们的许可。

无论如何，抵制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从一开始，诉讼的前景就不太光明。但赫芬顿让他们吃蛋糕的姿态，再加上她作为左倾专家的公众名声，帮助把这件事推到了聚光灯下。关于数字内容的公平报酬的争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还有关于免费劳动力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受到网络评论家小圈子的培育。之前的社交网络资产被出售时，如YouTube(被b谷歌收购)、Flickr(被雅虎收购)和Bebo(被AOL收购)，这些交易引发的喧嚣远远超过了随之而来的低调抱怨。

“注意力经济”的辩护者们大肆宣扬网页浏览量曝光给自由职业奋斗者带来的非金钱利益，让他们在动荡的博客圈中驾驭自己的职业生涯。根据这一观点，在广阔的平台上免费推广的价值超过了专业薪酬标准的保证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也有人认为，出版商与其博主的关系简单

这反映了数字信息领域已经确立的规范，似乎要求将最初的服务捐赠作为惯常的进入价格。无论如何，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者没有合同义务与那些事先自愿付出劳动的人分享战利品。在争论的另一方，抵制运动的支持者则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夺形式来渲染案件的延续性。赫芬顿所榨取的利润，与那些从欺骗员工中获利的实体老板所享有的利润没有什么不同。谈论自我推销的好处，是那些能够利用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雇主所吹捧的一种欺骗行为。至于出版商欠博主的债，有人认为她至少有道德上的义务。但塔西尼的集体诉讼更进一步，声称赫芬顿方面“不正当得利”——这一法律主张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事先同意免费写作。

赫芬顿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她坚称，在担任AOL内容主管的新职位上，她正在推动招聘数百名专业记者，为该公司在当地新闻业务Patch.com下开设的分社工作。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更仔细的调查表明，这些新招募的人将服务于很难与所谓的内容农场区分开来的运营——内容农场是一个专门为引发热门搜索查询而编写的肤浅、非原创故事的网站，并利用谷歌算法将网站放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领先的内容农场，如按需媒体和Associated Media，在在线咨询领域大量生产低质量的文章和视频，向他们的自由代理创意人员支付微不足道的计件工资。正如丹·罗斯(Dan Roth)在2009年《*连线*》杂志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中所报道的那样，“文章不是由训练有素的编辑构思出来的，也不是根据提交的问题委托编写的。相反，它们是由一种算法分配的，该算法挖掘了近1tb的搜索数据、互联网流量模式和关键词率，以确定用户想知道什么，以及广告商愿意支付多少钱出现在答案旁边。”罗斯估计，作为这个类似垃圾邮件的行业快速增长的衡量标准，仅按需媒体一家公司很快就会出版“相当于每年四本英文维基百科”的内容。[2]。

就像这些网站在内容上掀起了一场快餐革命一样，在员工薪酬方面，它们也在进行一场逐底竞争。在罗斯2009年的文章中，这位电影制作人在现场拍摄，在家里用Final Cut Pro编辑，然后上传到按需媒体，每个视频片段获得20美元的报酬。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这20美元的片酬在随后的几年里无疑已经下降了。事实证明，AOL大举进军在线内容的自身商业模式，是推动工资贬值的因素之一。2011年2月，该公司的扩张计划“AOL之路”(AOL Way)被泄露，该计划透露，该公司将向每天最多写10篇博客文章的内部作者支付微薄的报酬。

每一篇文章都为搜索引擎友好性和最大的广告曝光率做好了准备

在最近的经济大衰退中被击倒的创意人士感到了与这种文字工厂签约的压力，因为这越来越成为城里唯一赚钱的游戏。毕竟，为内容农场提供大量垃圾产品的另一种选择是通过免费发帖来玩声誉游戏，就像《赫芬顿邮报》的博主一样。前一种选择涉及到一种对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来说是深恶痛绝的日常工作。后一种选择保证了一种不被异化的思想表达，更接近他们的理想。然而，其中只有一种能保证餐桌上的食物。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新的困境。自18世纪以来，创意人就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当时商业文化市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与教皇格鲁布街的涂鸦者们一起勉强维持生计，要么与善变的公众建立起一种知名度关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计不受市场粗暴公正的影响，文学代理人、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纷纷涌现或发展起来，尽管新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讨价还价和监管代理人(如新闻工会)，并且比他们更聪明，更新鲜的版本很可能会出现。例如，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成立于2001年，专门响应自雇人士的需求，它是近年来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会。它的成员正在学习如何获得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险份额和政治影响力，同时冲浪冲刷着不断变化的创意/数字景观的每一个新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WashTech率先为科技行业的永久雇员提供劳动保护，其他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WA)的当地员工也纷纷效仿，努力招募独立承包商。

但如果就此断定，在数字劳动领域，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那就错了。相反，每次在线工具的推出，都提供了更巧妙的方式，从用户和参与者那里提取更便宜、更优惠的工作。在这方面，从web 1.0到社交网络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第一代网页设计的年轻热情是用卡布奇诺和无知的长辈们的赞赏换来的。建立网络的先锋环境就像一场大规模的谷仓饲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协调的志愿者努力。它的后继者也依靠年轻人的开放性进行交易，但其隐性劳动经济的复杂操作与web 1.0的积木式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今天华尔街的外来衍生品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五花肉交易的起源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近年来的社交平台、网络爬虫、个性化算法和其他数据挖掘技术，都是为了从我们几乎所有的在线活动中汲取有价值或可货币化的信息而设计的。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传统标准，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可以或应该被归类为劳动，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为了更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所做的那样，需要深入探究赫芬顿事件所暴露的数字景观的可见表面之下。

然而，从一开始，就让我们记住，新媒体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它们是改变社会力量的推动者，而不是原因。因此，正如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不仅仅是阶级战争的武器，旨在控制和熟练工人，它们也有可能消除雇佣劳动，社会化生产，解放我们的时间。它们是否为后一种目的而部署，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技术发展，不如说是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即我们与资本、属性和治理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状态。逆向工程始于技术，但除非它也被视为一种社会挑战，否则结果很可能只会使精通技术的精英受益。

前称雇佣

在劳工运动的全盛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老板需要工人，但工人不需要老板。然而，在201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美国企业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而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实际失业率为17%。利润和失业率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否意味着老板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工人的情况下生存?不完全是，不，但是可以从一百种角度分析的统计数据可能表明，工作领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收入的两个原因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企业正将越来越多的业务转移到海外，尤其是高技能行业的工作岗位，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劳动力成本。因此，它们仍然需要工人，但不是北方昂贵的工人。第二种解释基于商业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率提高。粗略地说，这意味着员工迫于裁员的严峻威胁，要么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要么接受减薪。在任何经济低迷时期，雇主都会以这种方式推动他们的优势，但在像这次这样吸人灵魂的经济衰退中，没有季度;攻击来自四面八方，无论是以冻结工资、让步、无薪休假、裁员，还是进一步的临时工的形式。第三个原因——这是一个不熟悉的量子——是越来越依赖新型的免费劳动力来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些公司足够精明，可以从中获利。关于这一足迹的确凿证据并不容易收集，但强有力的轶事记录表明，这一足迹足够大，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免费或代币工资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众包;数据挖掘或其他复杂的数字技术，从用户/参与者那里提取租金;扩大监狱劳动项目;每个白领部门都出现了大量无薪、近乎强制性的实习;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手志愿活动，它们把我们在文化上的诸多商业活动变成了一场业余才艺表演，少数赢家能获得头奖，其他所有人都能获得运气不好的奖品。基于网络的发展吸引了大多数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免费在线内容的浪潮直接威胁到专业作家和艺术家的生计。毕竟，报纸、杂志和海外新闻机构的广泛关闭，已经让一代工会工作岗位随风而散。随着在线内容聚合商横扫一切，专业人士的薪酬等级也被夷为平地，在赫芬顿事件发生之前，阻力寥寥无几。在信息领域的大多数角落，无偿工作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become normative, and largely because it is not experienced as exploitation.

从经济大衰退的早期开始，商业媒体的权威人士就一直想知道，为了维持运营和提高市场地位，企业在利用新的免费劳动力资源方面能走多远。我们如何利用人们拥有的所有空闲时间(或者用网络布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话来说是“认知盈余”)，尤其是那些刚刚失业的人?由于后者中的许多人将把他们的新空闲时间花在网上，我们如何利用他们探索任何途径寻找就业机会的意愿呢?我们能利用他们喜欢做有趣的工作的倾向吗?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如何利用他们的习惯性需求，在没有有偿工作的情况下，参与一些感觉像工作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参与进来?这种思路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商业策略。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公司的高估值也激发了他们对潜在意外之财的夸大。不可避免地，有人认为社交网络是21世纪的石油;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石油仍然是21世纪的石油。

即便如此，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令人瞩目。2011年，facebook的营收估计为43亿美元，其中近10亿美元是净利润。撇开ipo前超过1000亿美元的估值不谈，这些数字已经足够大了，尤其是考虑到这家公司的员工人数只有2000多一点。以任何历史标准衡量，这样的员工收入比例都是不寻常的，但对于那些主导信息服务高层的公司来说，这是典型的。以2011年谷歌为例，该公司约有3万名员工，但其收入估计为350亿美元，利润为130亿美元。其他快速增长的社交媒体公司——推特、Groupon、Zynga、领英和tumblr——也在同一条船上。

对于那些迅速减少的非脸书用户来说，亚伦·索金的电影《*社交网络*》一定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它所呈现的创意构思的故事是相当熟悉的。以常春藤联盟的温室环境为例，在这种环境中，大学价值观很容易被已经在校园里酝酿的掠夺性市场风气所压倒，再加上一群可识别的角色:一个社会挑战的白人男性工程师;一个聪明的白人女友，通过羞辱进一步挑战他;一个受社会欢迎的男性企业家;被犹太男人不可抗拒地吸引的各种各样的、主要是亚洲的女追星族;还有一个新波西米亚式的创业团队，全天候工作，以取得市场突破。这些都是在技术发明领域制造神话的标准好莱坞模板的更新组件。这就是国家冠军们如何努力将耀眼的创新和光辉的财富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影片中并没有描绘出真实的社交网络，所以不知情的观众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

该公司巨大的财务成功依赖于脸书5亿用户的订阅基础。然而，这些用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付费用户。相反，他们执行的各种活动(技术上称为点击信号)是有价值的数据的来源，这些数据被出售给真正的客户——广告商或行为市场供应商，如Bluekai、TargusInfo和Acxiom。根据Eli Pariser的说法，“仅Acxiom就积累了平均1500条数据。
该公司的数据库里有96%的美国人。其中一些客户付费在网站上做广告，但大多数客户利用这些信息在网络上跟踪用户，投放个性化的广告。当然，对用户来说，代价是免费使用平台和软件，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托管和维护的成本与它可以从网站上每天的流失中提取的信息的可交易价值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交网络用户都不知道平台所有者是如何从他们交流的自愿内容中获利的，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如何为所有者创造可货币化的产品的。但正如安德鲁·刘易斯(Andrew Lewis)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你不为某样东西付费，你就不是客户，你就是被出售的产品。””[5]

20世纪60年代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造了“产消者”(prosumers)一词，用来描述那些已经不再被动接受市场选择的消费者阶层。但他很难想象这个词会如何被使用，就像今天一样，用来指代大量的互联网用户，这些用户致力于建立关系，完善自己的在线社会同一性，为其他人提供丰厚的利润。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其他20世纪70年代阳光明媚的后工业社会预言家也无法想象，新秩序是由注意力经济驱动的，也无法想象，维持新秩序的不是认知工作者的有酬劳动，而是普通的、无报酬的个人的自我推销。此外，支撑这种经济的回报，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工业化之前的时代，那些确保社会地位的资产，在那个时代，小心翼翼地、费力地培养与有钱有势的人的关系是相当有价值的来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基于社会资本培养的文化的复苏，无论是对于那些在声誉赌注(在Twitter热门和顶级病毒式链接中)中寻求突破或重磅关注的人，还是在更低悬的互联网自我曝光回路中。在某些方面，这种情感货币已经取代了工业化的工资，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靠付费内容获得结构化生活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们现在把自己的署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希望通过知名度来获得利基生计。但到目前为止，在工业基础上，最丰厚的回报分配给了那些建立和维护提取技术的人，他们拥有该体系的知识属性，他们可以将个人表达的总产出当作它来交易

难道像谷物或甜菜这样的大宗商品换句话说，真正的战利品不属于那些有抱负的明星，他们通过衡量互联网情绪和观点的一系列指标进行排名和评级，而是属于幕后的内容主持人和数据挖掘者，他们利用这些和其他指标来保证自己的利润。结果，对于后一群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工资的命题。总而言之，支撑这种经济的非正式契约是一项极不对称的交易。

通过展示大众呼声来制作免费媒体内容的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纸质出版物中“致编辑信”栏目的建立。由于这些文章是经过挑选、编辑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支持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路线而捏造的，因此它们很好地说明了所谓未经请求的公众舆论是如何产生、塑造甚至是口述的。依赖于用户输入的网站，无论是主要行动还是针对某一特色项目发表评论的形式，都是从这些给编辑的第一封信开始直接线性下降的。到目前为止，它们更加原始和未经过滤，它们建立在其印刷先行词的受欢迎程度和成本效益之上。

近年来，随着开放评论部分(“评论免费”)的延长和激增，越来越多的在线报纸版本转向众包呼吁读者生成免费的专栏、图片、视频、设计、事实核查和其他信息供应这些呼吁背后的原则是，读者会对参与感到满意，结果会更真实，特别是如果他们利用的是委托记者无法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在主流媒体之外,[-]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众包作为一种半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用于提取想法、意见、设计和情报，除了知名度之外，对提供者的补偿很少或根本没有。非正式的证据表明，只要一项任务可以被宣传为有趣或酷，你就很有可能免费完成它，或者从看似永远乐于助人的人群中获得微薄的报酬。此外，如果一些输入看起来非常专业，那是因为要么众包电话是专门为吸引专业人士而精心制作的，要么是因为它很可能来自曾经是专业员工的人，已经成为志愿内容提供商的业余半人半人。

另一端则是更为常规的任务，比如亚马逊(Amazon)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等程序的竞标。投标被接受的回报是请求者设定的最低费用，并被分配到可能不超过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和其他电子枪(e-lance)的注册任务员不会被认为与临时雇员有丝毫相似之处，就像那些接受技能密集型众包的无偿创意人员一样。他们不会留下任何受雇的痕迹,

当然，也没有任何法律或监管的义务网络将雇主牵扯进来。然而，他们所做的是使工作的定义更接近它的词源——一个独立的块，或一块，只在其完成期间存在的工作。

分散的工作场所

分布式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描述使用互联网来调动广泛分散的离散个人群体的备用处理能力的方式。这不应该与该术语的旧用法相混淆，该术语用于描述用于协调地理上分散的工作场所的业务流程外包业务模型，无论是来自远程办公还是来自全球生产链上的远程节点。这种模式对上个十年前五年白领离岸外包的浪潮尤为关键，它依赖于复杂的工作流平台技术来分割、分配和重组工作。因此，这种新模式也应该与今天被称为移动办公室的分布式工作场所区分开来。商业战略家主张，允许高薪企业人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工作，对员工士气有好处。但在他们的报告中，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才是最受关注的。工作和休闲时间之间的界限不断被侵蚀——这是雇主们长期以来的梦想——这是将员工置于无情的24/7束缚之下的结果，从这种侵蚀中可以获得数不清的收入。

这种新型的分布式劳动不需要在遥远的分支机构里由领工资的员工来完成，也不需要在有线咖啡店里由手提电脑的搬运工来完成，咖啡馆是一代合同自由职业者的默认工作场所，他们放弃了自己家(托夫勒的“电子小屋”)的隐私，在公众面前工作，勇敢地、或以他人为中心，社会的群居嗡嗡声。相反，它要么是由根本不把他们的互动输入视为工作的用户完成的，要么是通过越来越多的电子lance服务网站在线外包给大量的任务者，这些任务者将来自各种来源的收入拼凑在一起。就像在离岸外包模式中一样，这种劳动力的分散是高度组织化的，但它并不依赖于实际搬迁到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相反，节省的成本既可以来自于人群的潜在才能，也可以来自于将劳动微观分工为拼图、临时工作、杂务和零头，如果这些工作比分散注意力更重要的话，只需要断断续续的集中精力。

这些微任务的设计和分配可以说只是源自泰勒主义的工作管理谱系的最新发展。工作人员被有效地去技能化、分散，并且被剥夺了对其劳动所贡献的产品性质的任何知识。相比之下，协调经理则完全控制着劳动过程。至于群众的捐赠劳动，它有更长的历史渊源，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造性工作的传统，在创造性工作中，金钱补偿的牺牲通常是为了换取工作满足感或测试和测试的机会

宣传自己的才能。上世纪90年代末，在新经济或网络公司提供的正式就业中，这种愿意奉献劳动力的行为首次作为工业原型出现时，被称为自我剥削。在我自己对这些新媒体工作场所进行人种学研究的过程中，我记得我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我，她的工作提供了“你就是忍不住要做的工作”——这一描述似乎总结了充满激情或牺牲精神的工作心态随后对知识和创意产业工作场所的人种学研究表明，工作的满足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长的时间来追求令人满意的完成，以价格折扣来换取审美认可，以自我剥削来回应自主性的天赋，以可有可无来换取灵活性

将过去十年中创意产业的兴起置于大背景下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从字面上理解为一种将创意产业化的努力，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市场奖励然而，使创造性工作的节奏适应工业模板是一项严峻的管理挑战，而且，在知识属性经济中，竞争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转向众包提供了一种更客观的解决方案，可以削减成本，并使所有者免于任何雇主类型的义务。大众不仅比训练有素的员工更聪明，你也不需要为了利用大众的智慧而缴纳社保，也不需要忍受工资单上那些创意人员任性的个性。

众包和联合技术是奇怪的同床异梦的产物。一方面，开源运动、共享软件和黑客伦理的协作基础显然功不可没，后者在拥抱公地原则方面具有深刻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色彩。潜在的互惠精神，或者Trebor Scholz和Geert Lovink所说的“自由合作的艺术”，在面对潜在垄断者的共同努力，

数字化领域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毕竟，少数几家企业巨头——谷歌、美国在线、Facebook、雅虎和微软——现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日常网络流量。另一方面，追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企业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样的协作精神。毫不奇怪，四处寻找新鲜的、穿着得体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家们抓住了众包的机会，把它作为一种释放互联网文化中潜在的、或者说天生的天才的技术。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双重利用都是某种大局权衡的一部分。毕竟，社交网络已经打开了一个信息丰富的公共产品的全新世界——包括反资本主义组织的潜力;真正的自由市场;点对点共同价值创造;大众获取文化;网络抗议;以及各种各样的替代经济(如果你相信有关Twitter的网络炒作的话)

它甚至是推翻中东和北非国家独裁统治者的关键)。总的来说，可以说社交网络平台在资本积累的新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人们为维持非专有网络而付出的代价，这些网络的活动范围足够大，也足够异构，足以逃脱政府或公司的监视轨道。尽管封闭者正在努力推动，但目前的平衡仍然有利于公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被撇去的免费劳动，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向整个互联网缴纳的一种什一税，让剥夺者远离我们真正珍惜的那部分互联网。

这不能怪电脑

自由劳工辩论的参与者常常近乎于认为，数字技术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它本身就应该为在就业规范领域打一个巨大的洞负责。然而，指责新媒体是技术决定论谬论发挥作用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除此之外，它还忽略了过去15年里，旧媒体和其他就业领域中无偿劳动的激增。

毫无疑问，新媒体拥有将发行价格压缩到几乎为零的技术能力，它正在主持最快速发展的产业努力，以利用参与者的无偿劳动。但旧媒体也受到了志愿者或业余经济的严重冲击。没有什么比真人秀TV的兴起更明显了，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退化的劳动部门。事实上，在利用免费内容作为商业模式的方向上，第一次重大挫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TV行业，当时，为了应对有线电视频道的爆炸式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观众分化，制片人引入了类型格式，从而降低了制作投入和专业劳动力成本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对娱乐工会的攻击。对此的回应是，其中几家媒体工会和工艺行会掀起了罢工浪潮。1988年美国作家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长达22周的罢工在TV史上意义非凡，因为它为该行业播出时间最长的节目《*COPS*》*打开了大门*。面对严重的内容短缺，同时也在寻找污点材料，福克斯电视网批准了这部没有剧本的节目，它不需要演员的工资，而且制作成本极低。事实上，在《COPS》*(COPS)*中，使用手持摄像机捕捉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执行更侧重于行动的任务，开创了许多电影真实感节目。

自2001年以来，随着《*幸存者*》和《*老大哥*》的巨大成功，真人秀TV和业余挑战游戏节目所占的节目份额激增。这些节目的制作成本只是传统的、有剧本的电视剧制作成本的一小部分，而收视率和利润却反复无常。事实上，它们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几乎所有的制作成本都是在第一次播出时赚回来的;辛迪加或海外销售则是纯利润。从一开始，业主就坚持制片人和编辑与其说是编剧，不如说是编辑，写写剧本和对话，把现实生活中的大块内容拼凑在一起。任何看过真人秀原始画面的人都能看出，这些对话都是经过精心编写和策划的，那些通常分多次拍摄的所谓真实场景，都是高度建构的。尽管如此，这种虚构还是被用来保留的

美国作家协会脱离现实节目因此，网络也开始将游戏节目归类为真人秀节目，以便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制作它们。

不出所料，没有工会组织的真人秀行业充斥着不合标准的条件。下层工人，如制片助理、伐木工、助理编辑、司机和其他技术人员，经常被要求每天工作18个小时，没有午休时间，没有健康或其他福利，他们还面临雇主的强迫，要他们提前交考勤卡。工资率一般是照本付酬的节目雇员的一半，而且大多数加班费是没有报酬的作家迫于电视台准时制节目的压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工资和工时违规问题，而且，由于他们通常是随意雇佣的，因此长期处于工作不稳定状态

业余选手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被视为演员，因此不享有演员工会提供的权利和保护。然而，与头奖经济相适应的是，顶级节目中的人才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确，有些人每集都能获得可观的报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报酬来自于以代言形式出现的售后收入。然而，如果有的话，大多数人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津贴，而他们曝光的代价是忍受被剥夺睡眠和大量饮酒的条件，这些条件旨在引发屏幕上的紧张、冲突和对抗。

这些老媒体行业的劳工违规行为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娱乐行业仍然高度工会化的背景下。在工会没有任何立足点的新媒体世界里，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以及对业余或用户投入的广泛利用，从一开始就是规范的。因此，更准确的结论是，虽然数字技术并没有催生自由劳动的模式，但它已被证明是非标准工作安排的高效推动者。

免费劳动激增的另一个例证是白领或无领实习，这可以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工作类别，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试图进入日益精简和残酷的工作场所。新入职者现在竭尽全力(包括在实习市场上直接为职位付费)，以获得一份无薪实习(通常是许多实习中的第一份)，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撰写简历，在进门时迈出一步，或者在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占得先机。当然，这一飞速发展的行业的最大受益者是雇主。在罗斯·佩林关于实习激增的书中，他估计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实习中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补贴，这还不包括许多公司通过雇主错误分类而进行的大规模避税佩林证实，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期间，一代全职工作变成了实习工作，而以前的带薪实习工作迅速变成了无薪实习。据估计，现在美国有50%的实习工作都变成了无薪实习

无薪或低于最低工资，德国为51%，英国为37%。

如果实习真的是一种理性的职业投资，有保证的回报，那么这种形式的雇佣行为的道德准则就会更加透明。但是佩林引用的转换率——记录有多少实习生变成了固定职位——并不是很令人印象深刻。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在一些公司，这一比率曾经高达50%，但近年来，这一比率急剧下降，而且是全面下降。事实上，这些数字正趋向于抽奖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事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实习只能为你赢得相当于白领工作经济中的彩票。

考虑到这些微不足道的机会，为什么更多的年轻人没有转向蓝领实习的前身，即技术行业的学徒?学徒制仍然提供了一条坚实的道路——尽管要经过漫长的试用期——在多达一千种行业中获得独特的生计。其中一些职业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消亡，但大多数职业相对安全，不会被外包——水管工和电工的工作不会被转移到海外。因此，它们与手工工艺的联系也唤起了一种手工艺自主性，这让我们中间的道德家兴奋不已——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Crawford)的书《*商店课*》(*Shop* Class)受到了过热的欢迎，*被称为“灵魂工艺”*。毫无疑问，体力劳动的耻辱仍然是引导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考虑贸易学徒的最大因素。但是，大多数有问题的行业仍然是男性的据点，这是一个不方便的事实，阻碍了克劳福德努力提升他自己热爱的摩托车维修艺术和类似的职业精神。虽然注册学徒中只有不到10%是女性，但女性往往主导着白领和无领工作中最不稳定的部门，而且她们被分配了大部分无薪实习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一项调查，她们占了77%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习经济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工作女性化的另一种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到大多数女性，做了很多无偿的工作。实习劳动还模糊了任务与合同、责任与机会、情感性工作与工具性工作之间的界限。当这些界限被消除时，女性的负担就不成比例了。实习所带来的牺牲、权衡和羞辱，更让人联想到传统类型的女性工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过去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以区别于一级市场产生的家庭工资)。

实习与我们的整体讨论特别相关，因为大多数实习生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这方面，这是自我剥削的扭曲心态的又一个例子，这种心态已经走向了就业的杀戮场。今天，对于什么是工业中有工资的工作场所的公平劳动，人们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更准确地说，在这个话题上分歧的范围是有限的。人们或多或少理解血汗工厂是什么，也认识到它的条件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在新的、放松管制的就业经济中，我们很少有标准来判断受薪或自由职业部门的公平，在这里，任何在工作和报酬(更不用说工作和娱乐)之间划清界限的努力似乎都越来越无效。

是不是马克思?

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将工作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或使用者，或者从正式的生产场所转移到分散的消费点。迈克尔·帕尔姆(Michael Palm)对自助服务兴起(这一工作转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描述，始于贝尔淘汰了电话接线员，转而支持客户拨号。说服电话客户自己承担额外的拨号工作需要大量的哄骗，更不用说实践教育了当然，回过头来看，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电话生产商手中接过的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相比，为自己拨号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想想买家花在研究和组装消费品上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或者各种各样的客户服务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用户输入量的增长。因为这些时间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客户服务的，它们是最让我们恼火的，所以我们最终把愤怒发泄在机器人的声音上，或者在班加罗尔倒霉的呼叫中心的员工身上。

但这些负担只是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等*意大利运营*主义理论家所说的“社会工厂”最切实的证据。根据这一论点，工厂的工作纪律被输出到远远超出其围墙的地方，在我们的日常社会活动中，很大一部分生产工作随后被越来越多地无偿执行。因此，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净主体性——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工作场所的辛劳，都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这一论点时，它是对资本所有者努力将自己从与工会化的、经常是激进的工人组织的工厂约束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先锋派分析。将工作转移到传统生产地点之外，只是资本的部分回应。另一种方法是搬迁到成本更低、没有工会的地方，第三种方法是尽可能地让劳动力临时工化。如今，离岸外包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多数职业的临时工大军似乎势不可挡。社交工厂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前卫之处，至少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19)的页面上公开讨论和敦促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和众包技术提取租金的*商业*策略时没有

在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会议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否仍然适用于以Facebook为代表的资本积累新模式。这种令人愉悦的工作——有时也被称为“游戏劳动”或“游戏劳工”——的新形象确实适用

似乎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如何从社会必要的有偿劳动中产生的经典分析。另一方面，意大利学派的一些评论家认为，马克思在《*政治批判批判*》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段落中预言了资本主义对“一般智力”或“社会大脑”的日益依赖——这是生产认知模式的来源和代理人的庞大的合作知识网络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似乎确实能够适应或解释作为非物质劳动组成部分的捐赠性或激情性努力的剥削性使用。

在回应关于马克思的相关性的第一次辩论时，值得注意的是，有偿劳动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观察工作的镜头。迈克尔·丹宁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无薪工作(因此更难以衡量)的扩散可能是理解全球经济生活的一个更好的分析立场。毕竟，有限的、有工资的工作日(以及每周5天工作制)的模板，连同其对相互遵守的规则、义务和期望的正式包装，是战后劳资双方暂时休战期间发达经济体讨价还价的高度人为的产物。虽然它在那几十年里被采纳并称为标准就业，但它的规范没有任何自然之处，而且它几乎只适用于工会化的男性产业工人的主要就业。事实上，这种密切竞争的安排漂浮在家庭无偿工作的海洋上，它与第二就业部门的临时工作和非正式部门的无薪工作共存，这两种工作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都在膨胀。

此外，毋庸置疑的是，从历史上到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劳动力都没有工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动力享有固定工资和薪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很有可能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有限工作日内从事有偿劳动，可能很快就会被视为一小部分人的短暂常态，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雇于世界上日益陷入困境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不稳定工作的激增——无论是在低工资的服务业，还是在高工资的知识和创意产业，在这些行业中，个体经营或零工制越来越成为常态——可能被视为正式模式的退化，但是，那些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标准就业之外的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40岁以下的劳动力除了不稳定的不充分就业外，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对什么是公平劳动或不公平劳动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是高度语境化的，需要不断调整。他们不就是自己被剥削的仲裁者吗?不然的话，就接近于指控他们有“虚假意识”。

关于一般智力的问题，一些高增长的工业部门越来越依赖思想和创造性人才，资本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保证认知技能的供应，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只要资本所有者对知识属性的控制得到保证，他们就愿意在劳动纪律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创造性工作领域现在拥有多种形式的自主性和自组织，与泰勒式的标准化和去技能化规则相去甚远。然而，围绕知识属性的复制之争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在数字版权管理的监管问题上，与认知阶层中热爱公共资源的黑客部分发生了持续的小规模冲突。因此，将资本暴露在开放的知识网络中寻求利润来源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当同样的知识可以免费广泛获取时，对技术上特定的商业模式的投资可能会迅速走下坡路。在免费投入的情况下，给予的手也是索取的手。

因此，关于资本对一般智力的依赖，我们至少可以说，其结果是一个参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竞争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在这方面，我们远远超出了工厂门口的对抗——这是工资劳动者努力谈判出售劳动力或工资合同谈判的习惯场所——这是限制这种对抗的法律或象征性努力。的确，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最近指出的那样，与其他政治原因相比，在薪酬斗争中消耗精力的认知者或创造性人士往往更少。他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关于教育、社区发展、食物主权、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斗争中，投入到信息格局或其他受不公平分配影响的问题上

然而，如果像一些非物质劳动的倡导者那样得出结论，认为资本由于需要广泛地搜寻，特别是在不确定和敌对的地形上寻找认知投入和盈余而被削弱或被打败，那就太天真了。当前的租金提取热潮的证据是，新市场的利润远不是软的，无论是对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巨型垄断者，还是对Demand Media和Associated content这样快速扩张的内容农场，还是对规模较小的内容聚合器军团来说。此外，它们的商业模式是高度量化的，与用户或贡献者投入的可测量价值非常精确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绝不清楚，日益成熟的互联网指标行业是否代表着与劳动价值论的盈利计算的重大背离。正如克里斯·雷曼(Chris Lehman)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劳动体系非但没有将工人生产率和报酬的惯例彻底改变，反而“仅仅是将报酬从收费流的下游进一步送到了不择手段的收藏者手中”。[25]

信息部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速度也不应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工厂大门不再是重要的爆发点。几乎所有的技术

该部门的基础设施是在东亚的世界工厂制造的，那里恶劣的工厂条件经常引起高强度的劳资冲突。创造性的使用，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到高度定制的工作体验，象征着后福特主义的流动、灵活、自我组织的形象，其制造条件则截然不同。在电子产品生产链中，雇佣数十万工人的工厂越来越普遍，该行业最近的趋势是将所有组件操作整合到一个屋檐下，而不是将其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其结果看起来有点像打了类固醇的福特主义。

广达(Quanta)、仁宝(Compal)、纬创(Wistron)和英业达(Inventec)等台湾大型原创设计笔记本电脑制造商，通过建立遍布东亚的零部件供应链，并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整合和组装成品，逐渐垄断了全球生产。然而，由于台湾另一家重量级企业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简称鸿海富士康)2009年进入笔记本电脑行业，这种承包模式目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士康在工业领域的崛起，可能会像沃尔玛改变零售业那样，给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按照富士康高管们的幽默说法:“20年后，只会有两家公司;一切都将由富士康制造，然后由沃尔玛销售。直到最近，该公司本身还是台湾笔记本电脑巨头的供应商。由于制造零部件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电脑组装的利润率，富士康能够通过整合所有零部件制造，并降低自己在最终组装工作上的利润率，来接受它们。如今，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拥有超过100万名员工的富士康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通过与其他零部件供应商合并，迫使这些前客户采用其垂直生产方式。此外，作为这家巨型企业努力成为原创设计制造商的一部分，它正在发展自己的设计能力，最终目标是挑战目前为其供货的顶级品牌:戴尔(Dell)、惠普(Hewlett-Packard)、苹果(Apple)、宏碁(Acer)和索尼。

富士康也是一家因其庞大工厂的军国主义劳动纪律而声名狼藉的公司。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厂区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该厂区拥有40万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青年农民工。共有1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幸免之难。这些死亡事件被广泛解读为对工厂残酷劳动条件的一种存在主义回应，而苹果iPad的强劲市场需求带来的压迫性加速加剧了这种反应。在第12次从宿舍窗户跳下后，一名工人的博客发表了这样一篇令人心酸的帖子:“也许对富士康员工和像我们这样的员工来说

使用死亡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曾经活着，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只有绝望。”

富士康首席执行官郭台铭(Terry Gou)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公关运动，以回应抗议，并承诺加薪。然而，对自杀事件最能说明问题的回应，是将生产转移到内陆的西部省份;到长江上游1000英里处的重庆，到四川省会成都，再到富士康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所在地河南省会郑州。富士康有很多公司。这是自十年前台湾海峡两岸人口迁移以来最大的一次重组，整个个人电脑行业似乎都在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重庆和成都，以利用那里廉价得多的劳动力、慷慨的政府补贴(内陆省份激烈竞标的结果)、以及远离劳工和人权组织审查的地点。但这一次，富士康走在了前列，它的劳动纪律和垂直生产模式正在引领潮流

富士康整合生产的举动可能看起来像是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IBM模式，当时最初的计算机巨头在内部生产一切。因此，富士康庞大而无情的工人队伍也让人想起了20世纪早期的泰勒式装配线。这两种工业模式本应积灰，与过去的大众社会时代无可挽回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却在这里，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之一的利润丰厚的中心蓬勃发展。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反血汗工厂活动人士一直试图迫使全球北方的消费者直面他们购买服装背后的人力成本。同样的道德运动能否适用于信息技术产品，还有待观察。服装从来没有那种神奇生产的气息，支撑着高科技的光环。对于富士康的龙华工人来说，他们使用了最极端的手段来引起公众的注意——“死亡是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方式。”通过他们的自杀，他们阐明了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死劳动”原则的字面含义。他们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个以这种方式公开自己异化的人。

《链帮的两头》

在马克思著名的分析中，要使具身在工厂机器中的“死劳动”复活，就需要“活劳动”。作为产生的剩余的结果(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吸血鬼行为)，资本能够像僵尸一样漫游到任何它喜欢的地方，直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它的奸商被迫在自我管理的驱魔行为中挖掘自己的坟墓。

以新一代的工作技术，特别是移动技术为例，活劳动也被允许自由活动，选择何时何地打卡，以及是否在途中玩耍。作为对这种难得的许可的回报，虽然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激，但我们似乎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免费工作，或者以相当大的折扣。无论他们是在咖啡馆、远程办公“酒店”还是在海滩上工作，移动办公似乎都远离了工业时代令人汗流浃背的区域。但他们的数字成就依赖于生产链另一端的大量劳动力的统一管理，其中一些规模更大，控制更严格，这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梦想不到的。就在我们梦想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工具和应用的同时，这些个人的愿望也被挖掘和收获，变成了工业需求，而这些需求由现代性所见过的最非个人的人力资源形式提供服务。

在这些低工资的制造业地区，工作是女性化的，不是因为它涉及工厂和传统女性家庭领域之间的模糊，而是因为劳动力不成比例地由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组成:农村少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工厂劳动力池中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年轻女性也不成比例地进入了生产链另一端的自我雇佣和创造性劳动的不稳定世界，正如麦克罗比所说，她们在移动，“从劳动后备军”进入了“新劳动形式的中心地带”。第一类劳动力中的妇女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受到严格的约束，同时她们第一次有机会获得一些可支配收入，并感受到城市的自由。第二种——所谓的创意产业——的女性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和对自己生活安排的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同时她们在社交、多任务处理、以及对工作与休闲重叠的一系列社交技巧，使她们成为最适合新自由主义形式的灵活积累的理想工作者。

这些有创造力的工人在自己动手的经济中工作，在这种经济中，熟练的进入者通过拼凑不同的工作和收入来塑造自己的生计。然而，这个由定制工人组成的后工业世界并不依赖于自己缥缈的网络空间基础。就像我一样，它是捆绑在一起的

与工业化早期阶段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生产条件有关。服务于产业链两端的工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一个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另一个是资源不足的移民——但他们都有间歇性工作所带来的极端不确定性的生存条件。无论他们是在改革后监管日益薄弱的中国工作，还是在世界创意之都的温室里工作，他们都发现自己与任何社会保险的保护框架隔绝，被困在拥挤的自我空间中。

附注

1 This debate was initiated by Tiziana Terranova in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63, Vol. 18, No. 2 (summer 2000): 33–58, and it entered mainstream public discussion with the publications of Andrew Keen,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Blogs, MySpace, YouTube, and the Rest of Today's User-Generated Media are Destroying Our Economy, Our Culture, and Our Values* (New York: Crown, 2007) and Chris Anderson, *Free: 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 (New York: Hyperion, 2009). The contributors to a special issue of *ephemera* touch on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debate. See Jonathan Burston, Nick Dyer-Witheford, and Alison Hearn, eds., "Digital Labour: Workers, Authors, Citizens,"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 no. 3/4 (August 2010): 214–21, http://www.ephemeraweb.org/journal/10-3/10-3index.htm.

2 Daniel Roth, "The Answer Factory: Demand Media and the Fast, Disposable, and Profitable as Hell Media Model," *Wired*, October 19, 2009.

3 See "The AOL Way: Content, Product, Media Engineering, and Revenue Management," http://www. businessinsider. com/the-aol-way#-1.

4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1), 7, 43.

5 Quoted in Parisier, p. 21.

6 See Alison Hearn, "Structuring Feeling: Web 2.0, Online Ranking and Rating, and the Digital 'Reputation' Economy,"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0, no. 3/4 (August 2010): 421–38.

7 See Jeff Howe, *Crowdsourcing: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Crown, 2008).

8 Katharine Mieszkowski, "I Make $1.45 a Week and I Love It," *Salon*, July 24, 2006, http://www.salon.com/technology/feature/2006/07/24/turks, and Jonathan Zittrain, "Work the New Digital Sweatshops," *Newsweek*, December 8, 2009.

9 Andrew Ross, *No-Collar: The Humane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10 Melissa Gregg, *Work's Intimac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2010); Rosalind Gill, *Technobohemians or the New Cybertariat: New Media Work in Amsterdam a Decade After the Web*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007); David Hesmondhalgh and Sarah Baker, *Creative Labour: Media Work in Three Cultural Indust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ybille Reidl, Helene Schiffbanker, and Hubert Eichmann, "Creat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The Working Life of Creative Workers in

Vienna," *Work, Organization, Labour & Globalization* 1, no. 1 (2006): 48–58; D. Perrons,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Work Life Bal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Media Sector in Brighton and Hove," *Gender, Work and Organisation* 10, no. 1 (2003): 65–93; Ursula Huws, Jorg Flecker, Monique Ramioul, Karen Guerts, et al., WORKS Project, Work Organis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Leuven: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2009), http://www.worksproject.be/.

11 The literature on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cludes: Geert Lovink and Ned Rossiter, eds., *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007); John Hartley, ed., *Creative Industries* (Oxford: Blackwell, 2005); Ursula Huws, ed., "The Creative Spark in the Engine," special issue, *Work, Organization, Labour & Globalization* 1, no. 1 (2007); David Hesmondhalgh and Andy Pratt, eds.,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1, no. 1 (2005);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ndon: Sage, 2007); Mark Banks and John O'Connor, eds., Special Issue on "Afte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5, no. 4 (2009).

12 Geert Lovink and Trebor Scholz, eds., *The Art of Free Cooper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7).

13 Chad Raphae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ali-TV." *Jump Cut* 41 (1997): 102–9.

14 Robert Elisberg, "The Amazing Reality of 'Reality' TV." Huffington Post (200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obert-j-elisberg/the-amazing-reality-of-re_b_118433.html.

15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n West, *Harsh Reality: WGA Report on Standards in Reality Television* (2007), http://www.wga.org/uploadedfiles/news_and_events/press_release/harsh_reality.pdf.

16 Ross Perlin,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New York: Verso, 2011), 124.

17 Ibid., 27.

18 Michael Palm, "Phoning It In: Self-Service Tech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Consumer Labor"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10).

19 *Businessweek* articles on the strategy include Paul Boutin, "Crowdsourcing: Consumers as Creators," July 13, 2006; Jessi Hempel, "Tapping the Wisdom of the Crowd," January 18, 2007; Heather Green, "The Wisdom of the Business Crowd," September 18, 2008; Damian Joseph, "Pushing the Limits of Crowdsourcing," March 2, 2009; John Winsor, "Crowdsourcing: What It Means for Innovation," June 15, 2009.

20 Julian Kücklich, “FCJ-025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5 (2005).

21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1), chap. 13,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3. htm#p694;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eds.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133–46;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2 Michael Denning, “Wageless Life,” *New Left Review* 66 (November–December 2010).

23 Brett Neilson and Ned Rossiter, “Precarit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or Fordism as an Exception,”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5, no. 7–8 (2008): 51–72.

24 Angela McRobbie, “Reflections on Feminism, Immaterial Labour and the Post-Fordist Regime,” *New Formations* 70 (Winter 2011): 60–76.

25 Chris Lehmann, “An Accelerated Grimace,” *The Nation*, March 21, 2011, 32.

26 Frederik Balfour and Tim Culpan, “The Man Who Makes Your iPhon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September 9, 2010.

27 The one labor rights group with access to the new factories,

Hong Kong–based 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行为不端(SACOM)，报道了富士康一年后的情况
对自杀事件的初步反应，大部分是公司的承诺
关于增加工资，减少加班，改善工人
管理沟通和实习规定仍然存在
没有实现。SACOM，“富士康和苹果未能履行承诺:
自杀事件后工人的困境，2011年5月6日，
http://sacom.hk/wp-content/uploads/2011/05/
2011-05-06 _foxconnand apple-fail-tofulfill-promises1.pdf。

28安吉拉·麦克罗比，《对女权主义、非物质劳动和后福特主义政权的反思》，《*新形成》第70期*，第2期。1(2011)。

2
自由劳动

Tiziana Terranova

> 真正的非资本是劳动力。
>
> —Karl Marx, *Grundrisse*

在数字媒体行业工作从来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有趣。当然，对于那些最知名、最有价值的公司的员工来说，工作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体验，感觉一点也不像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互联网繁荣时期，同名网络杂志的“网奴”们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抱怨这份工作无耻的剥削性质、繁重的工作节奏和无情的临时工他们大谈“7天24小时的电子血汗工厂”，抱怨每周90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新媒体公司的低能管理”。”3新媒体行业的对立情绪，也影响了大批为互联网巨头运营知名网站的志愿者。1999年初，美国在线的1.5万名“志愿者”中，有7人要求劳工部调查AOL是否欠他们多年免费玩聊天主机的工资，从而撼动了信息之爱这艘船。他们过去工作时间很长，而且乐在其中;但他们也感受到了被数字媒体灼烧的痛苦。

这些事件指向了对数字劳动的美化不可避免的反弹，这凸显了它与现代血汗工厂的连续性，以及知识工作的日益退化。然而，作为熟悉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中的劳动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忽视。网奴不仅仅是互联网上一种典型的劳动形式;他们还体现了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与劳动的复杂关系。

在本章中，我把这种使互联网成为蓬勃发展和过度活跃的媒介的过度活动称为“自由劳动”——这是整个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得到承认的价值来源。通过将互联网视为自由劳动所发挥的基本作用的具体实例，本章还强调了数字经济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所称的“社会工厂”(或“societyfactory”)之间的联系。4社会工厂描述了一个过程，即“工作过程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设定

运转中的是一台真正复杂的机器。网络上的自由劳动同时是自愿给予的和无偿的，是享受的和被剥削的，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建立虚拟空间等活动。互联网远不是一个不真实的、空洞的空间，它是由文化和技术劳动彻底地激活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生产，这种价值生产完全内在于整个网络社会的流动之中。

然而，英美文化理论的近代史立即使支持这一论点变得复杂起来。在三十年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拆除工作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劳动，尤其是文化和技术劳动?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生化人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的后现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阐明了1980年代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分析的反感背后的一些原因。哈拉威明确地拒绝了理论家的人文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后者是“卓越的特权类别，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克服幻想并发现这一点。这是改变世界所必需的观点。[6]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同样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奴隶后代的劳动分析的不足的不满，他们认为艺术表达是“实现个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7]如果劳动是“使[白人]成为人的人性化活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人性化的劳动并不真正属于网络化、后人类智能的时代。

然而，哈拉威在《宣言》中所描述的“统治信息学”当然是专注于控制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其发表后的20年里，这种三角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互联网的扩张为当代的趋势提供了思想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趋势包括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持续的再培训、自由职业，以及“补充”(带来)等实践的扩散

从传统办公室带回家的补充工作广告宣传和商业手册暗示，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去中介化的场所(体现了著名的中间商之死，从书店到旅行社再到电脑商店)，而且是一种灵活的集体智慧得以形成的手段。

本章并不试图对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作出判断。我更愿意做的是绘制出互联网与自主主义社会工厂连接的方式。我将研究“外网”——纵横交错并超越互联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网络——是如何包围并连接后者与更大的劳动力、文化和权力流动的。为了理解互联网的现实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与晚期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超越网络空间是关于逃避现实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被定义为“外部”的现象有关

“经济”的理论观点(如交易成本理论)，表明“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生产要素的获取和。

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财富。[9]文化和技术工作是互联网的核心，但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活动。这种劳动并不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所独有的，而是后工业经济的普遍特征。这种生产的普遍性对生产与消费、劳动与文化之间的固定区分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也破坏了吉尔罗伊将工作区分为“奴役、苦难和从属”，将艺术表达区分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然而，生产与消费、工作与文化表达之间日益模糊的疆域，并没有标志着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重组。互联网不会自动把每一个用户变成一个活跃的生产者，把每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在自由劳动范畴内重新配置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标志着另一种价值逻辑的展开，这种逻辑的运作需要仔细分析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对上述一些过程的一种概括。作为一个术语，它似乎描述了一种一方面与后现代文化经济(媒体、大学和艺术)相交，另一方面与信息产业(信息和通信综合体)相交的形态。这种两种不同生产领域的交叉构成了对劳动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参与的挑战——与所有权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和消费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相比，劳动问题对媒体研究来说已经成为边缘问题。

在这里，我们将区分新经济——“一个承认其与互联网公司传统关联的历史时期标志”——和数字经济——一种基于数字化信息的关键特征(易于复制和低成本或零成本共享)的不那么短暂的现象。在理查德·巴布鲁克的定义中，数字经济的特点是新技术的出现(计算机

网络)和新型工人(数字工匠)的出现根据巴布鲁克的观点，数字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包括公共因素(国家对产生阿帕网的原始研究的资助，对学术活动的财政支持，在塑造互联网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驱动的因素(试图通过重新引入商品化来占有数字经济的后来者);以及礼物经济元素(资本主义生产前沿的真实表现，为其最终克服为未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做准备)。

巴布鲁克提出的是，把资本主义的未来与信息商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的愿景包含了一个基本的误解。他指出，在讨论组、邮件列表和程序员分布式学习的世界里，互联网远不只是一种销售商品的新方式。跨距离合作和无金钱交换的关系占主导地位，表明这是一种实践关系，具有可行的、可替代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 不受物理距离的限制，他们在没有金钱和政治直接中介的情况下相互合作。他们不关心版权问题，他们提供和接收信息而不考虑报酬。在没有国家或市场来调解社会纽带、网络的情况下

相反，社区是通过时间和思想的恩赐所创造的相互义务而形成的

巴布鲁克关于信息共享的观点后来被点对点、文件共享网络的爆炸式发展所强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网络现象，令音乐和电影行业奋起反抗。

巴布鲁克从马克思-黑格尔的角度出发，把高科技礼物经济看作是一个从内部克服资本主义的过程。高科技礼品经济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它既超越了新左派自己做文化的纯粹主义，也超越了自由市场理论家的新自由主义:“货币商品关系和礼品关系不仅相互冲突，而且共生共存。”[14]礼品经济的参与者并不不愿意利用市场资源和政府资助来追求自由交换的potlatch经济。然而，potlatch和经济最终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市场经济总是威胁要将礼物经济的共同飞地重新私有化。在巴布鲁克看来，商品化，即属性制度的重新定位，是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吸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策略。

这一早期尝试提供了一个思考数字经济的辩论平台，过分强调了高科技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作为互联网特征的交换过程，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前沿的重新出现，一个被压抑的他者，恰好在共产主义似乎被击败的那一刻重新浮出水面。重要的是要记住，礼品经济作为更大的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整体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免费劳动力的提供，是整个经济中价值创造的一个基本时刻——超越了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我们将明确指出，使免费劳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元素的条件是基于一个困难的、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创造性生产的文化和情感欲望(这种欲望通常与吉尔罗伊强调的“个人自我塑造和公共解放”联系在一起)与当前资本主义强调的知识作为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之间的实验性妥协。

美国在线的志愿者，网络奴隶和业余网页设计师，并不仅仅因为资本希望他们工作，而是他们表现出对情感和文化生产的渴望，尽管如此，这种渴望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是社会塑造的。支持数字经济的文化、技术和创造性工作，是由于资本的发展超越了早期的工业和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而成为可能的，因此在后福特主义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些领域尤其丰富

几十年的时间。在过度发达的国家，工厂的终结表明了旧工人阶级的过时，但它也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他们被反复称为有意义商品的积极消费者。自由劳动是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消费被转化为过剩的生产活动的时刻，这种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又经常被无耻地剥削。

管理理论也越来越关注知识工作的问题，知识工作是一种难以定义的品质，它对刺激创新和实现竞争目标的过程至关重要。例如，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新经济管理文献的经典范例《*数字经济》(The Digital Economy)中写道*，一种“基于人类智能网络化的新经济”。[15] .人类智慧提供了急需的附加价值，这对组织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然而，人类智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它不能以与更传统的劳动类型完全相同的方式管理。知识工作者需要开放的组织结构才能进行生产，因为知识的生产根植于协作;这就是巴布鲁克所定义的“礼物经济”:

> 监督管理的概念正在转变为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任何负责管理知识型员工的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被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他们往往拥有管理人员无法匹配甚至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管理层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首先通过向他们推销组织来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其次是提供创造性和开放的交流环境，使这些员工能够有效地运用和提高他们的知识

—

因此，在泰普斯科特看来，数字经济神奇地解决了工业社会的矛盾，比如阶级斗争;而在工业经济中，“工人试图通过休闲获得满足[并且]……被异化于由他人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中，工人通过工作获得满足，并在她的大脑中找到她自己的、未异化的生产资料这样的生产资料需要通过鼓励工人参与一种交换文化来培养，这种文化的流动主要保持在公司内部，但也需要涉及“外部”，即与快速发展的知识世界的联系。大会、展览和会议——支持这种普遍交流的更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公司内外网络技术的补充。虽然这些知识流动的流量需要被监控(因此，公司关心内部网的使用)，但互联网有效地发挥了一个工具的作用

channel through which human intelligence renews its capacity to produce.

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管理文献的总体炒作，同时也超越巴布鲁克的礼物经济模型的一些概念限制?在关于数字经济的辩论中，一些话语将其视为一种对立运动，而另一些话语将其视为对价值提取新机制的功能发展，我们将探讨对这种共存的一些可能的解释。经理大师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终结，与左派话语所预示的礼物经济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从“数字经济”在高级劳动形式中的排他性锚定中减去“数字经济”的标签来开始打破这种僵局(我们可以从消除它的先锋性开始)。本章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一种内部捕获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知识池的特定机制。数字经济是价值和自由文化/情感劳动实验的重要领域。它涉及特定的生产形式(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数字服务等)，但它也涉及我们没有立即意识到的劳动形式:聊天、真实故事、邮件列表、业余通讯等等。这些类型的文化和技术劳动并不是由资本主义以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方式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对资本经济需求的回答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它们的发展是与文化产业的扩张相关的，是一个从知识/文化/情感中创造货币价值的经济实验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不同于流行的左翼智慧所描述的关于整合真实文化时刻的过程:因此，它不是关于资本的坏男孩进入地下亚文化或从属文化，并将其生产的成果(风格，语言，音乐)纳入媒体食物链。这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特定文化形态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其真实阶段的终结。在合并之后，当地文化被拾取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而促成文化杂交或文化帝国主义(取决于你听的是谁)。与其说资本从外部吸收了集体想象的真实成果，不如认为文化流动起源于一个始终且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领域，这似乎更合理。合并不是资本降格到真正的文化上，而是将集体劳动(甚至作为文化劳动)引导到货币流动及其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的结构中，这是一个更内在的过程。

几十年来，亚文化运动塞满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口袋。在早期文化时刻消费的滋养下，亚文化为服装、cd、电子游戏、电影和电视广告的销售提供了外观、风格和声音。这通常是通过亚文化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

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成员(例如，音乐领域的独立厂牌，时尚领域的小型设计师商店)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参与是一种自愿的现象，尽管它经常伴随着“售罄!”集体文化劳动的成果并没有被简单地挪用，而是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被自愿地*引导*和有争议地*结构化*。在这些运动中，文化、文化产业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比合并的概念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只是这段更长的实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知识阶级与非物质劳动

尽管对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有无数或多或少虚伪的支持，但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总是有点过于紧密，让关心的政治头脑感到不安。通过指出计算机网络如何成为信息资本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核心，来抵消天真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一直是非常诱人的。在电视上做广告、由印刷媒体描绘的互联网，似乎不仅是资本不竭地寻找新市场的最新化身，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共识创造机器，它把无产阶级化的大众社会化了

知识工作者融入经济不断创新毕竟，炒作暗示，如果我们不尽快上网，我们将变得过时、不必要、可丢弃。如果我们上网，我们被承诺，我们将成为“蜂群思维”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由网络化、智能化主体组成的非物质经济，负责加快资本“不断的分支创新浪潮”的节奏。”20位多媒体艺术家、作家、记者、软件程序员、平面设计师、活动人士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它的文化精英，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化劳动的新形式因此，数字工人被描述为抵制或支持资本的计划，这往往与他们在网络化、水平化和等级化的知识工作世界中的地位直接相关。

因此，对互联网的政治潜力的任何判断，不仅与它被大肆吹嘘的允许分散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而且与谁使用互联网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有关。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要让网络的去中心化结构发挥任何作用，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它的构成人口(因此才会有关于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收入、性别和种族的没完没了的统计数据——世界上调查最多、调查最多、但却不透明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个互联网用户群体主要由知识工作者组成，那么这些人是被视为精英文化和经济权力的所有者，还是被视为不能自动保证精英地位的新劳动力配置的先锋派，这一点很重要。

谁在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误导的。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我们必须先问谁在参与数字经济，然后才能对后者做出判断。它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它暗示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一个阶级中定位知识工作者，知道它是哪个阶级，就会给我们一个关于整个网络的政治潜力的答案。如果我们能证明知识工作者是劳动的先锋派，那么网络就会成为一个抵抗的场所;22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

知识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掌握着权力，那么网络就成了中产阶级的一个扩展的封闭式社区即使承认知识工作者在等级和地位方面确实是分散的，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帮助;它仍然会导致一个简单的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网络变成了知识阶层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场域。

知识对量化的顽固抵制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知识不能被完全地限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上。尽管从工厂到办公室工作，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符合条件而有些人不符合却不清楚知识工作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范畴。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举措是，不去寻找可量化参数中的知识阶层，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上。虽然阶级的概念保留了一种物质价值，对于理解具体的历史主体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冻结了主题，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实体一样——一种元素出生时是某种元素(工人阶级的金属)，但如果经过适当的炼金术过程(教育和收入)，它可能变成另一种元素(中产阶级的硅)。这种对阶级的理解也冻结了文化和金钱的流动，而文化和金钱可以动员整个劳动力。就互联网的使用而言，它引发了我上面描述的一般化的赞同和谴责，并没有解释或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异质性和共同性。因此，我发现用意大利自主主义者，尤其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来思考会更有用。在拉扎拉托看来，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

> 一方面，就商品的“信息内容”而言，它直接指的是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其中，直接劳动所涉及的技能越来越多地涉及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水平和垂直沟通)的技能。另一方面，就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言，非物质劳动涉及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定义和固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等活动的种类。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公众舆论

与知识工作者不同，非物质劳动并不完全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形态。拉扎拉托坚持认为，这种形式的劳动力并不局限于高技能工人，而是每一个生产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

在后工业社会中。在高技能工人中，这些能力已经存在。然而，在年轻工人、“不稳定工人”和失业青年身上，这些能力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存在的，但仍未确定。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是一种虚拟性(一种未确定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后工业生产的主体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强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阻止这种虚拟性消失或被引导到当前权力结构无法接受的地方。尽管先进资本及其与结构性失业的关系存在种种矛盾，但后现代政府并不喜欢完全失业的人。工作的潜力必须保持活力，失业者必须接受持续的培训，以便作为某种后工业储备力量，既受到监控，又保持活力。也不能让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实验性的、游牧的、反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去，这种生活方式在英国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刑事司法法案》的猛烈抨击

然而，与后福特主义者不同的是，根据他的自主主义起源，拉扎拉托并不认为非物质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纯粹功能性的:

> 这种能力的虚拟性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非历史性的;相反，它是一种开放和潜力，它的历史起源和前身是福特主义工人的“反对工作的斗争”，以及在更近的时代，社会化、教育形成和文化自我增值的过程

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分散(作为一种虚拟性和现实性)使知识工人作为工业意义上的一个阶级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作为劳动力的一种集体素质，非物质劳动可以被理解为以不同程度的强度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这种强度是资本主义形态按照其利润逻辑分配价值的“通灵”过程所产生的。[28]如果知识本质上是集体的，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音乐、时尚和信息都是集体生产的，但都有选择性地得到补偿。在时尚和音乐的情况下，只有一些公司被企业分销链接走;只有少数网站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投资。然而，这是一种集体文化劳动，使这些产品成为可能，即使利润被老牌公司不成比例地挪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众所周知的“互联网物化了集体智慧”的说法并非完全不正确。互联网凸显了非物质劳动网络的存在，并加速了它们向集体实体的聚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能力就在

互联网包括写作/阅读/管理和参与邮件列表/网站/聊天等工作。这些活动不属于“抽象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将“抽象劳动”定义为为价值的生产提供时间，而不管产品的有用质量如何它们见证了一种欲望对生产的投资，这种生产主要是文化理论家在与消费有关的问题上理论化的。

在各种评论人士看来，这种生产活动的爆炸式增长被互联网人口的少数主义、性别化和种族化特征所破坏。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承认非物质劳动的存在是后工业劳动整体的一种弥散的、集体的性质，并不否认知识等级(包括技术和文化)的存在，它预先构造了(但不决定)这些活动的性质。这些等级塑造了这些虚拟成为现实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从潜在变为作为过程而被实现，构成文化、情感和技术生产的时刻。无论是资本还是活劳动，都不希望有一种永远被排除在非物质劳动可能性之外的劳动力。但这正是他们的欲望无法重合的地方。资本想要保持对这些虚拟的展开和增值过程的控制。因此，网络上相对丰富的文化/技术/情感生产并不是作为一种自由浮动的后工业乌托邦而存在的，而是与晚期资本主义充分、相互构成的相互作用。

集体思想

网络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式言论，提升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集体本质。例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提出，互联网是一个集体的“蜂群思维”。根据凯利的说法，互联网是自组织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原则在技术、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互联网是相互联系的人类思想的自组织、无限生产活动存在的物证皮埃尔·列维(Pierre Levy)从另一个角度借鉴了认知人类学和后结构主义哲学，认为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使“集体智慧”得以出现。列维受到早期计算机先驱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等人的启发，主张一种“融合并扩大自我认识和集体思想范围”的新人文主义。[31]列维认为，我们正在从基于“我想”这个单一概念的笛卡尔式思维模式过渡*到*集体的或复数的“我想”(*我们*想)模式。

> 什么是集体智慧?它是一种普遍分布的智能形式，不断增强，实时协调，并导致技能的有效动员....32 .集体智慧的基础和目标是个体的相互认可和丰富，而不是对拜物教化或物质化的社区的崇拜

和凯利一样，列维将自己的观点框定在围绕数字化的霸权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竞争和灵活性的常见修辞之中:“我们越是能够形成智能社区，作为具有主动性、想象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开放、认知主体，我们就越能够确保我们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33]在列维看来，数字经济凸显了在自动化过程中吸收智能的不可能性:与第一波控制论浪潮将工人从工厂中取代不同，计算机网络凸显了人类智能作为知识经济中真正价值创造者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由于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创造性主体性的生产，这种生产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一种人类创造潜力的新中心。

特别是在凯利的案例中，人们很容易将蜂群思维和自我组织的互联网即自由市场的概念视为互联网淘金热的言论，这些言论很快被2001年或多或少出人意料的事件(互联网泡沫破裂、互联网复兴)所摧毁

国际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从硅片工厂的有毒世界到美国在线的电子血汗工厂，在那里，技术工作被降级，工人被淘汰的现象很严重，对这种心甘情愿地忽视高科技行业工作的现实，人们很难不产生一种恼怒的感觉在2001年姗姗来迟的千年虫大爆发之后，我们怎么能在不赞同有线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目的论精神的情况下，坚持文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在网络上(包括内部和外部)是集体的观念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网络文化思想的自组织、集体智慧抓住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但在分析资本的整体运作(包括不同资本主义游说集团的共存及其与制度治理的关系)方面是有益的。毕竟，资本是集体智慧物质化的非自然环境。网络化智能的集体维度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势头的一部分。认同后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自主工人主义的意大利作家，通过关注工人在工厂之后所经历的突变，始终致力于这种关系。一个自我组织的集体智慧的概念看起来非常像他们的中心概念之一，“一般智慧”——一个自治主义者从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的精神中提取出来的概念,如果不是实际的措辞的话*。“集体智慧”或“蜂群思维”抓住了一般智力的某些精神，但却消除了自主主义者对其与资本关系的批判性理论化。

在自主主义者最喜欢的文本*《政治批判》中*，尤其是在《机器片段》中，马克思认为(正如保罗·维尔诺所总结的)

> 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但不是唯一的科学知识——恰恰由于其与生产的自主性，倾向于成为不亚于主要生产力的东西，从而将重复的和划分的劳动降格到剩余的位置。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知识，它已化身为机器的自动系统

—

*《政治批判*大纲》中的“另一个”马克思(被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对*《资本论》更正统认可的社会运动所采用),在《片段》生动的篇章中*，将工业机器系统描述为一个由金属和肉体组成的可怕怪物:

> 生产过程已经不再是一个劳动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劳动作为其统治统一体所支配的过程。相反，劳动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器官，分散在无数的个体活工人中间

机械系统要点;被纳入机器本身的整个过程之下，而机器本身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统一性不存在于活的工人身上，而存在于活的(活动的)机器中，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强大的有机体，面对着工人个人的、微不足道的行为 —

意大利自主主义者从这些书页中提取了一般智力的概念，认为它是“知识的集合……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中心”。[37]然而，与马克思的原始表述不同，自主主义者避开了将一般智力视为地狱机器的现代主义形象。他们声称，马克思完全将一般智力(或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与固定资本(机器)统一起来，从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智力不能独立于具体主体而存在，而具体主体是机器之间相互衔接的中介。一般智力是固定资本(机器)*和*活劳动(工人)的接合。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和一般的计算机网络看作是最新的机器——固定资本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么不难想象，一般智力在今天依然存在。

然而，自主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将一般智力描述为人类和机器在后工业生产核心的组合。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金属和肉体怪物就会升级为一个跨越世界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计算机利用人类作为一种方式，让机器系统(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描述的视觉力量被赛博朋克对黑客一动不动的身体的快照所更新，电极像脐带一样将他们连接到矩阵，是一个活生生的、全能的网络空间的附录。除了特效带来的丰厚收益，《黑客帝国》系列的票房成功也验证了对这种变异的偏执解读的受欢迎程度。

对于这种描述中隐含的人文主义，自主主义者反对大众智性的概念，反对活劳动作为一般智性的决定性表达的功能。大众智性——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是活生生的主体及其语言合作的不可分割的知识的储存库....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储存在机器中，但是……它必须作为劳动力的直接相互作用而产生。38正如维尔诺所强调的，大众智性不是关于知识工作者的各种角色，而是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一种“品质和独特标志”。”39

在管理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智慧可以被看作是对信息社会中劳动质量的共同直觉的结果。知识劳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它永远是集体和社会生产的结果

—

—

40 .知识资本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个丰富而又有点棘手的领域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价值(用自主主义者的行话来说，就是“使之增值”)。

因此，集体知识工作不是关于那些在知识产业中工作的人。但它也与就业无关。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并没有阻止互联网内容的增长，也没有阻止互联网技术的突变。承认劳动的集体方面意味着拒绝劳动和就业之间的等同，马克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女权主义和后葛兰西自治主义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劳动并不等同于雇佣劳动。这样的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拒绝一些关于失业的丑恶说辞，这些说辞把失业的人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国家政府施恩于人、推动和推动的对象。(接受任何可以找到的工作，否则……)通常失业者只是名义上的失业者，实际上他们是经济困难的命脉，从事着报酬微薄的幕后工作，其中一些还进入了新媒体行业强调劳动不等于就业，也意味着承认自由的情感劳动和文化劳动对新老媒体产业的重要性。

《短暂商品与自由劳动》

就其与文化和情感劳动的关系而言，旧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这种连续性似乎在于它们对公众/用户作为生产主体的共同依赖。两者的区别既在于生产方式，也在于权力/知识在两种类型中的运作方式。尽管各国的历史不同(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强调公共服务)，但以电视行业为例，它是相对保守的:编剧、制片人、表演者、经理和技术人员在这个仍由少数老牌参与者经营的行业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电视作为一种构建国家身份的技术，其历史遗产也意味着，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比新闻媒体更需要承担公众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旧媒体不汲取自由劳动。相反，以电视和平面媒体为例，它们充分利用了受众/读者的免费劳动，但它们也倾向于将后者的贡献结构得严格得多，无论是在经济组织方面还是在道德判断方面。所有这些真实生活电视体验的代价通常是一剂沉重的道德危言耸听:罪犯在高速公路上横行，必须由严厉的警察行动来制止;狂野的青少年缺乏自尊，需要严厉的爱;自私和两面派的电视真人秀选手最终会得到报应。如果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互联网上，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不是它的辩护者所宣称的那种分散、分散、令人愉悦的文化生产的乐岛呢?

对于这类问题，最明显的答案来自于早期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将其归咎于互联网的商业化。人们指责电子商务和渐进式私有化破坏了互联网的自由经济，这种交换经济被理查德·巴布鲁克描述为礼物经济的确，也许因特网本来可以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地方。然而，几乎不可想象的是，资本主义能够永远置身于网络之外，而网络是资本主义自身组织结构的根本沟通方式。

资本和互联网之间的明确接口的结果是数字经济，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加速的所有迹象。也许互联网还没有稳定下来，但似乎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最快、最明显的生产区域。新产品和新趋势以一种令人焦虑的速度相互接替。毕竟，这是一个你需要每年更换设备/知识，甚至可能是员工的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经济的速度，它加速的过时节奏，以及它对(大部分)非物质产品的依赖，似乎符合后现代关于商品地位变化的直觉，这些商品的本质被认为是意义(或缺乏)而不是劳动(好像两者可以分开)因此，反复出现的关于互联网导致现实消失的抱怨，*既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也是基于对重组商品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超现实证实了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的人文主义噩梦，这是对再现领域的进步接管的高潮。网络上的商品不是物质性的，相对于现实社会需求的极限来说，是过度的(商品太多，网站太多，杂乱和噪音太多)。

然而，有可能的是，商品的消失不是物质的消失，而是它对其背后的劳动质量的可见的从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本身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变得越来越短暂，持续时间被压缩，它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成品。持续的、创造性的、创新性的劳动作为市场价值的基础，其作用对数字经济至关重要。价值增值的过程(货币价值的生产)是通过突出劳动的质量来实现的，而劳动的质量才是商品真正的生命力。

因此，数字经济挑战了后现代的假设，即劳动消失了，而商品占据并消解了所有意义。特别是，互联网突出了从持续的、可更新的工作中提取价值，而且它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光产生一个好的网站是不够的;你需要不断地更新它，以保持人们对它的兴趣，并抵制过时。此外，你需要可更新的设备(一般的智力永远是人类和他们的机器的组合)，而这些设备反过来又由程序员、设计师和工人的密集集体劳动推动。这就好像生产的加速已经推动到了商品，字面上，变成半透明的物体的地步。商品与其说是消失了，不如说是变得更加透明了，这表明它们始终依赖于生产和维持它们的劳动。通过一个成功的网站显示出来的是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劳动，也是这种劳动改变产品的奇观，让用户不断回头客。因此，商品的好坏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因此，互联网作为媒介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正如我们所说，这并不等同于就业)，只有一部分劳动力被风险资本主义反复无常的逻辑所过度补偿。在维持整个互联网的不可思议的大量劳动力中(从邮件列表流量到网站再到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免费劳动力。

然而，自由劳动并不一定是被剥削的劳动。在早期的虚拟社区中，我们被告知，劳动确实是免费的:建立一个社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它是免费的，没有报酬的)，但它也被心甘情愿地让步，以换取交流和交换的乐趣(因此，它是免费的，愉快的，而不是强加的)。为了回应会员的要求，信息被迅速发布和分享，缺乏调解，这一点早期的网民们并没有不欣赏。[46] .霍华德·莱茵戈尔德的书，虽然被不公平地指责为中产阶级的自满，却是对旧互联网美好时光的最著名的描述，那时网络游客还没有战胜网络先驱者

数字文学的许多不同部分都承认支撑着互联网的免费劳动。尽管互联网经济具有不稳定的本质(昨天是关于社区的，今天是关于门户网站的，明天谁知道呢……?)，但用户劳动的概念保持着一种意识形态和物质的中心地位，在互联网时尚的动荡更替中始终如一。像霍华德·莱茵戈尔德和理查德·哈德森这样通常持不同意见的评论者，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最好的网站，在网络上保持可见性和繁荣的最好方法，是把你的网站变成一个不仅供用户访问，而且以某种方式由用户建立的空间用户通过他们的劳动，通过访问网站(从而产生广告)、撰写信息、参与对话，有时跳转到合作者的累积时间，使网站保持活力。在维持AOL运行的15000名志愿者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它，而其他人则留下来。这种特性似乎是互联网特有的，可以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加以利用，但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依赖于互联网修补匠免费劳动的“开源”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数字经济内部的这种结构性趋势。

与邮件列表和网站相比，用户的劳动在开源运动中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是互联网辩论的一个有趣特征(也是其男性化偏见的证据)。这暴露了数字经济中对男性劳动理解的执着:编写操作系统比美国在线(AOL)的免费聊天更值得关注。尽管在1996年志愿服务最活跃的时候，有3万多名“社区领袖”在帮助AOL每月至少创造7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如此，开源运动还是比上面描述的更分散的用户劳动吸引了更多的积极关注。由于它所引发的争论以及它与整个数字经济的关系，它值得探索。

开源运动是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的旧传统的一种变体，它对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免费软件是免费分发的，甚至不要求用户付费。共享软件是分发的

免费，但用户有道德义务向生产者支付一小笔钱，以维持共享软件运动，作为微软等巨头受版权保护软件的另一种经济模式。“开源”指的是一种软件开发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程序的底层代码——源代码，也就是皇冠上的宝石——根据定义可以免费提供给公众，供其修改、更改和无休止的再分发。[49]

开源运动远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少数人主义的实践，它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金融界的关注。1999年，开源web服务器Apache成为了超过一半的可公开访问的web服务器的“web服务器程序选择”。[50]从那时起，它已经扩展到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整个中国最近都宣布切换到Apache。风险投资家们焦急地参加着开放源代码大会，他们被数字专家告知，开放源代码是必须的，“因为你必须开放源代码才能获得开放源代码开发社区的好处——近乎即时的错误修复，网络的分布式智力资源，越来越大的开源代码库。像Cygnus这样的开放源代码公司让市场相信，你不需要对源代码拥有所有权来盈利:代码可能是免费的，但技术支持、打包、安装软件、定期升级、办公应用程序和硬件则不是。

1998年，当网景开放源代码，并邀请计算机修补匠和业余爱好者查看其新浏览器的代码，修复错误，改进软件包，并重新发布它时，专门的邮件列表就其影响交换了意见网景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关于数字经济特殊性的争论。它是否应该被解读为互联网礼物经济的传统?还是数字资本劫持了开源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传统?理查德·巴布鲁克称赞网景公司的举动，认为这标志着网络媒体架构中固有的力量然而，约翰·霍瓦特(John Horvarth)等其他人却不这么乐观。他认为，网络上提供的“免费东西”，

> 要么是一种让你对另一种产品上瘾的产品，要么是让你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的产品。毕竟，接入人员和电信公司的目标是让用户花尽可能多的时间上网，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让你消耗带宽

霍瓦特并没有证明互联网礼物经济的持久性，而是声称网景的举动直接威胁到了那些独立的生产者，对他们来说，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正是那些网景所代表的“大男孩”的生存方式。

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是小生产者(其中许多是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大男孩的推土机效应的手段。而现在，这些推土机正径直向这个领域冲来。至于网刮网(原文如此)，这样的举动在商业上很有意义，但也给软件开发领域的工人带来了麻烦。该公司1997年第四季度业绩不佳，已经在暗示裁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让免费软件人员进一步开发你的产品、让代码爱好者修复和进一步开发你的产品更好的裁员方式呢?网景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驯服免费软件这头猛兽，以确保利润

虽然把网景裁员的证据与巴布鲁克的礼物经济的乐观主义对立起来是很诱人的，但也许有更有成效的方式来看待像开源这样的理想主义运动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和当前对开源公司的风险投资狂热开源问题并没有代表一个融合了之前真实时刻的时刻，而是表明了数字经济本身对自由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无论是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意义上，还是在自愿付出的意义上。这包括美国在线的社区领袖、开源程序员、业余网页设计师、邮件列表编辑，以及为了数字工作的兴奋和不确定的承诺而愿意“为卡布奇诺咖啡而工作”的网络奴隶

这种依赖，几乎是一种依赖，是资本主义榨取价值的更大机制的一部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不是在资本之外创造出来，然后被资本重新占用，而是一段复杂历史的结果，在这段历史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构成的，相互纠缠的，并且在福特主义危机期间至关重要地形成了。自由劳动是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种劳动欲望，晚期资本主义是既维持自由劳动又使其枯竭的场域。它通过有选择地但广泛地减少劳动可以自我复制的手段来耗尽它: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倦怠综合症到整个文化经济中的报应不足和剥削。晚期资本主义没有占有任何东西:它培育、剥削并耗尽了它的劳动力及其文化和情感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技术上讲，不可能将网络的数字经济与后期资本主义的更大的网络经济泾渭分明地分开。特别是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一直同时是一种礼物经济*和*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以*Wired*集团为例)，是把这种共存误认为是一种良性的、毫无问题的等同。

如前所述，这些过程远不局限于数字经济中最自觉的劳动者。它们是一种弥漫的文化经济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互联网及其他领域。从互联网的先锋时代到它的创业和衰退时代，这段时间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些机制，只是强化了它们。这一点在万维网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网与集

1999年冬天，《连线》*(Wired)*杂志宣布，仅仅过了5年，旧的网络已经死亡，这听起来像是它又一次响亮而短暂的声明:

> 旧网络是那些失业的、爱做梦的、反传统的人去重塑自我....的地方新网络不是要涉足你不知道的和失败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地为电视和网络内容通过相同的数字网络传送的那一天做准备

新网络由大公司组成，但也有让观众工作的新方法。在新网络中，经过先锋性的日子，电视和网络汇聚在一个共同点上:它们都依赖观众/用户作为文化劳动的提供者，这些文化劳动被贴上了“真实故事”的标签。网络媒体公司*Oxygen*的高管格里·雷伯恩(Gerry Laybourne)想到了一个名为《*他们在想什么*?》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品喜剧，改编自网上发布的故事，因为“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59]拜耳还补充道，“在它被制作出来之前，很难看出这一概念与被格里(Gerry)嗤之以鼻的更幼稚的*电影(比如《美国*最有趣》)之间的界限。”[60]

*美国最有趣*节目的幼稚内容与基于用户的内容之间的区别，似乎不在于新网络更严肃的本质，而在于电视真人秀和真人秀节目的低俗输出。从抽象的角度来看，真人秀依赖于观众创造力的方式与网站依赖于用户输入的方式并没有区别。与其他电视节目相比，人物类节目对观众和自愿参与者的活跃程度(即使是在最令人震惊的丑闻中)的依赖程度要大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他们从后现代文化经济中最不情愿的成员身上创造出货币价值:那些不能产生适销风格的人，那些没有资格进入知识经济的快节奏世界的人，通过他们表演苦难的能力，被转化为货币价值。

与互联网上的文化和情感生产相比，人物秀似乎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制作和发行这类节目的媒体集团)与其劳动力——不发达的北方那些被欺骗的、功能失调的公民——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系逻辑。在真人秀和TV中，观众作为劳动和奇观的价值增值总是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不允许*即时*的权力/知识联系中

脱口秀参与者的价值化:你不能让一个Jerry b施普林格的嘉宾在TV上独自讲述她的故事，而不经过任何调解(的确，这看起来太像公共服务广播的名誉受损的访问时段了)。没有真正的24/ 7的现实TV，但选择性编辑水平的增加和减少(根据从地面到数字TV和互联网的通信频谱的不同模式)。以谈话节目为例，不同层次的知识介入嘉宾和价值化装置之间，通过道德或治疗话语和更传统的制度性生产组织使功能失调的主体正常化。所以在演出结束后，嘉宾必须受到观众和主持人的劝导、光顾、质疑，并经常受到欺凌，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敷衍的、正常化的道德为名。在真人秀电视节目中，心理学家和其他专家也会被请来，提供权威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往往纯粹是偷窥的体验，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实验。

TV节目也属于另一种规模经济:尽管它们越来越多，但与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页面相比，它们仍然相对较少。就好像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组织，并没有让他们把人们的制作变成纯粹的货币价值。TV节目必须有道德，即使这些道德被其主题的过度表演所打破。

然而，在互联网中，这种引导和裁决(责任、义务和权利)的过程是分散的，以至于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虐恋、兽交、恋物癖和普通的书呆子主义不是目标，至少在互联网中，作为需要纪律约束或解释的网站)。因此，真人秀与成功网站的质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的民主倾向与前者的剥削性质相对。而是在于，在人展内部，多数主义话语机制的属地化运作，是一种道德的应用，而互联网上过度丰富的材料使这种道德变得多余，甚至不相干。数字经济对道德的关心只是切切切切的。它真正关心的是生产的丰富，与文化和技术劳动的直接接触，其结果是弥漫的、非辩证的对抗，以及资本主义增值模式本身的危机。

新结论:自由劳动的解放2012年2月

《自由劳动》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一个关于互联网未来的资助研究项目的成果，并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2000年代中期进行了部分重写。它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主张，互联网的未来将由用户积极参与的中心地位来驱动。第二个命题认为，这样的过程可以通过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工厂的命题以及非物质劳动和社会工厂的并行概念来有效地解释。今天，在长期的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普遍放缓或衰退的过程中，社交网络的数字经济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宇宙，因为用户数量呈指数级增长，web 2.0巨头的利润和市场价值是普遍低迷的经济气候的例外。这类公司的价值取决于用户的参与，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常识。创造这类公司价值的劳动力构成表明，与实际有偿劳动力的极小比例相比，自由劳动力存在大量过剩。此外，志愿工作、无偿工作、低薪工作以及富人与其他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已成为当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如何理解原文中提出的另一个论点，即这种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劳动形式，而且这种劳动正在被剥削?

将用户参与数字经济称为劳动，与其说是对一种无可争议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经验性描述，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认同自主主义者关于社会工厂的论点，意味着拒绝消费与生产的分离，并因此主张价值的生产不能再局限于有偿工作的空间和时间。这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中，为完成工作而支付的工资不再被认为是分配社会产生的财富的适当方式。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围内，活劳动受到双重剥削。除了在有偿数字工作领域明显可见的日益增加的剥削(自主性的减少和生产率的降低)，我们还必须增加一种新的剥削——涉及文化和技术生产的非物质公地。这种剥削必须以不同于有偿工作的剥削的概念来定义。它意味着对自由劳动所产生的财富的私有化，其表现形式是潜在使用者对这种劳动成果的占有的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可以从单边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对用户互动产生的财富的占有和积累(包括成为公司属性的个人数据，以及分享、发布、链接、评论、等)，也体现在参与数字经济的实际质量上，这些数字经济受到网络巨头对社交网络平台技术配置的单方面控制的制约。由于这种剥夺的机制显然嵌入了使整个社会陷入贫困的金融化形式，要求解放自由劳动力意味着要求两件事:这样的利润应该归还给那些实际生产它们的人——也就是说，归还给活劳动——社交网络平台应该去私有化——也就是说，用户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归还给他们的合法所有者，作为访问和修改结构他们参与的协议和图表的自由。

这些看似简单的结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像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所说的那样，让免费劳动力获得它所产生的财富，并不意味着要向用户单独付费。既然自由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是社会性的，那么它的回报模式也应该是社会性的。这意味着将这些财富投资于共同性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投资于新的福利形式(从基本保障收入制度到住房、医疗、教育、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更大投资)。这意味着不仅在数字经济的特定领域内，而且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与当前紧缩、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权利以及极端竞争的趋势背道而驰。谁是应该进行这种斗争以扭转进一步贫困和剥削趋势的主体?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通道在哪里?

当前条件的模糊性隐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在那些今天完全私有化并嵌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交媒体技术的背景下，可以完成这种过渡的手段(匿名者可能例外)。正是在这些媒体中，我们目睹了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形成，这些运动与其说质疑社交媒体使用的具体领域，不如说是质疑支持它们的整体经济结构。“阿拉伯之春”和“集会与占领”运动是这一趋势的两个明显例子，但在过去十年中，无数的倡议和斗争将网络、广场和街道聚集在一起，也是如此。目前尚不清楚，这样的斗争是否能设法积累足够的社会能量，不仅能扭转当前的趋势，还能产生自己的结构和政治理性，这才是真正替代不可替代的专制。然而，自由劳动的解放，不能有更少的要求。

备注

This essay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research carried ou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Virtual Society? program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grant number L132251050). I shared this grant with Sally Wyatt and Graham Thomas,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The chapter has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Social Text* 18, no. 2 (2000): 33–5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uke University Press.

1 See Andrew Ross's ethnography of New York City digital design company Razorfish, *No Collar: The Humane Workplace and Its Hidden Cost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2 See http://www.netslaves.com. And also Bill Lessard and Steve Baldwin's playful classification of the dot-com labor hierarchies in *Netslaves: True Tales of Working the Web*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3 Lisa Margonelli, "Inside AOL's 'Cyber-Sweatshop,'" *Wired,* October 1999, 138.

4 See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and Toni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and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5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6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159.

7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1993), 40.

8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395.

9 Antonio Negri, *Guide. Cinque lezioni su Impero e dintorni* (Milan: Raffaello Cortina, 2003), 209 (my translation).

10 In discussing these developments, I will also draw on debates circulating across Internet sites such as, for example, nettime, telepolis, rhizome, and c-theory. Online debates are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surplus value engender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 hyperproduction that can only be partly reabsorbed by capital.

11 **Ross, *No Collar*, 9。**

12 See Richard Barbrook, "The Digital Economy," nettime, June 17, 1997, http://www.nettime.org; Richard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in *Readme! Filtered by Nettime: ASCII Culture and the Revenge of Knowledge*, eds. Josephine Bosma et al.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99), 132–8. Also see Anonymous, "The Digital Artisan Manifesto," nettime, May 15, 1997; and Andrew Ross's argument in *No Collar* that the digital artisan was an expression of a short-lived phase in the Internet labor market corresponding to a temporary shortage of skills that initially prevented a more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13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135.

14 Ibid., 137.

15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xiii.

16 Ibid., 35 (emphasis added).

17 Ibid., 48.

1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independent music industry and its relation to corporate culture, see David Hesmondalgh, "Indie: The Aesthetics and I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a Popular Music Genre," *Cultural Studies* 13 (January 1999): 34–61. Angela McRobbie has also studied a similar phenomenon in the fashion and design industry in *British Fashion Design: Rag Trade or Image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1998).

19 See the challenging section on work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Bosma et al., *Readme!*

20 Martin Kenney, "Value-Cre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 Worker," in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eds. Jim Davis, Thomas Hirsch, and Michael Stack (London: Verso, 1997), 93; also see in the same anthology Tessa Morris-Suzuki, "Capitalism in the Computer Age," 57–71.

21 See Darko Suvin, "On Gibson and Cyberpunk SF," in *Storming the Reality Studio*, ed. Larry McCaffery (London: Durham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9–65; and Stanley Aronowitz and William DiFazio, *The Jobless Future: SciTech and the Dogma of Work*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According to Andrew Cl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were introduced as extensions of Taylorist techniqu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middle-level, rather than clerical, employees. Such technologies responded to a managerial need for efficient ways to manage intellectual labor. Clement, however, seems to connect this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the workstation,

while he is ready to admit that personal computers introduce an element of autonomy much disliked by management. See Andrew Clement, "Office Automation and the Technical Control of Information Worker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eds. Vincent Mosco and Janet Wasko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22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23 See Kevin Robins, "Cyberspace or the World We Live In," in *Fractal Media: New Media in Social Context*, ed. Jon Dove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6).

24 See Frank Webster,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25 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s.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for the Polygraph Coll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6), 133.

26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CJA) was popularly perceived as an antirave legislation, and most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it was organized around the "right to party." However, the most devastating effects of the CJA have struck the neotribal, nomadic camps, basically decimated or forced to move to Ireland in the process. See Andrea Natella and Serena Tinari, eds., *Rave Off* (Rome: Castelvecchi, 1996).

27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136.

28 In the two volumes of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described the process by which capital unsettles and resettles bodies and cultures as a movement of "decoding" ruled by "axiomatization." Decoding i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older cultural limits are displaced and removed, as with older, local cultures during modernization; the flows of culture and capital unleashed by the decoding are then channeled into a process of axiomatization, an abstract moment of conversion into money and profit. The decoding for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have then opened up the possibilities of immaterial labor. Se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4); and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1988).

29 See Franco Berardi (Bifo), *La nefasta utopia di potere operaio* (Rome: Castelvecchi/DeriveApprodi, 1998), 43.

30 See Kevin Kelly, *Out of Control*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4).

31 Eugene Provenzo, foreword to Pierre 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Mankind's Emerging World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lenum, 1995), viii.

32 Levy,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13.

33 Ibid., 1.

34 See Little Red Henski, "Insider Report from UUNET," in Bosma et al., *Readme!* 189–91.

35 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Makdisi, Casarino, and Karl, *Marxism beyond Marxism,* 266.

36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693.

37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266.

38 Ibid., 270.

39 Ibid., 271.

40 See Maurizio Lazzarato,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in Bosma et al., *Readme!* 159–66; and Tessa Morris-Suzuki, "Robots and Capitalism," in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13–27. n.p.: Verso, 1998.

41 See Toni Negri, "Back to the Future," in Bosma et al., *Readme!* 181–6; and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42 Andrew Ross, *Real Love: In Pursuit of Cultur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8).

43 See Barbrook, "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

44 The work of Jean-François Lyotard in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knowledge* rather than intellectual labor but still provides a useful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labor within the productive structures of late capitalism. See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45 See Arthur Kroker and Michael A. Weinstein, *Data Trash: The Theory of the Virtual Cla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46 See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4).

参见Howard Rheingold, “我的电子思维经验”, 见Bosma et al., *Readme!*147-50;还有David Hudson, *Rewired: A Brief (and Opinionated) Net History*(印第安纳波利斯:Macmillan Technical Publishing, 1997)。网络的扩张是基于不同类型的生产者采用不同的创收策略:有些可能会使用更传统的财政支持类型(赠款、公共部门的部门、传统媒体公司内部的互联网部门、企业的网页,这些都是与传统形式的广告一样付费的);有些人可能会对一个人的网页产生兴趣,然后出售用户的个人资料或广告空间(自由网络制作);还有一些可能会采用创新的增值策略,比如各种类型的电子商务。

48参见Margonelli, 《美国在线的‘网络血汗工厂’内幕》。

49 Andrew Leonard, “Open Season”, *Wired, 1999年5月*, 第140页。开源可以追溯到1994年以前互联网用户具身的特定能力。当大多数网络用户都是计算机专家时,媒体的软件结构是通过不同技术技能的持续互动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传统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等机构中仍然存在,该机构负责有关网络技术基础设施的许多重要决策。虽然IETF隶属于一些专业委员会,但它有重要的责任,并向任何想加入的人开放。自由软件运动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最近它也被自由软件或“copyleft”运动与开源运动之间的争论所分裂,开源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务实的尝试,让自由软件成为一种商业主张。可在http://www.gnu.org和http://www.salonmag.com查看在线辩论。

50伦纳德, “开放赛季”。

51同上, 142。

事实上,如果你想在以后获得利益,你可能不得不放弃你的产品,这是计算机行业的一种既定模式。正如约翰·佩里·巴洛所说:“熟悉度是信息世界的一项重要资产。通常情况下,你能做的提高产品需求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它送出去。”参见约翰·佩里·巴洛, 《卖酒不用瓶子:全球*网络*上的思维经济》, 《*电子前沿的正午*:网络空间的*概念问题*》, 彼得·勒德洛主编(剑桥, 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96年)。

53网络的技术和社会结构是为了鼓励参与者之间的开放合作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项日常活动,用户正在共同建立这个系统。从事互动创意,他们发送

发电子邮件，加入电子邮件列表，为新闻组撰稿，参加在线会议，创建网站。由于没有版权保护，信息可以自由地改编以适应用户的需要。在高科技礼品经济中，人们通过“一个涉及评价、比较和协作的开放社会过程”成功地协同工作(Barbrook，“the high-tech gift economy”，135-6)。

54 John Horvarth，“免费软件资本主义”，nettime, 1998年2月5日。

55同上。

56网景和许多其他计算机公司一样，其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是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室万维网结构最初研究小组的一员。和许多成功的计算机企业家一样，他开发了浏览器，将其作为最初的国家资助研究的一个分支，并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网景也是第一家超越计算机工业经济进程的公司，因为它是第一家在网络上开店的成功公司。就其本身而言，网景体现了计算机行业在网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并为评估有关数字经济的一些常见主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57 **Ross, *Real Love*。**

58 Chip Bayers，“Push Comes to Show，” *Wired*, February 1999, 113.

59 Ibid.，
156.

60 Ibid.

3
《大都会的政治经济学》

肖恩·库比特

论政治经济学

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必须想象，因为这是阻止它被计划的一种方式。米歇尔·福柯(2007)提出，自由市场完全依赖于对属性、合同、货币和法律的不自由的监管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将政治重新引入经济开始。古典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卢梭——认为政治是政治动物的一种自然状态。而ranci<e:1>(1999)则相反，认为政治根本就不是自然的。自然状态可能倾向于将力量、性别和年龄等自然属性作为标准，但当这些“自然”等级受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挑战时，政治就开始了。他认为，政治就是在政治舞台上围绕包容性展开的斗争。在古代，工匠和现代，无地者、奴隶、囚犯和妇女被统治，没有统治的可能。今天对移民和难民的排斥，在他们没有发言权的强制行动的统治下(Abizadeh 2008)，定义了政治。正如阿伦特(Arendt, 1978)所言，这种排斥将被证明是战后人权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ranci<e:1>在引用阿甘本时所说，

> 要么人的权利是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有权利的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同义反复;或者公民的权利就是人的权利。但既然赤裸裸的人性没有权利，那么它们就是那些没有权利的人的权利，这是荒谬的。(rancire 2006: 61)

更具体地说，穷人可能有拥有属性的权利，但没有属性可拥有——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利但没有财产。然而，ranci<e:1>不同意认为民主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分析。相反，他认为这是政治的基础。

这就是民主进程所暗示的:主体的行动，他们通过处理身份之间的间隔，重新配置公共与私人、普遍与特殊的分配。民主永远不能等同于普遍的简单统治(ranci<e:1> 2006: 61-2)。

政治是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政治的主体，谁统治，客体，谁被统治。当一个政治对象要求成为一个主体时，民主就产生于这种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民主的假定的普遍主体从来不是普遍的，因为政府总是意味着人民、倾向的政府，而不是被认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对象的政府。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

人——在那些有权利的人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之间——产生了对承认、参与以及对现有政体的变革的需求。

ranci的兴趣是政治上的，但类似的经济排斥出现在劳动理论家Hernando de索托(2000)的分析中。德索托同意福柯的观点，即财富的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的引擎。相反，正是属性、合同、契约、产权，以及(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的)知识属性制度等基础设施共同推动着资本体系。这种基础设施排除了不能货币化的财富形式——劳动和属性。穷人的财富尤其被排除在外: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家务劳动、自给农业以及土著和共同所有制。货币化资本和德索托所说的“死资本”之间的区别在于，可以货币化的资本是不可转让的;它是可转让的、可移动的、可流动的，因此也是可转化的。德索托认为，如果我们把死劳动算进去，世界上的穷人实际上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

德索托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由于许多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但请参阅Clastres 1987和Barclay 2005)，这不仅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而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然而，这种市场解决方案可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断推动资本进入新的生活领域的市场化，每一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同样的趋势，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公共利益和全球生态的私有化中所看到的。市场解决方案不太可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阶段的资本是否具有可持续的流动性、流动性和变革性，足以适应新财富模式的突发性，并将其转化为可货币化的流动——转化为货币。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前，网络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知道的最长寿的临时自治区之一。资本未能理解这一点。尽管亚马逊和eBay等早期的试验者先于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中幸存下来，但直到2001年之后的几年，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从杂志出版和广播行业引进的商业模式，才开始主导这种新媒体。这似乎证明了资本殖民任何新公共产品的能力。

在马克思*《政治批判大纲》*(1973:690ff.)中的“机器片段”中，“社会的”或“一般的智力”表现为两个过程。其一，几代人发展起来的手工技能被僵化为机器，变成了剥削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使工人的自我组织系统化。但是，正如维尔诺在《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ple, 2004)中所言，这种创造新制度的创新力量不再是雇佣工人的附带利益;它被写进了我们的合同中。有了商业化的社交网络，资本终于成功地将颠覆转化为利润。互联网之战尚未结束，但在编解码器、HTML5等关键战略战术领域

和Ipv6方面，资本正在取得胜利。这是新自由主义民主普遍化的证据，还是一种新政治存在的理由?

如果有依据，网络传播将提供这些依据。网络既不是失重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它积累了对所有非货币化领域中最重要的债务:全球环境。仅服务器行业的碳足迹就已经超过了航空业(Boccaletti, Löffler, and Oppenheim 2006)。智能服务器的设计和能源产生和输送方面的创新是部分解决方案，但事实仍然存在:在材料的提取、制造、分销和零售、使用和回收方面，对计算机中介的通信存在环境成本。定义民主并为信息资本提供其核心资源的排他性并不仅仅是人类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注意到自然世界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Latour 2004);我们无法想象给环境，或者给机器投票。但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把选票投给工匠或奴隶、妇女、黑人、仆人、无地农民、青年、殖民地或土著人民，今天我们也无法想象把选票投给移民。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将这些其他人同化到一个不变的体系中。这个体系必须彻底改变，因为它向生态圈现在不断的要求开放其政治生活。

环境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行为改变的问题——消费的新标准，从根本上说是道德而不是政治。就像在职业规范实践中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被视为行为准则。这些表面上的道德规范并没有为行动提供共同的基础——*“伦理”一词的根本含义——而是*为顺利运作提供规则。它们是自我复制的系统，远不要求对善、美好生活的承诺，也不要求对他人的无限要求，而是确保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这就是德里达挑战的要点:

> 例如，如果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的因果是什么，我所做的事情的纲领是什么，那么就不存在决定;这是一个问题，在做出判断的那一刻，应用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我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就不存在做决定的时刻，只需要应用一套知识，或者至少是一个规则或规范。要有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就必须与知识本身是异质的。(德里达2001:231-2)

因此，唯一真正的行为就是打破规则。但既然规则是从共识中产生的，那么打破规则就是不道德的。唯一的选择是服从还是邪恶——我们从阿伦特那里知道，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服从本身可能就是邪恶。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与行动相对立的伦理学，伦理学作为政治的被排除的他者，被定义为行动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埃斯波西托得出的令人震惊的结论:“不仅如此

在邪恶和政治之间没有原则上的矛盾，但邪恶，从某种角度来看，总是政治性的”(埃斯波西托1993:183)。

因此，新策略的演变依赖于摆脱作为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如果要为行动提供依据，就必须考虑每一种情况的独特性。考虑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发现自己所处位置的结果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与应用规则或模拟可能的未来情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考虑实际情况时，应该找出它的独特之处:规则手册中没有预见到的、没有考虑到的东西。正是基于形势中这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将给定的世界转变为潜在的世界。管理可能性的地形将我们从行动中排除(de Carolis 1996)，揭示了它的矛盾。偶然性和概率性世界的给定性成为带来真正新情况的面向未来的能力。

人群

最能表达这种新的、后个体状态的实体就是群体。它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它是概率性的，不是在统计管理的意义上，而是在虚拟的意义上;人群是一个需求的器官，它从来都不是完整的、普遍的或完整的——也就是说，它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整体存在(换句话说，不确定性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因此也是一种武装号召)，而是把自己投入到行动中，把实际存在的东西转化为未来的原材料。但是，新的群体也是资本最新的殖民化——众包的目标。社交网络将劳动的天赋商业化，不是作为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偏离平均水平的异常，可以被解读为趋势，因此既被统治，也被剥削。因此，群体的虚拟本质，即其行动的潜力或力量，被一个预测人群中有多少偏差是可以容忍的——和有利可图的——过程所消除。这可能确实是罗西特和泽勒在本卷中所说的“超越可行动的政治”过程的现实。学科同一性不再产生资本无止境扩张所必需的不可预见的行为。Facebook对友谊的资本化是一个新的轨迹，与此平行的是，在O3b (http://www.o3bnetworks.com)等计划中，将产消者身份扩展到全球南方的广大人口，o3b是一个搜索和电信巨头的联盟，旨在建立一个卫星网络，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的其他30亿人引入互联网文化。地理延伸、社会学内涵和文化多样性将差异作为增长的引擎。

因此，面对网络活动的挑战不是否定，而是强化。重要的不是实际的，当然也不是消费资本的强制身份和对自我的管理，而恰恰是非同一性:西方思想永远将同一性归因于世界的非同一性本质。在个体自我的粉碎之外，尚待思考的是群体、或群众、或人口的非同一性。自我破碎的含义是，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群体不再是可以想象的。在拉克劳看来，任何社会或政治群体的出现，既不是因为该群体“自然地”存在(就像某些民族主义的描述那样)，也不是作为个体的集合，而是作为一种更原始的人类状况的串联:

> 在我看来，群体的统一性是诉求表达的结果。然而，这种表述并不对应于一个可以被把握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稳定和积极的配置:相反，因为在所有要求的本质中，都是对某一特定的要求

> 既在秩序之内，又在秩序之外，它与秩序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既然这个秩序不能充分地吸收这种要求，它就不能把自己构成一个连贯的总体。(Laclau 2005: ix)

但在数据库经济中，需求永远是管理的对象。需求管理贬低了作为社会化引擎的需求。即使在众包中，它被誉为从人群中提取剩余价值的新模式，但在众包中，人群被视为概率的一种突现属性，其行为被认为是可预见的。在这种精算的预见中，辨别生物政治管理的对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奇异的对象。在生命政治中被管理的人口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是宪政代议制民主的主权人民，是市场经济的主权消费者。全球经济只有一个市场。但这个实体是不完整和矛盾的:既不完整也不普遍，它在追求总体性方面失败了。

从政治上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公民权和人权之间的区别所支配的世界。正如安东尼·唐尼(2009:109)所说:“如果难民、政治犯、失踪者、酷刑受害者、被剥夺者不仅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而且是现代性的象征性主体，那该怎么办?”和阿甘本(1995)一样，唐尼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难民和其他难民一样，不是一个主体，因为她不在人口之中。同化无国籍者和被排斥者，将消除通往世界的最后一道巨大障碍，消除对一个今天鼓励金钱和货物自由流动、却只限制人员自由流动的制度的最后一次政治拒绝。

这是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第一个阶段。它带领我们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作为康德“世界主义意图”的单位。毕竟，各国向移民开放边境几乎是可以想象的，这足以成为欧洲和其他地方恐惧和抗议、激进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弹的发动机。真正不可想象的是，从移民延伸到更不可想象的领域，在那里，政府在没有代表或声音的情况下扩张。

这就是“任何差异都会在*后来*的*某些事件中*产生差异”的模式(Bateson 1973: 351;阿多诺和布洛赫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访谈(布洛赫1988)中一致认为，没有内容的乌托邦是政治希望的基础。世界主义是人文主义之后的政治模式，在我们被迫接受我们的半机械人集合之后——它使人口成为概念和政治事实，但这样做只是基于技术，特别是电信，被排除在只有人类的政体之外，这是我们曾经想象过的一切——在我们接受人类与地球未来的联系之后。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论述中，要维持的始终只是人类人口。在任何后人类政治中，善的问题不再是事实上由人类定义的，因此是不存在的

在自由主义监管和法律主义的权利框架下，不再可以定义。当代人文主义的生命政治已经放弃了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辩论;唯一的价值是对市场的有效管理。只有财富才能提供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充斥着商品和地位、半知半解的精力和半满足的欲望的瘴气。《世界》使我们有可能想象，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单一政治经济学之外，其他商品、更真实的理解和更深层次的满足很可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将消费主义的强制性选择转变为实际的自由，我们必须从分裂的个人转向需求的微粒群体。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群体的相互依赖,而不是想象中的个人自主性。21世纪的群体存在于与超越人文主义政体的技术和物理学科的相互依存中。意识到系统无法将他们包含在虚幻的普遍性中，被调解的群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能力将自主性让给那些不可想象的其他人的政治机构:机器、动物、环境、地质、海洋和大气。城邦并非完全由它的人口组成。它是由岩石和泥土、水和空气、植物和动物、建筑、服务和通讯组成的。“住在城市里的生物”对流感的描述和对人类的描述一样好。谈论病毒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世界主义是政治的目标，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真正的未来，真正不同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它是如此深刻的异类，因为它不完全是人类，因此它的政体不是权利或公民身份的问题，甚至不是构成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实际政治的那种物种归属问题。弗卢瑟(Flusser, 2000)认为，人类的功能是产生随机性。但是，在一个致力于自我平衡的自我调节的控制论体制中，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有大量的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保存在我们机器里的祖先的死劳动，以及自然界的巨大未知。正如德索托的穷人的死资本一样，马克思的技术的死劳动也是如此，生存环境的未货币化的财富也是如此。当我们以自身的方式来计算这种财富，而不是按照将宇宙转化为人类物种的环境的相关主义经济学来计算，会发生什么呢?

纠正德卡洛里斯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环境理解为外来的，或者历史上异化的，以至于它现在甚至不再是制造的原材料，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盖亚，它正在积聚力量，以摆脱其癌症般的过度生长的人类人口。当所有的替代方案都太可想象的时候，这是一个达成联盟的好时机。对资本的自我复制体系来说，最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是永续创新之路。技术发明将提供可持续性;永恒的创新将推动永恒的增长。但创新必须来自日益同质化的人口，来自技术基础设施

工程解决方案和组织形式越来越与资本本身同构，也就是说，资本负责革新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围绕事实上的标准规范化。作为一种以永久增长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资本面临着非货币化环境的有限限制(以碳信用额核算是一场闹剧，只有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才可信;在不市场化的环境中不可能有市场)。我们不能把信心寄托在一个普遍的、流行的、通过用户生成内容进行创新的平台上，因为允许这种创新的基础设施本身是有限的。它还受到私有属性制度的困扰，这种制度使资本——迫使每个用户存储自己的知识属性，每个公司创建密码保护数据的孤岛，使其翻倍、翻四倍，谷歌将云的能源需求和物质基础设施混合在一起，这使得它除了提供资本开始臭名昭著的短期补丁之外，更不可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

那些拥有他们不拥有的权利的人;消费最少却受惩罚最多的人;那些拥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钱的人;那些因为我们将财富的创造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分离而受苦的人;那些徒劳地向灾难的责任人追究责任的人;当紧急情况压倒实用主义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价值的，也是关于价值不断变化的本质的(Graham 2006)。在后来的讲座中，阿多诺认为，为了其他更高的目标而牺牲幸福是一种强加。延迟是“一种节俭的经济”，但是“文明和我们的教育所承诺的对我们放弃行为的回报是不会到来的”(阿多诺2000:138)。为了理性或延迟的满足而牺牲幸福，是一种真正悲剧性的牺牲。幸福是不容忽视的。但它也不能被低估，用灵丹妙药和小饰品来搪塞。资本在解决饥荒和贫困问题上不断失败，而在流行病和战争中蓬勃发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失败，但它却自诩为全球的必需品。当代政治行动主义一如既往地开始:在这些矛盾的辩证法中，知识分子的时尚，被我们教导自己背诵的失败的连篇累牍所塑造，已经被扔进了残余概念的垃圾箱。

这些矛盾中最大的是人类的例外:任何构成善的东西都只对人类有益。一神教的创立时刻是一神教战胜泛灵论的胜利，泛灵论是启蒙运动攻击迷信的黑暗秘密，表面上是反对罗马教会，但实际上是反对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特权于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人，而不是单一、统一和统一的上帝。漫长的上帝建构(Debray 2004)是一部在国内和殖民地残酷镇压万物有灵论的历史。土著人民维持和发展了这种万物有灵论，这应该让我们感到谦卑和鼓舞。

万物有灵论并不是一种返祖式的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它反对普遍的幻觉(这是民主的共同主张)，反对一丝不苟地排除非人类政治的做法。在思考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时，我们为一种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经济打开了空间，这是我们无法通过购物和投票达到的。在普遍人权制度下，美国武装强加人权的目标是将所有身份都纳入人类的单一同一性之下。政治向非人类开放的利害攸关之处在于这种虚假和自相矛盾的同一性的终结。

我们拥有一个后人类政治的模型。正如Sassen(2006)所建立的那样，市场不再是无形的。它在网络传播中被积极地实现。这个庞大的技术系统现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代理人。与此同时，正如克诺尔·塞蒂娜和布鲁格所说，市场的特征是

> 它们本质上存在的不完全性，被转化为参与者的连续的知识项目。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作为一个客体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缺乏*"客观性"和存在的完整性*，*它与自身的非同一性*。市场总是处于物质上被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它们不断地获得新的属性，并改变它们所拥有的属性。(克诺尔·塞蒂娜和布鲁格 2002: 168)

这种非同一性是我们在后人类政治中牺牲作为人类的同一性所能获得的，后人类政治不仅包括技术，就像市场已经做的那样，还包括自然世界。市场交易者和我们绿色主义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他们比我们更关心他们接触的流动对象。其原因本身就很有趣:从哈贝马斯到德勒兹，非同一性是主体的一种特征。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代理;对这些交易员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主体。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当代全球化政治经济学的主体。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将*代理*归于物质和技术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转向承认其*主体性的新政治理论*。

ranci<e:1>的政治概念是由它的排他性所构成的，它指向的是一种不完整的现象，一种假定的普遍性的非同一性，这就是市场交易者认为市场缺乏存在的原因。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坚持认同的概念——性别的、地域的、文化的、种族的、性的，但总是已经是生物的。这种有限的统一性是政治哲学的罪魁祸*首*——使新世界成为可能的激进的邪恶。我们有三个潜在的政治经济学主体:市场、个人和群体。这三者在根本上是不相同的。我们认识到这三者的半机械人本质，但还没有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依赖关系——一种关系

是哈曼反相关立场的乌托邦内容(见克拉夫对本卷的贡献)，然而，这消除了他坚持的对象先于并超越它们的关系。政治(也许与本体论相反)是情感的和中介的，*因为*它首先是关系的，而客观只是作为最初的本体论立场的产物。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客体，就意味着被排斥，并因此而被统治和剥削。这就是为什么，首先，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揭示和释放被排除在财富和公民身份之外的自然和技术(祖先)参与者。只有在这样激进的步骤中，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实现，一个超越工具理性和金钱暴政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或许可以从唯一一个拥有与Knorr Cetina的交易员同等激情的部落开始:Parikka(2007)和Mackenzie(2006)所歌颂的黑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激情，它将使绿色世界成为互联网新政治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框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中看到的戏剧是构成了对政治主体性的需求，还是实际上通过类比将论证扩展到经济领域，对经济主体性的需求。点对点运动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并且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这是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站绝对没有的。主体性的一个传统条件是意识到自己所进入的关系。这种意识可能不是沉浸在社交网络中的属性。意识的特点是需求:对提供之外的东西的需求。对包容的需求只是一个伏笔。这种要求是对“善”的重新调整，政治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我怀疑，这种需求在Facebook上是不可表达的，但它是点对点网络和Ezio Manzini(2009)提出的SLOC(小、本地、开放、连接)模型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模式，就其已经被实践的程度而言，是网关，而不是道路;未来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未知的。有管理的未来根本就不是未来。政治未来不是由新兴市场构成的，而是由被排斥者对一种新政体的不可预见的要求构成的，这种要求必须在与旧政体的斗争中实现，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更新了其预设，包括其伦理基础。既然我们情不自禁地提前思考，我们就计划，但计划的是真正未知和不可预见的东西。所以未来是可以想象的，但不会被管理得不复存在。想象一下:一个政体之间交流的世界，包括被统治者和被排斥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Abizadeh, Arash (2008), "Democratic Theory and Border Coercion: No Right to Unilaterally Control Your Own Borders," *Political Theory* 35, no. 1: 37–65.

Adorno, Theodor W. (2000), *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 trans. Edmund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gamben, Giorgio (1995), *We Refugees,* trans. Michael Rocke, *Symposium* 49, no. 2 (Summer): 114-19, http://www.egs.edu/faculty/agamben/agamben-we-refugees.html.

Arendt, Hannah (1978), *"We Refugees." The Jew as Pariah: 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ed. Ron H. Feldman. New York: Grove Press.

Barclay, Barry (2005), *Mana Tuturu: Maori Treasur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Bateson, Gregory (1973),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Paladin.

Bloch, Ernst (1988), *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trans. Jack Zipes and Frank Mecklenbur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ccaletti, Giulio, Markus Löffler, and Jeremy M. Oppenheim (2008), "How IT Can Cut Carbon Emissions," *McKinsey Quarterly,* October, http://www.mckinseyquarterly.com/How_IT_can_cut_carbon_emissions_2221.

Clastres, Pierre (1987),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Debray, Régis (2004), *God: An Itinerary,* trans. Jeffrey Mehlmann. London: Verso.

de Carolis, Massimo (1996),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Opportunism," in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37–5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rrida, Jacques (2001), *Negotiations: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 ed.,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izabeth G. Rottenber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 Soto, Hernando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Downey, Anthony (2009), "Zones of Indistinction: Giorgio Agamben's 'Bare Life' and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ird Text* 23, no. 2 (March): 109–25.

Esposito, Roberto (1993), *Nove pensieri sulla politica.* Bologna: Il Mulino.

Flusser, Vilém (2000),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trans. Anthony Matthews, intro Hubertus Von Amelunxen. London: Reaktion Books.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Population, Territory: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 1978*, ed. Michel Senellart, trans. Graham Burch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Graham, Phil (2006), *Hypercapitalism: Language, New Media, and Social Perceptions of Value.* New York: Peter Lang.

Knorr Cetina, Karin, and Urs Bruegger (2002), "'Traders' Engagement with Markets: A Postsocial Relationship,"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 no. 5/6: 161–85.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Latour, Bruno (2004),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kenzie, Adrian (2006), *Cutting Code: Software and Sociality.* New York: Peter Lang.

Manzini, Ezio (2009), "Small, Local, Open and Connected," *Rethink: Contemporary Art and Climate Change*,

http://~~www.rethinkclimate.org/debat/rethink-~~technology/?show=bvc.

Marx, Karl (1973a),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New Left Books.

Parikka, Jussi (2007), *Digital Contagions: A Media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Viruses.* New York: Peter Lang.

Rancière, Jacques (1999),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ancière, Jacques (2006), *Hatred of Democracy*, trans. Steve Corcoran. London: Verso.

Sassen, Sakia (2006),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4
关于黑客宣言的考虑

McKenzie Wark

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资产阶级已经死了。它既不统治也不统治。权力掌握在我所谓的矢量主义阶级手中。在旧统治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地方，新统治阶级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兴趣有限，对矿山、高炉和装配线的兴趣有限。它的权力不在于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而在于对管理这些东西的物流的控制。

矢量权力有两个方面:集约性和广泛性。密集的向量是计算的能力。它是建模和模拟的能力，但不仅如此。它是监控和计算的能力。它也是一种玩弄信息，把信息变成诗歌和叙事的力量。广泛的向量是将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力量。它是将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作为资源进行移动和组合的能力。再一次，这种力量不仅具有理性的意义，而且具有诗意的意义。

矢量权力因此可以省去许多旧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机器。谁真正拥有一个熔炉或一条装配线，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向量类将这些功能外包出去。因此，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发达国家正在加入资本主义发达世界。相反，它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由矢量力量统治的过度发达的世界。

矢量阶级只有在渴望一个不像其资本主义前辈被迫与劳动者妥协的世界时才团结起来。尽管发生了种种悲剧，20世纪仍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但它的胜利大多局限于西方。在西方，劳工与资本打成平局。资本不得不对剩余的大量社会化做出让步。我们得到了免费教育、医疗保健、选举权和妇女解放。《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就是现在正在瓦解的妥协。

矢量类几乎没有固定资产。他们试图避免真正拥有工厂。它避免直接支付工资。它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生存能力越来越不感兴趣。福特主义已死矢量阶级所渴望的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世界使它的身体完全可用，而不需要任何承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最能解释矢量权力的文化形式是色情。

然而，矢量阶级的战略和利益并不一致。它至少有两个派系。矢量主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描述为一个军事娱乐综合体。其两派的区别在于，一方将娱乐作为军事战略来追求，另一方则将军事战略作为娱乐来追求。他们之间的是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幽灵之国*》中所说的“冷战内战”

我们在21世纪初美国政治表面上所看到的，是这场冷战的表面效应。一派只对资源战略感兴趣。它认为它在伊拉克获得了最后一个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试图建立后勤基础设施来确保它的安全。它的伊拉克之旅非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美国对伊拉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在很多方面，伊拉克越不稳定越好。正在建设的基地是为了保护石油，而不是为了保护人民。

然而，矢量主义阶级中的另一个派别越来越担心这一战略的成本。它的兴趣不在于自然的战略，而在于第二天性的后勤。它的业务是在品牌、专利、版权的力量下，协调生活方方面面的业务。如果资本主义的权力把“存在”降为“拥有”，那么矢量主义的权力就把“必须”降为“出现”事物的实际质量变得次于装饰商品的物流和诗学。

矢量主义阶级的这一派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商品的非物质化有可能破坏价值稀缺性的基本原则。一旦数字技术完善了作为内容的信息与物质形式的分离，文化材料的大规模社会化就打开了大门。在某种程度上，这让矢量阶级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完全想到，私有属性不是文化的自然形式。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大规模的、无名的、默默无闻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将商品文化的原材料转化为公共属性。而好消息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经过几个世纪的私有化，文化又属于我们了。这种胜利当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就像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限的一样。它只适用于文化，而不适用于矢量权力的许多其他方面。但是，这仍然值得庆祝。

对于矢量主义阶级来说，现在的政治是试图将文化价值的某些方面重新商品化，使其变得稀缺和稀有的政治。以苹果iPod的政治为例，它试图把这个设备变成一个恋物对象。再看看Facebook，它的主张是，我们都应该为了这种特权而互相娱乐，忍受广告。这样的媒体根本不是进步，而是“奇观社会”的一种颓废形式。我们不仅要被动地消费这些影像，还得自己制造它们。

这里的模式是把图像生产中的有偿劳动力尽可能地减少到接近于零，并付给他们报酬

只以认可的货币支付。我们必须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观的特权付出代价。载体阶级的权力从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所有权中撤退，而是围绕着对载体的控制而巩固。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文化;他们得到所有的收益。

矢量类的一部分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走向完全封闭、专有的世界。网络游戏通常就是这样。在像流行的《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中，你需要花钱去获得那些人为稀缺的物品和地位而你却永远无法拥有它们。它们仍然是私有属性。你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租回来。《魔兽世界》是商品经济的完美无缺。《魔兽世界》是幻想版力量矢量类的完美体现。你花钱租用一切，他们可以随时驱逐你。

夹在试图解放信息的社会运动和试图控制信息的矢量阶级派系之间的是黑客阶级。任何为别人提供所谓知识属性的人都是黑客。这是一个矛盾的阶层。一方面，我们依赖矢量阶级，他们拥有实现我们所生产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很难从信息的私有属性中获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束缚了我们自己的生产力。

我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了黑客阶级的概念，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我一再被告知，即使它存在，它也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坦率地说，我认为最近的信息政治证实了这一论点。黑客班不会在五一扛着红旗在林荫大道上游行。但它完全有能力围绕网络中立性、知识共享、科学领域的公开出版、挑战愚蠢有害的专利等等进行组织。当代相当于旧劳工运动的工会意识，已经真正到来了。它甚至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尽管是一个匿名的先锋队。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黑客阶层的项目视为“受挫的技术官僚精英的项目，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与既定的专有利益相抵触”。这话有一定道理。然而，如果一个人过于冷眼看待美国劳工组织的做法，他可能会得出同样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一个阶级在实践中是什么和它能做什么之间总是有差距的。

这是一个将黑客阶级意识的通常地方性或基于问题的方法推向整个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观的问题。挑战在于从我们的角度来思考整个社会的整体——想象一个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世界。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超越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之类的妥协形式。不放开知识属性，而是设想一个完全没有知识产权的世界，这意味着什么?真正思考和实践知识产权又意味着什么

信息政治是一种不稀缺、没有所有者的东西?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冷漠态度，通过妥协的形式来选择我们的运动，这种形式提供了有限的自由，但把向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留在了向量主义阶级的手中。任何好的策略都不会被收回，尤其是那些最极端的先锋派，即情境主义者。克里斯汀·哈罗德(Christine Harold)认为，“也许这是因为，像所有好的品牌一样，情境主义很容易被挪用到新的目的上。”然而，有时候看似破产的战术后来又证明了自己，而看似严肃、专业、成熟的运动发展，最终可能会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先锋派仍然有它的角色，它把陈腐的艺术和政治形式抛在脑后，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权力形式，它们也有可能过去。

2007年，当音乐家电台司令(Radiohead)与百代公司(EMI)解除合同时，他们通过互联网向粉丝提供新专辑《*in Rainbows*》，让他们以自己选择的价格购买，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自由文化运动力量的标志。你甚至可以选择支付零英镑零便士，仍然拥有它。这里面暗含着对礼物的某种理解。礼物总是会给接受者带来义务。如果我卖给你什么东西，我对你有义务。我必须提供我们约定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我给你某样东西，你就有义务给我——或者至少有一种微弱的、非常普遍的义务，要在某个地方把礼物还给某人。电台司令明白这一点。新专辑的礼物创造了宣传、商誉、未来演唱会的门票销售，甚至是金钱的礼物。很多歌迷真的很想为自己的音乐付费，但作为礼物付费是因为他们想要履行一项义务，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强迫付费，或者因为涉嫌盗窃或盗版而面临法律制裁。

但把文化作为礼物送给所有人的限制在于，这样做会为传播媒介增加价值，而这并不是免费的。矢量阶级更具前瞻性的策略是，撤退到这个据点，但要坚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将自由文化视为一种策略，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认为黑客的做法是不断询问有关属性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确定一个模型。

我所说的“copygift”就是一个例子除了著作权之外，还有copyleft，但著作权和copyleft都将属性视为理所当然。Copyleft是对知识属性的辩证否定。它使知识产权与自身对立。但也许还有其他非辩证的策略，不是反对知识属性，而是逃避它。如果不是抽象地把自己的文化赠予所有人，而不是赠予特定的人，而是让它永远成为赠予特定的人的特殊礼物呢?比如，这更像是连锁信的模式。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有关职业的文献就流传了，而且是以PDF文件的奇特形式流传。它们是

被设计成可以传递，如果不是手对手，就是电子邮件对电子邮件，不太容易被任何人搜索和检索。

当然，矢量电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病毒式营销。这个游戏就是想象这种策略的其他用途，然后更进一步，发明新的关系。谁知道关系可以是什么呢?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三种常见的自我理解模式，我们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它们。第一种是海盗的浪漫故事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黑客。区别在于:海盗是夺取他人属性的人。海盗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海盗也有浪漫的一面，但那是越轨的浪漫。当然，这种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属性的概念，即觊觎属于他人的属性。

你爱怎么称呼它都行。如果不是黑客，那就干点别的。但不是盗版。海盗夺取他人的属性。黑客从原本属于每个人的属性中创造出新的东西。信息想要自由，但却无处不在。海盗的形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锁链上。黑客的形象坚持认为，信息本身就是免费的，总是脱离属性的形式。信息是我们存在的地方，也是我们社会存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既没有逃跑，也没有退却，游戏才刚刚开始。

并不是说海盗这个角色没有用处。2011年，海盗党(Pirate Party)在柏林市政选举中赢得了席位，他们的竞选纲领结合了对保障最低收入、毒品使用合法化和在信息权利方面的复杂立场然而，在过度发达的世界，进步政治的未来可能在于将劳工的利益与广义的黑客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实验——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可以说存在于用于营销目的的载体之外的话。

其次，我想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游戏化的修辞。这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通过提供象征性的奖励作为交换，让人们在不付钱的情况下做事情。这些奖励的吸引力在于其稀少性和分层性。你可以通过赢得这个象征性的代币来区分自己，这个代币是根据这类代币的整个层次来排名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礼物经济的逻辑。你做某件事没有报酬，因为你想做这件事，不是作为勉强提供的劳动来换取工资或其他奖励，而是为了乐趣，作为“玩工”。不同的是，礼物不是给别人的，也不是通过别人给一般的公地的，而回报也不是别人给予同样礼物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所提供的是一点认知能量，执行某个矢量业务所要求的任务，而奖励只是一种形式的、抽象的代币和排名。它不是礼物经济;

这是它的一个模拟。并不是玩耍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它是一种以游戏的形式提取劳动的游戏。

广义上的游戏化，是矢量阶级最复杂的策略。它不再像知识属性那样关心单纯的图像、故事或曲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属性!相反，它的兴趣在于两件事。首先，是其管理网络的专有算法。其次，可以从这些网络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仍然是绝对专有的。简而言之，矢量阶级将传说中的一般智力带入物质存在，并尽其所能使其成为私有属性。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最后是社会工厂的概念。对我来说，这似乎总是与70年代意大利的特殊品质有关。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将经济从工业劳动过程中转移出来的欧洲大国。当时的挣扎与其说是对其他过度发达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示，不如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倒退。

事实上，在过度发达的世界里，很难找到对工厂劳动有任何了解的人。在世界上的这些地方，工厂不再是劳动经验的主导形式，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了。与其说社会工厂，不如说货币化的闺房或许更有意义。以前是私人的、情感的、亲密的生活品质，现在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一个人需要很好地展示，即使是煮咖啡或卖鞋，更不用说在办公室的社交迷宫中谈判或参加可能导致临时合同的会议。

但意大利的经历确实表明，在过度发达的世界，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普遍存在的一件事就是不稳定。工作条件变成了临时性的，几乎没有福利。只有极少数员工被认为是永久性的。其他所有人都只是雇佣的帮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手、眼、脑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现了:让劳动力更有保障、更有报酬，还是扩大社会契约是更好的策略?这是一个有两个维度的问题。哪个在战术上更可行，但也是哪个在一开始就更可取?我们要以劳动为重点，以劳动保生命吗?还是我们想要确保生命本身的条件?

对于这两种选择，我们很难不感到悲观。而且，我们也很难反对人们可能找到的任何一种机会，以确保生活不被商品化，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找到。但退一步说，也许直接保障生活条件的斗争是有道理的。

对于过度发达世界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警钟:我们所做的事情终于被无产阶级化了。斯蒂格勒称之为语法化的逻辑，或者我称之为抽象的逻辑，现在延伸到了以前的白领和专业任务上。与此同时，信息已经摆脱了它在任何给定物质性中的嵌入性，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中转移出来

物质表达到另一种。尽管旧的文化工业试图人为地恢复它，但出售与特定事物捆绑在一起的信息的经济的整个基础已经消失了。

考虑到这两种情况，恢复知识分子努力的声望似乎和恢复旧工艺行会的特权一样是徒劳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廉价物品时代之后，到来的是廉价信息时代。

在我看来，这似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直接保障生活条件上，而不是间接地作为对劳动的奖励。任何特定公司或行业的任何特定劳动力总是脆弱的，尤其是现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那么，为什么不为保障生命而奋斗呢?如果我们不得不劳动，或者我们喜欢劳动，我们会同意劳动，但我们要求有生活的权利，有爱的权利，有创造的权利，有玩耍的权利，有奋斗的权利——有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要求所有人都有维持生活的工资。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教育。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医疗。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各种形式的生活基础设施。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做。

笔记

1 See the classic presentation by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Verso, 2001).

2 William Gibson, *Spook Country* (New York: Putnam, 2007).

3 To paraphrase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 p. 17.

4 Julian Dibbell, *Play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5 Andrew Ross,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5.

6 See McKenzie Wark, "Copyright, Copyleft, Copygift," *Open* no. 12 (2007), skor.nl. Also available at http://meanland.com.au/articles/post/copyright-copyleft-copygift.

7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 *The Many Headed Hydra*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8 "The New Rebels,"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 2011,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the-new-rebels-germany-s-pirate-party-celebrates-historic-victory-a-787044.html.

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动模式的质疑

5
人群回归

土耳其机械与新自由主义例外美国

Ayhan Aytes

众包应用中最普遍的例子之一是名为*captcha*的人类身份验证工具(von Ahn et al. 2003;见图5.1)。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反向图灵测试，即人类让机器相信他们确实是人类，而不是一个在网络上爬行并填写随机表格以传播垃圾邮件的软件机器人。

大多数时候，验证码认证所需的任务包括读取作为图像文件提供的乱码文本，然后将其输入文本框中。Re-captcha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验证码，它使用两组文本——一组用于评估目的，另一组用于转录光学字符识别扫描期间捕获的难以阅读的单词。因此，re-captcha不仅可以作为人类身份验证工具，还可以作为认知劳动平台这个过程的关键方面是，没有一个完成captcha的个体能够知道被转录的文本的整体含义，因为它被分割成单个单词。在大多数众包平台中，任务碎片化通过将认知工作者与最终的智力工作分离，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此外，大多数众包系统在劳动者和请求者之间维持着一种短暂的、基于任务的、有限时间的关系，不支持双方之间的直接沟通，进一步消除了认知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亚马逊网站(Amazon.com)的数字劳动力市场土耳其机械(Mechanical Turk)也存在类似的脱节。

Amazon Web Services于2005年11月建立了其数字劳动力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可以全天候浏览、选择并完成由公司或个人承包商设计的人工智能任务(hit)。每种HIT所需的劳动类型各不相同:查找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和图像，将文本从英语翻译成英语，



图5.1典型的重新验证码任务。

转录音频，用描述性文本标记图像，或回答关于各种主题的调查。这种劳动的产品可能会有很多用途，从垃圾邮件生成到训练机器学习算法，这些算法最终会在未来承担一些人类的角色。每个HIT的支付金额从一美分到几美元不等，取决于所需的时间或任务的难度。

亚马逊网站建立亚马逊土耳其机械(AMT)的最初动机是在其人工智能程序在其零售网站上查找重复产品页面的任务失败后出现的(Pontin 2007)。在经历了一系列徒劳而昂贵的尝试之后，项目工程师们转而让人类在一个精简的基于网络的系统中在计算机后面工作。后来，AMT将这个认知劳动平台提供给私人承包商，以换取每完成一个HIT的佣金。AMT的数字车间模拟人工智能系统，用人类的脑力取代计算。在AMT所称的“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这一社会技术系统代表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关键形成，因为它促进了主要是西方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从全球劳动力中提供认知劳动力需求AMT解释其劳动力市场对软件行业的价值如下:

> 有了亚马逊土耳其机械，你的客户可能会觉得你的应用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来完成任务，但实际上是土耳其机械劳动力的“人工智能”在帮助你有效地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根据Panos Iperiotis的说法，大约一半的AMT工人——或者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称呼自己——来自美国，另一半来自66个不同的国家。大多数非美国人。土耳其人来自印度，占AMT劳动力的33% (Iperiotis, 2010年)。罗斯等人已经证明，AMT的人口统计数据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突出的是一个

每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年轻男性印度工人群体不断扩大。大约三分之一的印度工人报告说，他们部分依赖AMT“维持基本收支平衡”(罗斯等人，2010)。

亚马逊网站(Amazon.com)将其基于小额支付的众包平台命名为“土耳其机械”(Mechanical Turk)，借用了18世纪自动棋手(Automaton Chess Player)的名字之一，作为该系统在认知劳动力和看似自动化的复杂任务之间建立的关系的简称。在这两种情况下，赋予机器动画的工人的表现都被机器的壮观所掩盖。

1997年，IBM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实现了下棋机器的概念，自启蒙时代以来，它一直是想象人类思维操作自动化的关键概念工具。这个隐喻也是20世纪上半叶控制论话语作为一种普遍系统的理想化的核心，具身在战后的符号处理器上，后来成为当代计算机的架构基础(Bowker 1993;香农(Shannon) 1950)。在这一章中，我将研究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根据它在配置认知劳动分工与计算和控制的自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早期现代遗产。特别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以不同的程度和方法，智力工人的劳动表现是相应社会经济机器的学科结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在当前的配置中，这种认知劳动机器位于由数字网络促进的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中，利用国际劳工法规中的立法灰色地带，以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Ong 2006)。众包是这一配置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通过认知资本主义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范围[4]，其中非物质劳动起着关键的结构性作用[5]毫不奇怪，这种配置也体现了一些冲突，这些冲突的种子是在通过认知劳动分工实现工业劳动机械化的早期现代概念化过程中埋下的。这种概念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它执行了为工业生产而训练人类思想的不可克服的冲突。

温顺的自动机

沃尔夫冈·冯·肯佩伦的国际象棋选手自动机于1770年在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莎的宫廷里建造和展示，并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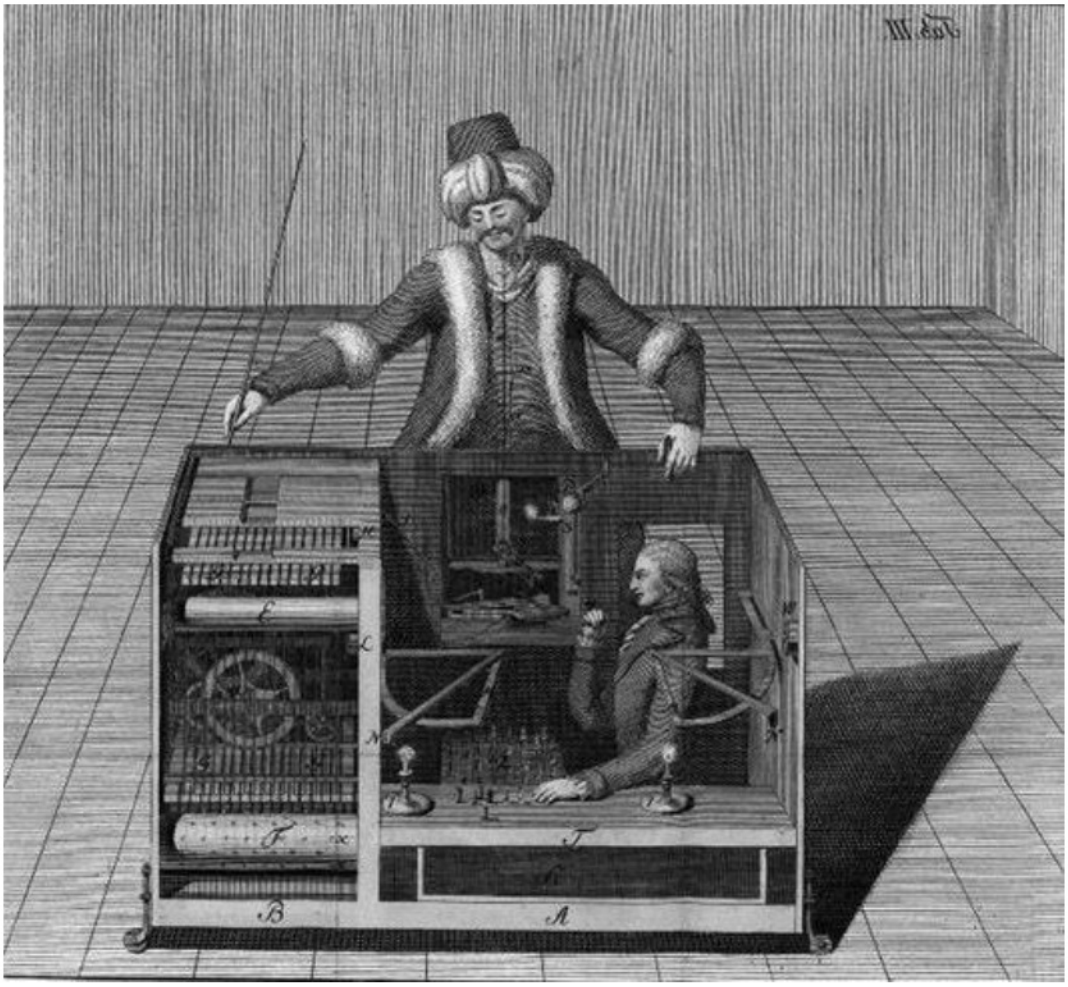


图 5.2 Joseph Friedrich Freiherr von Racknitz 1789 年*的小册子Über den Schachspieler des Herrn von Kempelen und dessen Nachbildung*雕刻*的土耳其人*。

印象中，抽着烟斗的土耳其人模型，由橱柜下面的精密机构控制，可以与人类对手下严肃的国际象棋(见图5.2)。然而，土耳其人看似机械的头脑实际上是被肯佩伦的象棋大师助手操纵的，他隐藏在伪机制之下。自动机国际象棋选手在欧洲和美洲展出了84年，吸引了许多著名的挑战者和观众，如拿破仑·波拿巴、查尔斯·巴贝奇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卡罗尔1975;Windisch 1784)。

福柯在其著作*《纪律与惩罚》中*，将18世纪的自动机视为人体和社会秩序的模型(福柯，1977)。因此，机械论的概念

关于人体的理论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是*解剖学上*的形而上学层面，主要由笛卡尔的身心二元性构成;另一个是*技术上的政治*层面，由国家的经验方法构成，通过军队、学校和医院来规范身体的运作。在这两种登记册的背景下，18世纪的人形自动机作为一种模型，一方面用于服从和使用，另一方面用于经验分析。福柯经常因为在他的史学中忽略了种族的他者而受到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顺从概念取代了东方主义的痕迹，在选择性的谱系中只关注欧洲主体。在分析带有东方“他者”意义的自动机时，这种缺失变得更加关键，比如肯佩伦的下棋自动机。然而，我相信下象棋的自动机的伎俩不仅仅是将欧洲棋手的制定身体与土耳其人的代表身体交换，通过其机械技巧使其充满活力。它还包括由自动机的国际象棋表演在观众中建立的初始假设，这些假设对于影响关于机械化原因的公共辩论至关重要，而这些辩论为这些表演提供了更大的背景。这些最初的假设与启蒙话语所利用的东方主义潜流密切相关，以便在土耳其人的形象上配置温顺的主体

活跃于启蒙运动自动机中的东方主义假设在肯佩伦自动机的文化表现中也很有效。我将着重讨论土耳其人形象作为下棋自动机主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供性的两个主要方面土耳其人表演的第一个关键方面是它的阈限质量。这种阈限性创造了一个缓冲地带，抵御了大多数启蒙运动的人形自动机所执行的人机理念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对没有灵魂的身体的异端理解，这种潜在的风险往往与自由主义、无神论和公开起义的煽动有关(Vartanian 1960)。事实上，将这种不稳定的角色降级到一个东方人物身上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起源于中世纪的浪漫文学(Truitt 2004)。东方自动机通过其与这些文学叙述中的阈限空间和经验的联系，传达了监视、纪律和道德限制的强制执行。

土耳其人表演的第二个方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温顺，它传达了一种有纪律的生产体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开明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谢弗1999)。东方人与温顺的联系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在中世纪，穆斯林臣民被认为是宗教法典的严格追随者。基督教神学将这种联系与东方自动机的话语联系起来，将穆斯林的特定话语配置为自动机(Biddick 2011)。此外，温顺预示着隐藏的棋手的表现

代表东方自动机的智力劳动。这种温顺的双重表现突出了18世纪欧洲认知革新背景下的智力劳动问题(福柯1977)。土耳其人表演的这两个方面——温顺和限制——对于在18世纪欧洲大规模劳动机械化过程的背景下，把握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理想化的权力模型的功能至关重要。

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在多个层面上扮演着权力模型的角色，第一个层面是知识作为权力工具的展示。隐藏的棋手是肯佩伦(以及后来的梅泽尔)节目的公开秘密(卡罗尔1975)。肯佩伦承认他的机器人只是一个“快乐的骗局”(Cook 1995)。正如谢弗所指出的，启蒙运动自动机的作用之一是“允许权力选择性地进入艺术和自然的内部运作”(谢弗 1999: 135)。换句话说，这个公开的秘密也是知识和权力的守护者们自负的眼色，提醒着普通大众他们的特权和地位。

肯佩伦表演中的神秘元素可以被认为是在自然哲学的表现体系中，它将整个自然视为一个神圣的剧场。这种表现系统的效果可以被用来给观众创造一种特殊的道德印象(谢弗1983)。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这样阐述这种道德效应:“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无数的效应，这需要一个被赋予积极的主体动力;但代理人在幕后。肯佩伦的自动机得益于这个剧院里的假设，作为机械化思维的技术神话思想的重要代表，它不仅是一台机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语言，使解释这个神话成为可能(Beaune 1989)。就像在每一种技术媒介中一样，它承载着定义其意义的文化体系的话语传统和表述的铭文。自动机国际象棋选手执行了这些铭刻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定为技术难题，在整个思想机械化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相关性。机械棋手的难题，或者机械化符号处理，已经被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实践者解决了，包括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埃德加·爱伦·坡、查尔斯·巴贝奇、诺伯特·维纳和艾伦·图灵。

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自动机作为一种安全的实验装置，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探索难以穿透的本体论局限性，并且大多数时候模拟生活以重新定义它(Riskin 2003)。在机械论哲学的推动下，类人自动机不仅改变了对生物的文化态度，也改变了对机器的态度，因为它们表现了机制也是生物的观念。机械的动态性与生命的机械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类人和的实验装置得以探索

动物自动机，并通过它们在欧洲的公开展览所引发的辩论而得到普及。

沃尔夫冈·冯·肯佩伦的《国际象棋选手自动机》以独特的重点阐述了机械化生活的问题:没有身体，心灵能存在吗?对于这个问题，它同时给出了两个答案:是和还没有。实际的答案是“还没有”，因为这台自动机确实是由人类操作员控制的。然而，这个具有欺骗性的“是”的回答作为一种哲学游戏仍然很有价值，可以用来探讨后来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并系统实施的想法，比如自我调节机制。

与18世纪的其他自动机相比，土耳其人的机器并不仅仅像时钟一样工作;相反，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可以在国际象棋的符号逻辑中对抗外部行为正如技术历史学家奥托·迈尔(Otto Mayr, 1970)所指出的那样，与发条宇宙(即专制封建主义的政治宇宙)的观念相反，自我调节系统的机械、政治和经济观念影响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由主体和民主的观念。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工业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合理化的结果，即主体根据其理性的经济利益进行自我调节。各种学者已经为这种无冲突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哲学论证，其中最著名的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上个世纪，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或思想代数。自从莱布尼茨时代的商业扩张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通用语言，使欧洲商人能够与新殖民地的人民建立可持续的交流。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可以通过逻辑计算框架，*微积分推理器*(约1680年)来操作，这是现代计算的先驱模型(维纳1948年)。莱布尼茨认为，心灵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动机，它根据一套预先确定的法则不由自主地运作。“精神自动机的运作，即灵魂的运作，不是机械的，但它在最高程度上包含了机械中所有的美”(莱布尼茨2005:365)。然而，对莱布尼茨来说，自动机/自我运动的灵魂并没有消除能动性，因为符号和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推理中起着构成性的作用。基于这一原理，莱布尼茨提出了微积分推理器，作为世界人民之间一切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种观点在莱布尼茨的马基雅维利式格言“*计算*”(*让我们*计算!)中得到了表达:“如果出现了争论，那么两个哲学家之间就不需要争论了，就像两个会计之间一样。”因为只要把他们的铅笔拿在手里，对彼此说:“*calcullemus*”*就足够了。*”[12]

国际象棋是可计算符号系统的完美例子;因此，当土耳其人通过象棋说符号的语言时，它进入了“机器的世界”(拉康1991:47)。但那台机器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主体性，因为

演员的本质和他们有限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在国际象棋的一套规则中严格定义的。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

> 国际象棋是一种国家游戏，或宫廷游戏:中国的皇帝下过棋。棋子是编码的;它们具有内在的性质和内在属性，它们的动作、情境和对抗都是由此衍生的。他们有自己的品质;骑士还是骑士，兵还是兵，象还是象。每一个都像是被赋予相对权力的陈述的一个主体，而这些相对权力结合在一个表达的主体中，即棋手或游戏的内在形式....在其内在性的环境中，棋子彼此之间以及与对手的棋子之间存在着二元关系:它们的功能是结构性的....国际象棋的确是一场战争，但却是一场制度化、规范化、编码化的战争。(Deleuze and Guattari 2004: 352)

因此，一个自动化的棋盘代表了理想的启蒙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主体及其可能的行动是根据社会权力结构所告知的规则进行编码的。每个主体都被赋予了相对的权力，他们不能超越他们有资格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当这些内在属性被抽象成几何函数，并与其他学科的函数相结合时，它们有可能表现出无数但有限的最终结果的可能性。这是机械化国际象棋成为想象一个社会的模型的另一个原因，这个社会的编码主体表达了多种结果。因此，下棋的土耳其人具身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体与东方的机械顺从的整合，在国际象棋游戏的编码社会经济领域中进行。

19世纪中期，在土耳其人的美洲之旅中，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an Poe)用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来论证为什么不可能有自动棋手。在里士满的《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他推测“国际象棋中没有一步棋必然会跟随另一步棋。我们不能从人们在游戏某一阶段的特定性格中推断出他们在另一阶段的性格”(爱伦坡2009:1)这种感知上的悖论主要是由于爱伦坡对自动机可能的运行原理的假设，该假设主要基于线性机制范式，在其运行过程中，机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一个相关因素。坡明确地将他的论点建立在将下棋自动机与查尔斯·巴贝奇的计算机性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并得出结论:

> 棋手的操作和巴贝奇先生的计算机的操作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我们选择称前者为*纯粹*的

> 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机器*是人类最奇妙的发明，无可比拟。(坡，1910:84)

坡对机械化思维的抗拒，可能也与他的智力劳动所面临的一种特殊困境有关。象棋机器人作为“纯粹的机器”的可能性，一定给坡作为一名智力工作者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前景。计算机的设计者，巴贝奇，已经暗示了坡在他的智力工作中使用的特殊技能和劳动，作为认知劳动系统机械化和分工的一部分。查尔斯·巴贝奇特别以报纸为例

> 在一个工厂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劳动分工都得到了令人钦佩的说明，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读报人几乎无法想象，工厂在整个晚上呈现出一个多么有组织的活动场景，或者是多么多的人才和机械技能为他们的娱乐和信息而投入了行动。

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巴贝奇认为，脑力劳动分工的过程将服务于将人类认知劳动的功能转移到机器操作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坡来说，下棋的机器，暗示着这样一种“信息制造”的处理，必然也构成了一个神秘的谜题，因为它暗示着他以前不可替代的智力劳动的交换价值。在坡后来的一篇投机小说中，他把冯·肯佩伦描绘成一个把铅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这导致了黄金价值的大幅下降，并导致了国际市场上铅价的通货膨胀这种叙述可以被解读为暗指智力劳动交换价值的预期下降，这是通过认知劳动分工实现理性机械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认知劳动分工对开明主体的特权劳动地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当社会经济棋盘上的任何角色通过工业组织被调节成更小的单位时，任何人都可以扮演这些角色。

这个社会计划作为笛卡尔机械论宇宙扩张的一个实例，主要是由人类思维流向计算组织和机器(包括国家)来引导的。在本卷中，乔纳森·贝勒的文章通过仔细阅读维勒姆·Flusser的作品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启蒙运动的科学话语引领了将人类思想编码为数字表示的趋势。我的历史分析认为下棋自动机是行为的一种

这种趋势的原型存在于新兴设备的相关张力中，这些新兴设备后来将这些最初想象的编码实现为商品化的社会和文化程序，如相机或计算机。事实上，Flusser发现摄影师在相机程序中寻找可能性的尝试与棋手在国际象棋程序中寻找新的可能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相似之处(Flusser 2000: 27-30)。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和机器都融合成一个统一体，这就解释了机器的人类工作人员如何既控制它们，又被它们控制。这些机器，作为一套被编纂的社会关系，被整合到其他社会经济机器中，从工业生产制度到国家的纪律机器。通过强调机器的这一特殊定义，乔纳森·贝勒引导我们认识到忽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潜在和共同风险。

Flusser对工具的使用与米歇尔·福柯的使用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表明了有形和无形的工具、制度和话语的战略星座，这些工具、制度和话语被铭刻在知识和权力的政治中。根据福柯的说法，*工具*/配置是“一套支持关系的策略，并由某些类型的知识支持。”[14]福柯使用“*工具*”一词是为了超越话语，包括描述知识结构形成的物质、行为和制度要素。这个术语经常出现在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治理学研究中。

福柯以监狱为例，强调其光学属性，这是基于边沁的圆形监狱架构。在这种观点中，监狱同时是一种技术媒介，被设计为看而不被看，因此也是一种通过监视的内化而主体化的工具。正如阿甘本简洁地描述的那样，机器“首先是一个产生主体化的机器，只有这样，它也是一个治理的机器”(阿甘本2009:20)。因此，“*机器*”一词为研究心智机械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有利位置，它综合关注其技术、工业中介，如作为一种学科形成的认知劳动分工及其构成性社会经济条件。

因此，分析工业认知劳动机器从其想象的启蒙概念原型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中大规模可计算的社会系统的演变，需要考虑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基础。

认知劳动机器的功能角色从启蒙主体的特权劳动向新自由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的不合格人群的转移，主要是由21世纪的数字网络实现的。这种转移通过认知的微观划分进一步扩展了对认知工作者的符号学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影响

任务及其跨文化、时间和地理区域的分布。

人群回归

众包是一个混合概念，将新自由主义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融合在一起。在2006年6月的《连线》杂志上，Jeff Howe向其精通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读者宣传了这个概念:

> 从产品设计软件到数码摄像机，所有领域的技术进步都在打破曾经将业余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区分开来的成本壁垒。业余爱好者、兼职者和业余爱好者的努力突然有了市场，因为在制药和电视等完全不同的行业中，聪明的公司发现了挖掘人群潜在才能的方法。这种劳动力并不总是免费的，但它的成本比付给传统员工的工资要低得多。这不是外包;而是众包。(Howe 2006:1)

众包作为传统就业方式的一种替代方式，也标志着群体概念意外地回到了全球北方的议程中。但此时，它的话语意义仅限于全球南方的社区。正如威廉·马扎雷拉所说:

> 按理说，人群属于全球北方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过去。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也标志着全球南方不自由或不够自由的政治的现在……人群是把自由主义主体从过去拉出来的暗物质，而大众则占据了后自由主义政治的新兴视野。(马扎雷拉 2010: 697)

马扎雷拉发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区别与福柯的“纪律社会”与吉尔·德勒兹的后工业“控制社会”之间的区别是平行的。虽然群体与工业纪律相对应，但大众只能在后工业控制社会的背景下考虑，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命令是“分形的，其目的是通过控制差异而不是通过强加连贯的社会机构来整合冲突”(马扎雷拉 2010: 700)。以控制指挥也是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充分融合的后工业服务经济中生产方式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看看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和它所传达的一些假设是有用的，因为它是最突出的活动，赋予了大众它的特征。由于它依赖于通讯的商品化，而通讯本身就形成了社会关系，

非物质劳动指的是“社会性”变为“经济性”的过程。拉扎拉托认为，作为社会关系商品化的延伸，主体性成为非物质劳动的“原材料”(拉扎拉托1996)。这部分是因为“今天的生产直接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Mazzarella 2010: 700)。在这里，需要挑战的关键假设是，社会关系的经济表达发生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然而，众包由于其去属地化的作用而扰乱了这种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在认知劳动实践的全球体系背景下考虑主体性的生产。尽管它与工业商品消费/生产周期相似，但信息生产周期对主体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的直接作用域是在通过同时建构活跃的消费者/传播者主体而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信息和传播行业。因此，“主体性的生产不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了商业关系的再生产)，而成为直接的生产”(拉扎拉托1996:1)但是，当传播者由于智力劳动的碎片化和信息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或大众与人群之间的全球收入差距而不再是消费者时，这个过程如何仍然有效呢?

哈特和内格里的众概念也有类似的假设。他们将后工业生产的特征扩展到大众，并声称“大众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或服务;最重要的是，大众也产生了合作、交流、生活形式和社会关系”(哈特和内格里，2005:339)。此外，哈特和内格里认为，通过认知劳动产生的主体性具有自主性，这主要是由于其假定的集体性。“这种新的劳动形式……为经济自我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生产所必需的合作机制包含在劳动本身中”(哈特和内格里2004:336)。非物质劳动的这一特征与劳动力的工业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中被认为是“可变资本”，因为它只有通过资本才能被激活和形成生产力。

然而，我认为，众包机器以其独特的配置，挑战了所有这些假设，并从本质上否定了劳动的工业和后工业配置之间的本质主义区别。在由众包协议维持的数字劳动力市场中，人群受制于一种让人联想到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形式。但这种劳动分工在其与全球关系的影响方面不同于工业分工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构成了全球南方工人的独特条件。这些条件可以被描述为国际法的灰色地带，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设计的，目的是利用劳动力成本的明显地区差异，王爱华将其概念化为“例外制度”。

众包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例外机器

王爱华(Aihwa Ong)借用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术语，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例外的全球体系。在施米特的意义上，例外状态定义了一种建立在司法秩序之外、由主权统治创造的政治阈限。与施密特的描述类似，王强调新自由主义政治形态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因为这些例外主要适用于在一致的立法框架之外做出决定。她将新自由主义的例外表述为“管理和约束、包容和排斥、赋予或否定人类行为价值的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王 2006: 5)。这些排斥技术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劳动力套利*。

Ong认为，劳动套利是通过劳动的非属地化来决定治理和约束条件的策略之一。劳动套利打破了国家劳动立法与作为公民的劳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Ong将劳动套利描述为“利用时空坐标来积累利润的最新技术，发挥一种新的灵活性”(Ong 2006: 174)。认知劳动特别容易受到劳动套利技术的影响，因为计算机化的劳动分工可以将任务分割成更小、更标准化的单元，允许全球工人的集合完成(Ong 2006: 161)。我认为，众包是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的一种工具，它标志着劳动套利的一种新实例，在这种情况下，在线认知劳动力市场被建立为聚合平台，同时充当技术移民系统。

亚马逊的土耳其机械众包系统清楚地说明了认知劳动套利的剥削方面。土耳其人社区似乎对剥削的说法有不同的反应。一些美国的土耳其人反对这种说法，并表示他们对土耳其机械的兴趣仅仅是出于体验的新鲜感。这一事实可以用美国工人通过AMT赚取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收入来解释

另一方面，来自印度或中国等国家的工人似乎对土耳其机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最感兴趣，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AMT低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例如，来自新德里的计算机自由职业者拉杰什·马戈(Rajesh Mago)在他的博客中批评土耳其机械:

他们把请求者发布的任务称为HITs(人类智能任务)。人类也是如此

智力只值几分钱吗?哈哈!我知道没有人强迫任何人做这些任务，但这并不能证明使用“智力”这个词是正当的——这是对人类大脑的嘲弄

马戈说，2008年，他每天为土耳其机械工作几个小时，完成了超过10,000个HITs。他赚了572.62美元。他的HIT满意率为98.2%;也就是说，他工作的请求者拒绝了他完成任务的大约2%，而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根据马戈的说法，请求者没有给出任何可信的拒绝理由。此外，即使是被接受的工程的付款也经常被延迟，这一问题似乎影响了许多其他印度土耳其人。拉杰什·马戈(Rajesh Mago)已经不在土耳其机械公司工作了，回想起来，他得出结论:

我总是挑战自己，不断地测试和实验，为低薪的HITs工作，以为自己能赚到可观的钱。但是，土耳其机械请求者非常聪明;他们比我做了更多的研发工作，并且确信他们能以最低的价格或免费完成工作![17]

马戈的案例凸显了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不受监管的本质，并唤起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外籍劳工*(Gastarbeiter)*计划，即西方工业在劳动力套利方面的长期历史利益。德国的外籍劳工计划是建立*无权利移民*立法体系的杰出典范，最近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移民工人计划(H-1B签证)的激烈政治辩论中，它启发了美国立法者(Jacoby 2009)。德国的*外籍劳工计划最初*只允许来自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男性工人以临时移民身份入境。这些男性被要求每周工作长达80小时，以远低于家政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战后蓬勃发展的德国工业提供劳动力需求，并在正常立法、权利和工会保护之外的例外状态下受到剥削。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例外制度借助数字网络推动了这种早期形式的劳动套利。此外，数字网络特有的时间性及其“不受时间限制的时间”创造了另一种效应——*时间套利*——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套利的后果。根据Shehzad Nadeem的说法:

时间套利可以定义为利用地域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时间差异牟利。这在两个尺度上运作。在地理范围上，许多公司利用时区差异来实现24小时的商业周期。在劳动过程规模上，时间套利可能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或劳动过程的加速。(纳迪姆2009:21)

人们可以把数字劳动过程的加速看作是数字网络上生活节奏普遍加速的延伸。根据曼纽尔·Castells的说法，数字网络用他所谓的“永恒时间”取代了工业时代的时钟时间

> 定义为使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不遗余力地消灭时间，将年压缩为秒，将秒压缩为秒。此外，最根本的目的是消除时间的顺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个超文本中。(Castells公司2004:12)

此外，Castells将网络时间描述为“网络社会中主导功能和强大社会行动者的时间”(Castells 2009: xlii)。

在网络社会的这些社会文化前提的背景下，有可能将时间套利视为西方人类学话语的异时时间性的实现，因为它将“他者”投射在一个*永远*在线的时间性机械区域内。根据Mazzarella的说法，全球南方人群的分期部分是由其异时性(allochronic)特性所建立的，这个术语是从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借来的，用来描述西方人类学和知识传统中建立的一种特定话语，目的是将“他者”置于西方历史时间之外。根据费边(2002)，异时话语是统治和维持全球不平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的人群通过他们的非物质劳动，在网络的机器永远在线的时间内被物质配置，以推动以西方时间性为特征的线性物质进步。换句话说，西方的异时性话语已经以时间套利的形式被具体化，成为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的一种机器。

我认为，认知工作者与其劳动的直接文化产品在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分离，最终为地球另一端的社会关系提供信息，创造了另一种例外状态，我称之为文化例外状态。这种超然的结果是，所生产商品的文化和信息内容是在认知工作者的社会语境之外消费的，因此不会直接改变她作为消费者/传播者的社会文化条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认知劳动机器的这一特殊方面是通过信息的分离过程实现的，这是战后控制论的一种创造。控制论带来的信息的肉体脱语境化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假设——例如，英美人对数字信息的偏好超过了依赖于上下文的模拟信息(马文1987)。卡洛琳·马文认为，这种偏好主要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呼吁，要求在一种清洁的环境中重生。

一个严格统一的世界，一个比其他任何人的世界更像我们的世界”(马文1987:61)。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含义，在“后9/11”恐惧言论的背景下，网络“*Gastarbeiter*”对新自由主义议程变得更有吸引力。

结束语

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装配线，那么土耳其机械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当网络将控制对象从身体转移到集体思想时，土耳其机械通过将集体文化生产模式排除给认知工作者，并将他们限制在立法、时间和例外的文化状态中来实现这一目标。

AMT将认知任务划分为离散的部分，这样任务的完成就不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合作，而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从外部组织起来。通过消除认知工作的合作方面，劳动力成为一种可变资本，因为它只有在资本的激活和组织之后才能创造价值。

由于认知任务的碎片化，众包工作者不仅为任务算法提供所需的信息，而且反过来，他们也是由算法产生的，受到其流程的约束，流入一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效率，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生计。当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需要通过土耳其机械系统完成任务的过程大多是不断为网络经济的生产/消费周期提供食物的文化生产算法时，这种影响就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该系统最内在悖论的来源:通过将不可预测的全球各种品味、表达、隐喻和概念亲和力近似为一个单一的大众本体论，逐渐减少定义其信息作为产品的经济价值的差异。

附注

为了描述象征分析服务的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特殊类型的非物质劳动，我更喜欢使用“*认知劳动*”*这个术语*。这种区别有助于避免人们对所考虑的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的强调，尽管许多作者都仔细指出，这个术语并不仅仅指生产或消费方面的非物质过程。然而，我相信，非物质劳动仍然有一些关于精神过程与身体分离的传统假设的痕迹。认知劳动标志着后工业主义的认识论和话语的顶点，这在概念的平行系统化在学术、军事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很明显。正如马特奥·帕斯奎内利所描述的那样，“认知劳动生产各种机器，而不仅仅是软件:电子机器、叙事机器、广告机器、媒介机器、表演机器、精神机器、社会机器、性欲机器。”在19世纪，机器的定义指的是一种转换能量的装置。在20世纪，图灵的机器——所有计算的基础——开始以0和1序列的形式解释信息”(帕斯奎内利 2004)。使用认知劳动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通过其具身和分布特征，可以讨论特定社会技术系统与构成主体性之间的历史关系。

2 non - u.s.。工人不需要为他们的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如果申请人的年总收入超过国税局规定的纳税申报门槛，美国工人的收入就需要纳税。

3 “亚马逊网站 帮助: 机械 土耳其人，” http://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16465291。

4*认知资本主义*一词在Nick Dyer-Witheford、Paolo Virno和Yann Moulier Boulang的各种用法中，指的是网络社会中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和信息消费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

5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今天，非物质劳动是‘霸权的’，这正是马克思所宣称的，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大型工业生产是霸权的

特定的颜色赋予整体色调——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发挥关键的、象征性的结构作用。”见斯拉沃伊·齐泽克，《客体*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论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2005年秋，http://www.lacan.com/zizmultitude.htm。

安·斯托勒(Ann Stoler)在她的著作《种族与欲望*教育*》(*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中，通过关注荷兰档案记录中的殖民事实(斯托勒1995年)，强调了福柯的史学，特别是福柯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对种族他者的忽视。

在欧洲，直到19世纪，“*土耳其*人”一词与“穆斯林”交替使用，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而奥斯曼人从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用这个词来贬低安纳托利亚的游牧部落。

8 认知科学家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使用“可用性”*(affordance)*一词来描述一件物品与其效用相关的感知质量(Norman 1990)。

9 w;R.汉密尔顿编，《*托马斯·里德作品集*》(爱丁堡，1846);引用见Schaffer(1983)。

温迪希强调了自动机作为其预期效果之一所传达的想法的大胆性。“他仅仅表现了自动机的本来面目;一台机器，它的机制并非没有优点，但它的效果看起来如此奇妙，只有从大胆的想法，和他用来实现幻想的幸运选择的手段”(温迪希1874:字母V)。

肯佩伦意识到自我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并为一种与詹姆斯瓦特的著名发明非常相似的蒸汽涡轮机申请了专利。瓦特汽轮机的调速器被认为是自调节系统的原型。

12 Gottfried Leibniz, *Dissertio de Arte Combinatoria* (1666);引自Ronald Chrisley和Sander Bege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tical Concep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0)，第14页。

坡在1849年出版了《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

14福柯在他的采访中解释了这一术语，发表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采访和其他著作选集，1972-1977*》，C.戈登主编([城市:出版社])，194-8页。德勒兹(1992)在翻译“dispositive”时更*倾向于使用“社会*机器”一词。

15然而，这种假设可能并不总是反映整个现实。土耳其机械最近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一些关注，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通过其工作人员播出的故事

amt。虽然在土耳其机械中产生的收入可能无法完全弥补美国工人在传统全职工作中损失的收入，但许多土耳其人仍然认为这是一份方便而灵活的工作，每天可以获得8到15美元的收入。

16 Rajesh Mago，“作为工人与他们一起工作后的Mturk回顾| PC提示和技巧”，http://www.pctipstricks.com/myreview-of-amazon-mturk-after-working-part-time-as-worker-for-few-months/。

17同上。

参考文献

Agamben, Giorgio. 2009.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bbage, Charles. 1963.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4th ed.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New York: A. M. Kelley.

Beaune, Jean-Claude. 1989. The Classical Age of Automata: An Impressionistic Survey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ed. Michel Feher, 430–80. New York: Zone.

Biddick, Kathleen. 2012. Dead Neighbors Archive: Jews, Muslims, and the Enemy's Two Bodies. I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Early Modernity*, eds. Julia Reihard Lupton and Graham Hammi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wker, Geof. 1993. How to Be Universal: Some Cybernetic Strategies, 1943–70.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3, no. 1 (February): 107–27. doi:10.1177/030631293023001004.

Carroll, Charles Michael. 1975. *The Great Chess Automaton*. Dover Publications.

Castells, M.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ader*, ed. Frank Webster, Raimo Blom, Erkki Karvonen, Harri Melin,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Ensio Puoskari, 138–49. New York: Routledge.

Castells, Manuel. 2009.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2nd ed. Oxford: Wiley-Blackwell.

Chrisley, Ronald, and Sander Begeer. 200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tical Concep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Cook, James W. 1995. From the Age of Reason to the Age of Barnum: The Great Automaton Chess-Player and the Emergence of Victorian Cultural Illusionism. *Winterthur Portfolio* 30, no. 4: 231–57.

Deleuze, Gilles. 1992. What Is a Dispositif?.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r? Essay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and German*, ed. Timothy Armstrong, 159–67. New York: Routledge.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2004.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Fabian, Johannes. 2002.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lusser, Vilém. 2000.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London: Reaktion.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5.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Howe, Jeff. 2006.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14.06 (June).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4.06/crowds.html.

Ipeirotis, Panagiotis G. 2010. Demographics of Mechanical Turk. *SSRN eLibrary* (March).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585030.

Jacoby, Tamar. 2006. "Guest Workers" Won't Work. *Washington Post*, March 2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24/AR2006032401719.html.

Lacan, Jacques. 1991.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 –1955*. Book 2. New York: W. W. Norton.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Trans. Paul Colilli and Ed Emery.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immaterialabour3.htm.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2005. *Theodicy Essays on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Freedom of Man and the Origin of Evil*. Trans. E. M. Huggard. 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17147.

Marvin, C. 1987. Information and History. *The Ideolog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d. Jennifer Slack and Fred Fejes, 49–62. Norwood, NJ: Ablex Pub.

Mayr, Otto. 1970. *The Origins of Feedback Contro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zzarella, W. 2010. The Myth of the Multitude, or, Who's Afraid of the Crowd? *Critical Inquiry* 36, no. 4: 697–727.

Nadeem, Shehzad. 2009.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ime: Globalization and Time Arbitrage in India's Outsourcing Industries. *Global Networks* 9, no. 1 (January): 20–40.

Norman, Donald. 1990.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 New York: Doubleday Business.

Ong, Aihw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squinelli, Matteo. 2004. *Radical Machines against the Techno-empire: From Utopia to Network*. Trans. Arianna Bove. http://multitudes.samizdat.net/Radical-machines-against-the.

Poe, Edgar Allan. 1910. *Works*. Leslie-Judge Company, New York.

Pontin, Jason. 200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Help from the Humans.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http://www.nytimes.com/2007/03/25/business/yourmoney/25Stream.html.

Riskin, Jessica. 2003. Eighteenth-Century Wetware. *Representations*, no. 83 (July): 97–125.

Ross, J., L. Irani, M. Silberman, A. Zaldivar, and B. Tomlinson. 2010.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 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In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863–72. New York: ACM.

Schaffer, S. 1983. Natur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Spectac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Science: An Annual Review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21, no. 51, pt. 1 (March): 1–43.

Schaffer, S. 1994. Babbage's Intelligence: Calculating Engines and the Factory System. *Critical Inquiry* 21, no. 1 (October): 203–27.

Schaffer, S. 1996. Babbage's Dancer and the Impresarios of Mechanism. *Cultural Babbage: Technology, Time and Invention*, ed. Francis Spufford and Jennifer S. Uglow, 335–52. Boston: Faber and Faber.

Schaffer, S. 1999. Enlightened Automata. In *The Sciences in Enlightened Europe*, ed. William Clark, Simon Schaffer, and Jan Golinski, 126–6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annon, C. E. 1950. Programming a Computer to Play Chess. *Philosophy Magazine* 41: 256–75.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toler, Ann Laura.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ruitt, E. R. 2004. "Trei poëte, sages dotors, qui mout sorent di nigromance": Knowledge and Automata in Twelf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Configurations: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no. 2: 167–93.

Vartanian, Aram. 1960. *La Mettrie's L'homme Machine: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an Id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n Ahn, Luis, Manuel Blum, Nicholas Hopper, and John Langford. 2003. CAPTCHA: Using Hard AI Problems for Security. In *Proceedings of Eurocrypt*, 2656, 294–311. Warsaw, Poland, May 4–8. Published by Springer.

Wiener, Norbert. 1948.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1053. Paris: Hermann.

Windisch, Karl Gottlieb. 1784. *Inanimate Reason; Or a Circumstantial Account of That Astonishing Piece of Mechanism, M. de Kempelen's Chess-Player; Now Exhibiting at No. 8, Savile-Row, Burlington-Gardens; Illustrated with Three Copper-plates, Exhibiting This Celebrated Automaton, in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Letters of M. Charles Gottlieb de Windisch*. Printed for S. Bladon, no. 13, Pater-Noster-Row.

6
作为免费劳动力的粉丝圈

阿比盖尔·德·科斯尼克

狂热者还是工人?

从历史上看，粉丝活动一直被嘲笑为轻浮、无关紧要，甚至病态。亨利·詹金斯在他的著作《*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s*)中追溯了*fan*这个词的用法，*它起源于拉丁语fanaticus*，其含义为(詹金斯引用了*牛津拉丁语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狂欢仪式和狂热狂热”、“过度和错误的热情”和“被神或恶魔占有”。詹金斯认为，狂热和精神错乱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

> [T]在当代文化中，粉丝仍然是一个令人反感的类别，它时而成为嘲笑的对象，时而成为焦虑的对象，时而成为恐惧的对象，时而成为欲望的对象。无论被视为宗教狂热分子、精神变态的杀手、神经质的幻想家，还是为欲望而疯狂的追星族，粉丝仍然是一个“狂热分子”或虚假的崇拜者，他们的兴趣从根本上与“正常”的文化体验领域格格不入，他们的心态与现实危险地脱节

在《*文本盗猎者*》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个人电脑处理能力的增强、数字创作工具成本的下降以及在互联网上出版的便利性促进了粉丝活动的繁荣。如今，粉丝网站、博客、留言板随处可见，每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上都组织起了粉丝团体;在这些网络社区里，粉丝们发布他们的作品:评论和细读，故事和诗歌，歌曲和视频，重演和动画和混搭，壁纸和截屏和图标。粉丝作品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这种来自粉丝的音频、视觉和文字材料流入公共消费领域的现象，并没有极大地改变一些文化评论家对粉丝圈的负面评价。相反，网上粉丝内容的丰富导致一些人贬低粉丝是多产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重要或有价值的东西。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业余爱好者的崇拜*》(*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中写道，他引用了赫胥黎(t.h. Huxley)的理论，即把无限多的猴子和无限多的打字机匹配起来，最终会产生一部杰作:

> 今天的技术把所有的猴子和所有的打字机连在一起。只不过在我们的web2.0世界里，打字机不完全是打字机，而是联网的个人电脑，猴子也不完全是猴子，而是互联网用户。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精力充沛的猴子——其中许多在创造艺术方面并不比我们的灵长类表亲更有天赋——并没有创造出杰作，而是在创造一个无尽的平庸的数字森林

但粉丝对互联网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方式:*劳动*。网上的粉丝作品构成了对各种商品的未经授权的营销——几乎每一种产品都吸引了某种程度的粉丝。本章将论证，粉丝活动不应该被贬为无足轻重、浪费时间，往好了说是病态，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由志愿者撰写，这是企业在市场碎片化时代迫切需要的。换句话说，粉丝制作是一种工作范畴。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粉丝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像许多为互联网提供内容的创造性活动一样，粉丝圈是Tiziana特拉诺瓦所说的一种免费劳动。特拉诺瓦写道:

> 我们把这种使互联网成为蓬勃发展和高度活跃的媒介的过度活动称为“自由劳动”——这是整个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得到承认的价值来源....互联网远不是一个“不真实的”、空洞的空间，它是由文化和技术劳动彻底地激活的，是一种完全内在于整个网络社会流动中的连续的价值生产

–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随着创造性在线劳动的报酬问题对包括新闻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变得至关重要，随着美国作家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和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等创意工作者组织大声疾呼，要求更多地承认在线作品值得付费，我们正处在一个成熟的时刻，可以确立粉丝圈是一种免费劳动的事实，并呼吁粉丝、学者、而那些从粉丝活动中获益的公司也应该认真考虑粉丝是否应该为他们的工作获得报酬的问题。

Hebdige:亚文化风格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楚，粉丝活动构成了一种作品。为此，我们将回顾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著作，特别是关于亚文化和粉丝社区的学术研究，它们认为粉丝圈是一种主动生产的形式，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形式。

迪克·Hebdige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文化*》中指出，酷儿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泰迪男孩、朋克摇滚、机车帮)是如何将普通物品转化为风格的能指的——这种风格标志着亚文化成员与(亚文化眼中的)规范、同质、主流社会。Hebdige写道:

> [O]对象在亚文化中作为“风格”被制造得有意义又有意义....[T]这一过程始于对自然秩序的犯罪——修剪一头短发，购买一辆摩托车、一张唱片或一套特定类型的西装。但它以一种风格的建构而告终，以蔑视或轻蔑的姿态，以微笑或冷笑而告终。它发出拒绝的信号

《Hebdige》说，亲和群体集体对滑板车、唱片或西装等日常商品采取行动，并为这些物品注入某种反映该群体价值观和兴趣的敏感性;当亲和群体重新配置和重新定义它们的意义时，这些商品就会“变得刻薄又刻薄”。家庭主妇手中的安全别针和朋克摇滚歌手脸颊上的安全别针是不一样的。“最平凡的物品——安全别针、尖头鞋、摩托车——……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些物品成为被禁止的同一性的标志，价值的来源。5如果没有亲和群体对这些“最平凡的物品”的专门用途和重新语境化，这些物品就永远不会获得它们的象征维度，也不会成为“价值的来源;也就是说，它们不会拥有多重价值，它们不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群体具有价值——它们不会成为特殊的物品

因此，Hebdige的作品是本章称之为“粉丝劳动”的劳动类型的早期表达。粉丝通过表演作用于商品，给商品注入价值，这种表演是由某种表情的展示和具体动作组成的，这些都可以用态度的概念来概括。粉丝们开始把某些实物、着装方式、发型和行为视为态度的组成部分，这种态度标志着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也标志着他们与他们认为的主流的区别。在Hebdige的研究中，亚文化对商品所做的工作，意义制造的工作，将商品作为其态度和风格表现的关键组成部分的重新语境化的工作，是在自我中进行的

兴趣，因为亚文化比任何东西都更希望明显与众不同，与社会其他部分分开。亲和群体在日常物品上投入时间、精力和想象力，以使这些物品满足他们的需求，其中包括帮助巩固和代表群体的集体同一性，这通常与社会规范明显相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Hebdige的作品之后几十年，在亚文化和粉丝研究中才浮出水面的是，亲和群体通过赋予普通事物以特殊意义，实际上增加了这些事物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亚文化在物品上做文章，是为了让它们成为他们不墨守成规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标志，但他们的作品赋予了物品新的价值和吸引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广告。因此，即使是最叛逆的亚文化的作品也符合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即资本主义劳动的规范:所有生活在资本统治下的人都必须劳动，以促进、销售和消费商品。

桑顿:品味文化

虽然《Hebdige》关注的是亲密团体将事物重新加工成风格的人工制品，但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在她对20世纪90年代英国科技音乐、*舞蹈俱乐部*和锐舞场景的研究中，强调了亚文化使用日常物品创造社会参与新模式的方式。在今天，随着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加入在线社区变得越来越普遍，亚文化创造娱乐形式的群体参与的观察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但桑顿提出了一套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被证明对理解亚文化如何创造在线互动模式和15年前理解面对面的技术俱乐部和锐舞场景一样有用。

桑顿将俱乐部文化归类为一种“品味文化”。桑顿写道，品味文化“聚集在他们共同的品味基础上……他们对共同媒体的消费，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与自己品味相似的人的偏好。”参与一种特殊的品味文化“使参与者对这种文化的好恶、意义和价值观有了了解(通常是信仰)。”这些文化通常不是永久的隶属关系机构;相反，它们是“具有流动边界的*临时*社区，可能在一个夏天聚集在一起并解散，也可能持续几年。”此外，品味文化“充满了文化等级制度”，例如，在俱乐部文化的例子中，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比被认为是虚假的东西更有特权，时髦的东西比主流的东西更有特权，地下的东西比媒体更有特权

桑顿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小说的社会创新。桑顿的品味文化也可以被称为粉丝文化，这些类型的群体围绕着某些对象聚集在一起，这些对象可以是“普通媒体”，如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和漫画书，但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商品。围绕这些商品，粉丝们建立起具有特定等级、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社会。粉丝的大量工作包括参与粉丝文化的规则和规范的构建;粉丝调节其他粉丝之间的互动，建立粉丝讨论和游戏的条款(例如，明确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并引导和教导新人进入粉丝圈。地位游戏——新手成为社区“大牌粉丝”或版主的斗争，或者希望修改群体价值体系以获得认可的粉丝派别的斗争——在粉丝圈中很常见，并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兴趣和娱乐。桑顿的研究是最早阐明狂热社会维度重要性的研究之一。她透露，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粉丝社区的构成和参与(尽管这种参与可能是短暂的)，她强调，如果没有学习和维护规则、地位的获得和失去、坚持或打破共同的信仰体系等活动，普通的商品对很多人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换句话说，粉丝们的社群建设劳动，赋予了物品很大的吸引力。没有粉丝劳动，消费的社会性就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物品的购买者不会将这些物品与加入和参与由品味和价值观相似的人组成的社会的乐趣联系起来。

詹金斯:着迷/沮丧

Hebdige和桑顿对粉丝劳动的早期理论得到了詹金斯和马特希尔斯对粉丝劳动的矛盾和复杂性的分析的补充。詹金斯指出，粉丝们选择在物体上工作(他主要研究的是电视制作的粉丝)，因为他们在与物体接触时体验到多重情感:

> 粉丝们的反应通常不仅包括单纯的迷恋或崇拜，还包括沮丧和对抗，正是这两种反应的结合，激发了他们与媒体的积极互动。因为流行叙事往往不能让人满意，粉丝必须与之抗争，努力向自己和他人阐明原著中未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文本继续引人入胜，粉丝们不能把它们从注意力中打发掉，而是必须设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挽救它们

詹金斯指出，粉丝们对自己感兴趣的物品的内在情感冲突——迷恋*与*沮丧，喜*爱与*厌恶——驱使着粉丝们在这些商品上工作。詹金斯观察到，媒体粉丝写同人小说和同人评论，制作艺术、音乐和视频，以此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文本版本，他们想要的文本，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文本。从詹金斯那里，我们了解到，粉丝劳动通常是*定制化的工作*，将大量生产的东西变成满足个人特殊欲望和愿望的东西。

我们还了解到，粉丝劳动不是奉献，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仅*是奉献，也是对抗，粉丝觉得他们必须劳动——也就是说，把时间、注意力、创造力、智力和精力投入到商品中——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粉丝们在物品上工作，是为了掌握它们。詹金斯写道:“粉丝们绝不是逢场作戏，而是积极地宣称自己掌握了大量生产的文本，这些文本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生产提供了原材料，也为他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基础。”“[9]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粉丝的概念远不是像奴隶一样被商品迷住，而是作为一个个体，通过强行改变这些物品以更好地为它们服务，来断言她或他对商品的掌握。粉丝将商品视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原材料”——呼应了Hebdige关于亚文化的写作——“把普通的东西变成风格的标志和公共表演的道具”——以及“他们社会互动的基础”——正如桑顿(在詹金斯之后四年)所声称的那样，品味文化构成了社区这让个人参与到地位游戏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中。

詹金斯让我们看到，粉丝的立场是，没有一个粉丝的对象本身是完整的、完美的或完整的。粉丝们渴望赞美一个对象的正确之处，指出它的错误之处，并为这个对象的发展提出解决方案和新的方向，因为他们认为，粉丝圈就是使这个对象变得完整和完美的东西。*对象是关于粉丝的*。与其说是扇子对物体的投入，不如说是物体满足了扇子的需求——而且，一开始，它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范友必须在对象上投入精力，才能对对象进行定制，使之更符合范友的意愿。

詹金斯还让我们了解到，从粉丝的角度来看，他或她在商品上的劳动与该商品的官方生产者的劳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如果粉丝必须抚平一件物品的粗糙边缘，如果他们必须探索和实现一件物品未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赋予该物品不受欢迎的属性、压制其更有趣的潜力的责任就在官方生产者身上。粉丝们觉得自己被迫在事物上劳动，这意味着把这件东西推向市场的劳动是劣质的，或者是不够的，或者顶多说是留下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粉丝劳动者和官方制作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是粉丝不常把自己*视为*劳动者的原因之一。粉丝们定制大众商品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粉丝同伴，而不是为了市场，也不是为了普通消费者(即非粉丝)。有人可能会假设，粉丝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出于对释放自己喜欢的物品的最佳和最高承诺的兴趣，而不是像官方生产者那样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因此，许多粉丝认为他们的动机比官方制作人的动机更纯粹，并将自己视为高于市场价值、广告和销售的问题。粉丝对官方制作人经常感到的挫败感和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粉丝将自己视为官方制作人运作的同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希尔斯:粉丝和交换价值

然而，正如希尔斯在《*粉丝文化*》一书中所说，粉丝实际上是官方制作人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尔斯谈到了流行的“抗拒”粉丝的概念，他说:“狂热粉丝对商业化和商品化表达的敌意……导致了狂热电视粉丝(以及其他相关媒体粉丝)的理论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消费主义的。”但希尔斯写道，粉丝圈有一个内在的矛盾:

> 在“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及其新商品的快速周转的同时，粉丝们也卷入了这些非常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粉丝是“理想消费者”，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可以被文化产业高度预测，并且很可能保持稳定。但粉丝也表达了反商业的信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因为这些信仰并不完全符合粉丝所处的文化环境)

因此，希尔斯认为球迷的体验至少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方面:“反商业意识形态”的一面和“商品完美主义”的一面。

希尔斯对粉丝圈的这两部分的提出，使他比之前的亚文化和粉丝研究学者更清楚地阐明了粉丝劳动是如何为商品增加价值的，以及为什么粉丝否认或干脆拒绝承认他们的增值活动构成了劳动。希尔斯说，看看那些收集旧的、不再生产的物品的粉丝们如何在eBay上以有时相当高的价格出售它们,

> 根据传统的使用和交换逻辑，eBay上出售的许多商品应该几乎一文不值。然而，由于其中许多商品被粉丝强烈主观地估价，这类商品呈现出一种重新定义的“交换价值”....[F]基于“使用价值”的商品与属于经济“适当”的系统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与媒体相关的收藏品市场的存在是由粉丝的生活体验所支撑的

使这些商品具有超出其最初销售价格的价值的是粉丝赋予它们的东西——粉丝将旧东西赋予新的用途，以及粉丝围绕它们构建的情感景观。希尔斯指出，“对文本的‘挪用’或对消费的‘抵制’总是可以作为交换价值的新实例加以回收，”[13]，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粉丝的“占有”，许多商品的交换价值会低得多，价值的保质期会短得多，潜在消费者的基础也会小得多。如果没有粉丝的参与，用希尔斯的话说，许多物品在进入市场后不久就“几乎一文不值”。

但粉丝和粉丝研究学者历来不愿将粉丝的增值行为视为劳动，因为“粉丝身份通常被视为与消费者身份相对立的。[14]与这篇文章特别相关的是希尔斯的观察，引用了泰勒和威利斯的一项研究，[15]粉丝批评他们自己社区的成员，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值得补偿:“[F]那些行为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相关’的人(例如，他们可能试图出售录制的非直播视频)很可能在相关的粉丝文化中受到谴责。“[16]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以《*星球大战*》同人小说作者在亚马逊上简要列出她的同人小说为例，[17]粉丝社区经常严厉批评那些试图出售他们的同人作品的成员。因为粉丝通常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对消费主义的“抵抗”，他们拒绝考虑自己的作品可能构成宣传材料或辅助产品，从而增加了粉丝对象的价值，因此可能值得获得补偿，无论是从官方制作人还是从其他消费者那里。

那么，把赫伯迪和桑顿的理论与詹金斯和希尔斯的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粉丝并不把粉丝崇拜的对象当作商品，即使它们就是商品，即使他们花了很多钱(在某些情况下，是一大笔钱)来获得这些对象，即使是粉丝圈赋予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远远大于它们最初的销售价格。因此，粉丝并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增加或创造交换价值的工作(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增加个人使用价值)，也不为自己的活动寻求补偿。

然而，在数字时代，与模拟发行技术相比，粉丝们将自己的作品公开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很明显，粉丝们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是一种劳动，而这种劳动绝大多数是免费的。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等学者对互联网如何主要由自由和自愿的创造性劳动组成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特拉诺瓦关于数字经济需要不断*更新*的概念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对粉丝劳动的讨论。特拉诺瓦在《*网络文化*》中写道，数字经济“挑战了后现代的假设，即劳动消失了，而商品承担并消解了所有意义。”特别是，互联网突出了从持续的、可更新的工作中提取价值，并且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18]她指出，网页设计师和维护人员的工作是不断更新一个网站，以确保它是一个“好”的网站

网站，和程序员的工作，反复更新软件，以保持应用程序的相关性和使用;

这是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劳动，通过一个成功的网站来展示，这是劳动改变产品的奇观，让用户回来。因此，商品的好坏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

与特拉诺瓦的例子类似的是，粉丝们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以评论、故事、视频和音乐的形式提供新的材料，使产品更新，并为它们提供(并创造)消费者需求。

特拉诺瓦还谈到了希尔斯所写的亲和群体中固有的矛盾——即社区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起作用，不值得得到补偿，与社区创造大量实际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特拉诺瓦观察到“互联网作为媒介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这并不等同于就业[…])，只有部分劳动力被风险资本主义反复无常的逻辑所过度补偿(在1990年代后期的网络繁荣期间)。在维持整个互联网的不可思议的劳动力中(从邮件列表流量到网站再到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免费劳动力。”

然而，免费劳动并不一定是被剥削的劳动。在早期的虚拟社区中，我们被告知，劳动确实是免费的:建立一个社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它是免费的，无偿的)，但它也被心甘情愿地让步，以换取交流和交换的乐趣(因此它是免费的，愉快的，而不是强加的)

自组织社区(如第一个AOL聊天群)的成员不介意付出自己的劳动，这一事实反映了粉丝们自由地贡献时间、精力和创造力来制作粉丝作品，然后在网上分享的方式;这两个群体都是为了“交流和交流的乐趣”而这样做，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觉得他们的互联网劳动是“不无偿的”。特拉诺瓦将互联网“礼物经济”21作为一种框架，亲和群体用它来描述他们的无报酬交换模式，但事实上，群体并不把他们自愿做的事情视为工作，这并不会减少它的价值创造。“1996年，在志愿者(AOL聊天室管理)最活跃的时候，有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参与了进来。

“我们帮助AOL每月至少产生700万美元，”22特拉诺瓦说。今天，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帖和评论的粉丝版主、作家和艺术家有数百万人，他们的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线(AOL)每月700万美元的收入。

罗斯在“关于数字劳动力问题”的演讲中以特拉诺瓦和希尔斯为基础，强调美国正在向“基于广泛使用无偿或业余用户劳动力的互联网经济”过渡。对罗斯来说，这种转变引发了许多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公平的问题，而企业雇主和创意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这些问题。罗斯写道:

> 在新媒体的世界里，工会没有任何立足点，过度工作、低薪和牺牲劳动的公式完全是规范的。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社交网络或开源中广泛使用业余或用户输入，Tiziana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最初被描述为“自由劳动”的系统性剥夺，促使一些评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数字环境的经验是否应该引导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对劳动和企业的基本理解

—

罗斯认为这种对互联网用户自由劳动的剥夺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者的自我剥削”。罗斯的一位线人所说的“你忍不住要做的工作”，似乎是娱乐和娱乐的工作，罗斯说，是“增值工作”，可以“以数字方式延伸到员工生活中醒着的每一刻”——甚至不需要成为员工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罗斯将特拉诺瓦关于20世纪90年代AOL聊天室的结论应用于当今的社交媒体网站，声称无工资劳动力为所有这些网站注入了财务价值，这对网站的创始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 [F]对于商业企业家来说，[建立一个社交网站]实际上是一个无工资的命题。带宽、托管和维护商业平台都有成本，但就可货币化的产品而言，是用户，或者行业战略家所说的产消者，谁创造了所有的剩余价值(这可以被描述为这种免费服务提供给用户的价值和他们为商业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24

—

罗斯和特拉诺瓦一样，承认“交流和交流的乐趣”以及粉丝劳动“不是强加的”这一事实，阻止了粉丝为他们的增值活动寻求补偿。对于很多粉丝来说，捐赠劳动是心甘情愿地付出，以换取在一个相对开放、不受限制的互联网上享受和玩耍的机会。Ross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澄清:

> [T]社交网络目前在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人们为保留一个自由的交换媒介而付出的代价，这个媒介的活动范围大到足以超越任何政府或公司的监督。换句话说，这是另一种权衡，

而这种平衡，就目前而言，仍然是有利于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进入用户生成价值的互动性免费劳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向整个互联网缴纳的一种什一税或贡品，这样，剥夺者就远离了我们真正珍视的那部分互联网

财富在社交媒体公司之间分配不均的事实(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所有从社交媒体网站中受益的公司)和为这些实体创造内容和价值的粉丝是心甘情愿接受的，粉丝们把他们的志愿劳动视为获得互联网参与利益的先决条件。

粉丝志愿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假设粉丝拒绝在志愿服务模式之外的任何模式下劳动的几个原因。

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粉丝圈这个概念带有疯狂、社会边缘化和异常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所固有的假设是，粉丝被特定的对象和文本所占有——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被奴役。这种将粉丝圈定义为一种被动接受、接近或陷入疯狂的状态，无疑为粉丝们希望定义的自己对-à-vis更大社会的权利设置了一个较低的门槛。当一个群体被归类为异常或次正常时，它通常只会争取存在和不受干扰地运作的权利。从20世纪50年代的漫画迷，到90年代的说唱和嘻哈迷，围绕着一些媒体迷出现了道德恐慌，而社会谴责的适用范围要大得多，从《星际迷航》迷到肥皂剧观众，再到电子游戏玩家;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粉丝群体因为自己的热情而经历了拒绝和批评，所以粉丝敏感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粉丝兴趣，什么时候该公开自己的粉丝身份。网络交流的匿名性让人们可以谨慎地以粉丝的身份运作，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闭门造车的形式，因为很多人在面对面的社交中很少讨论自己的网络粉丝活动。互联网允许个人隐藏自己的粉丝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社交领域，避免与粉丝圈产生任何关联。一个基本上不公开的群体，通常远不急于公开组织和发布经济诉求。

“粉丝圈”的概念在市场营销和消费圈子里已经成为一个更被接受和享有特权的术语——公司明白他们的产品需要在线上和现实世界中的粉丝、追随者和朋友——但即使被认为是一种值得花费时间和金钱的行为，粉丝圈也被视为一种边缘的、娱乐的、只是为了好玩的活动。它不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核心，也不是创意产业职业生涯的合法基础。

除此之外，粉丝圈被广泛地归类为纯粹的休闲活动，完全超出了人们生活的“严肃”领域，比如工作，粉丝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显然是反商业的，这种感知阻止了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报酬的。正如Hebdige所指出的那样，亚文化经常以反对社会规范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成员对普通物品进行重制、返工，并找到新的用途，部分原因是为了反抗这些物品被宣传为破坏社会习惯流动的一种方法。风格可以是干扰的信号，是打破主流的行为和信仰特征的信号，

为商品注入非规范的含义来定义亚文化风格，是拒绝资本主义倾向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倾向于将每个人都视为与其他人完全相同的人，将所有人都降低为同等的、可互换的消费者。

希尔斯告诉我们，粉丝也可以“抵制”他们喜欢的文本和对象的商品方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占有活动纯粹是出于经济动机——粉丝对特定的事物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与之有情感、智力、心理或艺术上的联系，而不是因为粉丝希望从中获利。事实上，粉丝们常常认为，是官方制作方的逐利动机导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做出了不正确或不太理想的决定，让粉丝们在爱情和挫折的驱使下，而不是金钱的驱使下，对自己已经依恋的产品进行抢救或修改。大量粉丝话语和粉丝研究学术中所假定的财务与粉丝圈的对立，并没有为粉丝考虑游说，以获得他们为公司产品增加价值的报酬提供肥沃的土壤。

罗斯和特拉诺瓦声称，即使粉丝们确实把他们的生产力视为劳动，他们也可以把这种捐赠视为参与互联网上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网站的能力的必要交换，以使公司受益的方式，免费提供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他们的免费劳动换来了一个免费的互联网。

把粉丝正式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工会，这种想法本身，多少有点违背粉丝自由的基本原则。对于粉丝来说，虽然他们确实会围绕着特定的物体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做的是*定制*量产的东西，以满足自己独特的欲望和需求。大多数粉丝劳动的目标是修改一件商品，让它适合所有人，让它更适合粉丝劳动者，以及其他和粉丝劳动者有共同品味的粉丝。任何相当数量的粉丝都不太可能就他们都想在各种公司制造的物体和文本上执行的工作类型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某种与明确定义的生产类别相称的薪酬计划。从本质上讲，粉丝劳动是特殊的，每一种粉丝作品都源于粉丝生产者的特殊利益，并受到其影响。

此外，由于尚不清楚粉丝创造的品牌延伸、宣传和营销材料为公司带来了多少收入，粉丝很难以佣金或收入分成的模式寻求报酬。粉丝制作的视频、网站、评论、海报和其他艺术品、故事、歌曲和评论与围绕任何给定产品的官方广告和促销流融合在一起——粉丝的劳动可以提高产品的热度和声誉，还可以增强产品对潜在消费者施加的吸引力或吸引力，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产品的销售中有多少是来自粉丝的努力，而不是来自付费的企业营销人员。

粉丝补偿

然而，尽管数字经济依赖于无偿的、由用户产生的劳动，但互联网也一直是一些补偿创新的场所，这些创新在未来可能会很好地服务于粉丝。事实证明，对于吸引大量观众的博主和视频制作者来说，从广告中获得收入是可行的;如果公司允许粉丝制作者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图像、文字、视频和声音，那么粉丝制作者同样可以从谷歌AdSense或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中受益，因为大多数粉丝制作者使用的是专有媒体(公司可以默认许可)。通过不起诉粉丝或向他们提供版权侵权的停火-停止函)。

另一种使少数粉丝受益，并可能使更多粉丝受益的补偿形式，是将粉丝劳动者从业余爱好者提升为付费专业人士。一些公司在官方产品中加入了粉丝作品，或者将其作为产品的广告，这推动了这些粉丝在创意产业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些公司雇佣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作家和版主，他们的作品是在粉丝网站上第一次遇到的。对于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来说，粉丝劳动最终可以被视为声誉阶梯上的第一梯级，其中最高梯级是全职工作。

要想让粉丝为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就必须让粉丝和企业都承认，粉丝是一种劳动形式，可以为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增加价值，值得得到补偿。关于粉丝圈的讨论历史，尤其是粉丝社区内部的讨论历史，使得这种承认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如果企业能够开始将粉丝群体视为他们最伟大的促销活动的潜在开发者，如果粉丝能够开始看到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个人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市场交换价值，那么，可以想象，粉丝可能会成为第一批为互联网劳动和报酬等重要问题制定可行解决方案的社会群体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粉丝将有助于塑造创造性劳动在数字经济中如何得到公平补偿，而不是成为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受害者。

附注

1 Henry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

2 Andrew Keen,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Currency, 2007), 2–3.

3 Tiziana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4), 73–4.

4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 repri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3.

5 Hebdige, *Subculture*, 2–3.

6 I do not mean to privilege the subculture of youth gangs over the subculture of housewives, or any other group, in this discussion. Although Hebdige is concerned with subcultures that identify themselves as rebellious against mainstream society, one can regard safety pins as endowed with special meaning by homemakers just as much as by punks, although the meaning of the safety pin may be very different in each affinity group. The French saying, "*tiré àquatre épingles,*" or "pulled by four pins" (immaculately dressed), demonstrates how the ordinary pin (though not necessarily the safety pin, in this case) has been given special meaning in fashion culture.

7 Sarah Thornton,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

8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23.

9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23–4.

10 Matt Hills, *Fan Cul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8.

11 Hills, *Fan Cultures*, 29.

12 Hills, *Fan Cultures*, 35.

13 Ibid.

14 Hills, *Fan Cultures*, 28.

15 Lisa Taylor and Andrew Willis, *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 (Oxford: Blackwell, 1999).

16 Hills, *Fan Cultures*, 29.

17 See my article “Should Fan Fiction Be Free?” *Cinema Journal* 48, no. 4 (Summer 2009).

18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90.

19 Ibid.

20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90–1.

21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93.

22 Terranova, *Network Culture*, 92.

23 Andrew Ross, “关于数字劳动问题”，2009年9月29日在the New School的互联网游乐场和工厂预见会上发表的论文。可在https://lists.thing.net/pipermail/idc/2009-November/004039.html查阅。

24同上。

25同上。

参考文献

Hebdige, Dick.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 Reprint, London: Routledge, 2006.

Hills, Matt. *Fan Cul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Keen, Andrew.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Currency, 2007.

Ross, Andrew. "On the Digital Labor Ques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pre-conference at The New School, September 29, 2009. Available at https://lists. thing. net/pipermail/idc/2009-November/004039.html.

Taylor, Lisa, and Andrew Willis. *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 Oxford: Blackwell, 1999.

Terranova, Tiziana.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4.

Thornton, Sarah.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超越生命政治的数字、劳动力和测量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本章转向最近的技术科学发展，以重新思考情感劳动与数学(数字)计量形式的关系的价值。我特别关注Luciana Parisi的作品，因为我在这里的目的和她的一样，都是要描绘出这些发展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含义，至少要描绘出思想上的转变，或者他们可能引发的对思想的思考(以及未被思考的)。由于Parisi将哲学话语作为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批判性分析的指导，同时也作为她最终希望贡献的话语，我也希望这样做。虽然专注于过程的哲学——尤其是吉尔·德勒兹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的哲学——是Parisi所吸引的，但我将这些哲学与思辨性现实主义哲学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进行了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表明，哲学，即使是无意识地，正在被纳米技术的技术科学发展的含义所吸引，以及它在努力使物质的微观影响富有成效时所提出的测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哲学目前正在记录经济、情感劳动和生物政治治理的重新配置。

纳米技术和测量物质的影响

在她最近对纳米技术的分析中，Luciana Parisi报告说，纳米技术的特别新颖之处在于纳米机器可以“重新排列每个原子的位置”(2012:48, n. 2)。这意味着“每个原子都可以被放置在一个选定的位置，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设计的生命系统的一个活跃的或结构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这种控制原子位置的新能力表明，“分子的高速振荡和模糊性，这是量子物理学发现的核心，不再是由粒子和波之间的原子叠加所定义的绝对不确定性。”相反，模糊性提供了一种混沌的不稳定性，可以转化为“奇怪的动态生产力”(Parisi 2012: 49, n. 2)。在纳米尺度上，Parisi继续说，“粒子可以变成概率波，跨越不可穿透的障碍，同时占据两个位置，并预测未来的状态”(Parisi 2012: 33)。

从纳米技术科学到人造原子的纳米设计，被商标为“可编程物质”，其目的，正如Parisi所看到的，是“消除材料的物理组成——原子、光子、质子、电子——及其特性之间的区别，如颜色、形状、平滑度、亮度等等。”使得“材料可以像软件的设计和调试一样瞬间改变其实体”(Parisi 2012: 38)。Parisi总结道，

> 通过进入纯势能的领域——颜色、形状、粗糙度、电、矢量等，可编程物质承诺了一种瞬时实现势能的架构....在这里，控制不再是通过预测来计算未来，或者通过预先设定的概率来计算未知。相反，生物物理偶然性的消失与不确定性的纳米编程成正比，即在思想和扩展的设计中包含模糊状态。(Parisi2012:39

–

我详细地引用了Parisi的一篇文章来阐述我对测量的讨论，就像她把她对计算和计算的讨论放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中一样(Parisi 2009a, 2009b, 2009c)。纳米技术的发展也意味着我在2007年与格雷格·戈德伯格、雷切尔·希夫、亚伦·威克斯和克雷格·威尔斯合著的题为“对情感本身理论的注释”的出版物中回归到与劳动、情感和测量接触的早期时刻。我们利用了乔治·卡芬齐斯的不同意见

哈特和内格里认为非物质或情感劳动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相反，卡芬齐斯认为，资本主义“将一种极其量化的生活形式强加于其组成部分”，他对不可测量的主张提出了警告，并提出资本家一直在寻找、现在仍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衡量最初看似不可测量的东西。卡芬齐斯不仅认为剥削仍然可以用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来衡量，而且他还提出，那些抵制资本主义的人必须具有与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数量能力相匹配的数量能力

虽然考虑到卡芬齐斯对度量和资本主义定量能力的兴趣，我们觉得情感劳动的可测量性或不可测量性的问题必须以不同于劳动者生产时间的方式提出，因为情感劳动如保罗·维尔诺(2004)等人所拥有的那样，甚至超越了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中交流和认知能力的劳动，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劳动，成为生命政治社会中的情感劳动，在生命政治社会中，情感指的是一种前个体的、无意识的、非认知的、主观的身体能力，可以影响或被影响。在这里，情感是向未来实现开放的不合格强度的矢量，是一种纯粹的潜能。以这种方式定义，情感劳动向我和我的合著者提出了纯粹潜能或强度向量的具体化问题，与劳动者的有机身体形成对比。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身体是情感的身体，或者什么是强度向量的体现。我们怀疑它可能是模仿人类有机体或人类劳动者的身体。如果衡量和其他劳动一样是情感劳动的核心，我们就会问应该如何衡量情感

身体、情感和媒体技术

前面关于情感的定义来自于Brian Massumi所采用的哲学传统、德勒兹和怀特海的哲学，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斯宾诺莎和柏格森。虽然Massumi(2002)发展了他的情感概念化的大部分是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人类有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但他将情感概念化为个体前潜能，与德勒兹的虚拟性产生共鸣，似乎让情感从人类有机体中溜走了。事实上，Massumi有时确实指出，在物质的不同尺度上，影响是潜在的或不确定的。那么，情感似乎指向了身体和物质/能量的重新配置;情感可能被人的身体或被设想为有机体的身体以外的身体所体验并成为身体的体验。

在《关于情感本身理论的笔记》中，我和我的合著者专注于情感的技术框架，从Massumi测量情感的技术开始，将其作为意识体验之前的一小部分时间，一种技术增强或测量装置，理论上被Massumi忽略了，但对于他的前意识影响的例子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前意识影响是在意识出现之前的一段可测量的时间，这种测量必然会将情感推向意识，将虚拟推向现实，虽然不会耗尽虚拟性或情感潜能。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情感是潜在的，因此，不能被实现，只能被实现;实现化只能是从虚拟中发明出来的问题，而虚拟本身在本体论上仍然是虚拟的。在我和我的合著者看来，也许可以把情感的身体想象成一种技术集合或一种测量技术，其中测量在不消耗或完全捕获的情况下进行测量，这是一种计算上开放的测量技术。

在《热死:基因工程和人工生命中的出现和控制》一书中，帕里西和Tiziana特拉诺瓦(2000)提供了一种开始解决我们疑问的方法。《热死》提供了身体、技术和劳动(重新)配置的谱系，使我们有可能把身体作为有机体仅仅看作是一个形象，一个历史上特定的形象，关于身体是什么或它能做什么。帕里西和特拉诺瓦关注自创生，即身体作为有机体的特征，他们认为，直到19世纪，作为自创生有机体的身体才成为身体是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的象征。他们继续提出，这种身体的形象适合19世纪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纪律社会，“在那里，在身体外部和身体之间循环的流体被折叠到自己身上，以便在有机体/自我/主体的坚固墙壁内被引导”(帕里西和特拉诺瓦 2000: 4)

作为有机体的身体被组织为“在积累和消耗的热力学循环内进行繁殖;并接受工作训练”(帕里西和特拉诺瓦，2000年);5)在这里，帕里西和特拉诺瓦提出，身体是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物质力量组织模式，由资本投入到存在中，并通过生物学、物理学、神经科学、医学等各种话语加以阐述，重新配置工作、身体、生产和再生产。

如果情感的转向是对身体、劳动和技术的重新配置的记录，正如我和我的合著者继续论证的那样，那么我们也想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科学，它们现在提出信息是物质/的一般理论

3 .热力学只是一个特例在这里，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影响都指向物质固有的自组织，或者物质具有信息或信息的能力。它也指向支持数学的数字技术，这种数学能够附着和调节身体物质和一般物质的信息基质，因此技术科学——例如，生物媒体和新媒体——将基思·安塞尔-皮尔逊(1999)所说的“后生物阈值”引入“生命本身”。也就是说，这些技术正在改变身体所能做的事情或其情感能力，后生物学是一个门槛或限制。然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认为在她对纳米技术的论述中，帕里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限制在思考身体、情感、技术和劳动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也指向了最近关于本体论的哲学辩论。

自2007年《情感本身理论笔记》出版以来，情感作为一种技术组合的思想已经通过关于情感、媒体、技术、治理和经济的跨学科讨论得到了完善。这是因为媒体研究话语已经将其焦点从大众传播的技术和使用转移到感知和感觉的影响或能力，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感知和感觉。事实上，媒体正在被定义为人类感知作为存在和感觉的假定中心的减法。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写了一篇关于声音技术的文章,倾向于德勒兹和怀特黑德的过程哲学，他认为:“如果我们减去人类的感知，一切都会移动....在分子或量子水平上，一切都在运动，都在振动”(古德曼2009:83)。对于主观性和客观性而言，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体被另一个实体所感知。“所有的实体，”古德曼继续说道，“都是潜在的媒介，它们能够感受到或其他实体能够感受到它们的振动”(古德曼2009:83)。在这里，媒体被理解为非人类中心的影响，其中“影响是维度之间的过渡、门户和通道”，正如Jussi Parikka所说(Parikka 2010: xxvi)。

在这些术语中，媒体被更广泛地描述为“世界力量的收缩，形成特定的共鸣”

环境”(Parikka 2010: xiv)，因此中介是偶然的和内在的。中介(如果它甚至应该被称为中介)不是关于连接两个或多个实体，尽管根据上述实体的定义，它们是媒介，它们确实连接其他实体。尽管如此，对于古德曼和Parikka等理论家来说，将调解描述为调节、强化或去强化节奏和力量可能更好，这些节奏和力量既属于人类感知，也高于人类，高于人类。在这里，媒介被扩展到有机的、非有机的、化学的和神经化学的各种平台。正如Parikka总结的那样:“与其说我们*拥有*媒体，不如说我们本身*就是*媒体，又是媒体的一部分;媒体……在混乱上空投放了一架飞机”(Parikka 2010: xxvii)。

媒体的这一定义借鉴了当代对集合的思考，认为它是一种情感(去)强化的模式——也就是说，对感觉、感知和概念的提供，以及它们在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强度调节。因此，对效果的分析不是将它们作为预先确定的条件的最终结果，而是立即作为影响和进一步影响可能性的原因或条件。这就是Massumi所说的“准因果性”的工作原理，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实现或个体化中不确定性的(永恒的)回归这些实现化和个体化很可能被认为是情感的身体，这些关于媒介的讨论所激发的身体。如果所有实体都是情感媒介，那么他们可能会分享伊丽莎白格罗兹对身体的定义:“不连续的，不可总计的一系列过程，器官，流动，能量，有形实体和无形事件，速度和持续时间”(格罗兹1994:164)，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对媒介组合及其强度调节的提供是开放的。考虑到媒体是情感的体现，身体是情感的媒介，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实体或物体应该如何被思考，或者当作为有机体的身体不再是生命的形象，有机物质不再比非有机物质更有特权时，关系如何被思考。最后，解决这些问题与度量和情感劳动有什么关系?

握住，媒体技术，和测量

虽然帕里西一直依赖德勒兹，但她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怀特海。正是怀特海的哲学伴随着帕里西观察到对技术科学的持续投资，以及对数学技术的阐述，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正如纳米技术所意味着的那样，进化、适应、以及改变，从而取代后生物学作为思想和物质延伸的视界。我认为，之所以转向怀特海，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过程的思考与德勒兹的不同。怀特海关注的是实体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实体确实形成了;它们生而灭(怀特海，1978)。以这种方式，它们产生了空间/时间，而德勒兹的虚拟、纯粹过去和持续的概念把一切都放在时间中，把所有实体放在关系中，如果不是相互关系，也是与虚拟关系。对怀特海来说，虽然存在着变化，但这是他所描述的"融合"的问题，通过一种新的结合或多种理解的结合，实际的变化，其中理解是一种前意识，前个体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一个实际的场合(实体)接受并回应另一个。一切事物，不仅仅是人类，都在理解每一件事物的朝向;它在经历它的形成时，从世界中退缩或向世界前进。套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把握是一种“决定”，消除潜在的场合，划定一个特定的场合，这个场合消失后，成为另一个场合或一组场合的过去或“基准”，这些场合作为一个“社会”而持续存在——再次套用怀特海的术语。帕里西设想的纳米技术的方向恰恰是理解。

毕竟，正如帕里西所看到的那样，纳米技术旨在“用物质和思想的纳米程序替代生物物理材料”(帕里西 2012: 40)。这超越了技术与人类的结合;也超越了半机械人和基因工程。这是因为纳米技术启动了“物质有机本质的无机重新编程过程”，迫使“生物生命面对其量子状态的远非平衡动力学”(帕里西 2012: 40)。纳米技术意味着对所有物质层面的理解体验进行重新编程，尤其是对怀特海所说的“永恒物体”的理解，或者对属于每个实体的潜力的理解，当每个实体变成自己的时候，“进入”到它里面。因此，对帕里西来说，纳米编程的目标不是原子，而是原子的把握——尤其是它对永恒物体的潜力的把握。正如帕里西所说:

如果原子理解它们在颜色、形状、尺寸、电力上的嬗变，那是因为它们理解

> 永恒的对象进入他们的现实。然而，这些原子的把握不过是对更多潜力的渴望，对纯粹的力量的渴望，以成为空间和时间的新形式，新的皮肤和新的认知架构。因此，物质的纳米编程间接地使原子的欲望成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实际经验场合的数据。(2012: 48)

换句话说，纳米技术的目标是通过人为地提供在任何物质水平上都没有实际经历过的体验的基准，来编程潜能。让潜能成为可体验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人类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控制潜能，不如说是为了让它更有生产力，更奇怪地有生产力。Parisi总结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纯粹思辩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需要为了体验现实而生活，也不需要为了成为现实而具身思想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数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或“生活和思想的数学化或计算”(Parisi 2012: 48)。在这里，数学化作为一种测量技术而起作用，在那里我们进入了不可计算或计算开放的领域

但是，当然，关注潜能的技术科学调制，或者上面所说的影响，指向一个计算上开放的计算或测量，这并不奇怪。毕竟，如果不对影响或潜能进行调制，或者对其量子状态的远离平衡的动力学进行测量，如果不影响潜能的向量，将潜能推向实现，是无法测量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开头所述的影响或潜力被认为是不可测量的。但Parisi所说的计算开放或不可计算指向一种数学，一种可以很好地测量影响或潜力的测量。这是因为与她正在探索的数字建筑相关的数学与曲线有关。

在她所谓的共生建筑的数字理解的处理中，Parisi回到了关于线和曲线的古老辩论，那些“似乎过于依赖于线的局限性，而没有完全遵循曲线的迷宫”的建筑(Parisi 2009c: 349)。她探索了并行算法的发展，这些算法将软件架构从遗传算法转移到交互式艺术和媒体的“寄生架构”部署(Parisi 2009c: 348)。这种结构允许“不可预见的曲率进入”，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证明病毒生态或0和15之间信息密集折叠的数学上(Parisi 2009c: 363)。这些工作作为未来或潜力的投机性激活器。正如Parisi所说:“并行算法嵌套在彼此的活动中，在交互环境中交易和分配变化。”这使得

“不同处理器之间的同时通信，共享内存和消息传输。”这些通信涉及许多非常简单的算法，然而，这些算法不会导致“一种算法或另一种算法的进化，而是导致新的算法行为”(Parisi 2009c: 357)。

在这里，Parisi借鉴了林恩·马古利斯关于多细胞生物或真核生物起源的内共生概念。内共生不同于随机突变的累积选择的遗传学。相反，进化是通过平行实体的方式发生的，这些实体的独立活动在任何新的合成物中都保持独立的活性。并行处理不能包含在单一谱系中，也不能以亲缘关系的方式继承;相反，它指向“进化中的迷宫”(Parisi2009c: 358)。然后，并行算法的共生架构可以考虑并影响尚未经历过的经验维度，或者在时空块之间转换，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病毒式地跨越边界。对Parisi来说，这是一个抽象的机器，它需要“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局部的工程拼凑，相互融合和分裂，但在过渡点属于一起，这些点不像拐点，临界阈值，“难以察觉的连续性的曲率”或“原子内部和原子之间的空间，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在虚拟中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计算的物质性”(Parisi 2009a: 82)。因此，软件编程的共生算法将曲率作为其计算设计的一部分;它涉及“可拓的生物数学特征”(Parisi 2009c: 360)。

根据数学家Gregory Chaitlin的工作，帕里西认为这是一种感性的数学，它将增加到概率演算中“0和1极限的模糊或不完整的量”(帕里西 2009c)。这些不确定性“将二元状态的逻辑“是”和“否”，转化为“可能”和“*也许”的模糊状态*。“这些不确定性，”帕里西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数字二元论的定性呈现”，而是要用新的量化过程来理解，这种量化过程认识到“信息的密集区域是0和1的密集包围。”由“在计算上保持开放的内在数值变异性”定义的区域(帕里西 2009c: 363)。帕里西还借鉴了Greg Lynn，他的软件架构也利用了无限小的信息间隔。在这种情况下，计算仍然是开放的，或者“延伸变成了弯曲或*感染*”，其中“主动和被动的寄生力标志着环境的斜度，这种斜度永远不会达到平衡点，因为任何稳定性都是由吸引力和排斥力矢量引导的”(帕里西 2009c: 364)。

这种数学允许一种暴露曲率的软件设计，超越可能性，因为未来思想和物质扩展的纳米编程是必要的，测量影响或潜力也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允许测量之外的测量的数学

概率的;这样的衡量是单一的，但又富有成效的，因为衡量只能调节和改变潜力或影响的强度。因此，度量的尺度必然会随着每一次度量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度量是一种审美度量或情感度量，将审美度量理解为单一的、不可概括的、特定于每一个事件或每一个潜在的调制。它是一种允许体验不可感知的事物、理解的尺度，并因此允许它们的调节。然而，这种体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体验，而是每一个尺度的物质体验;的确，有一种指向无尺度物质的手势。然而，对于帕里西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声称最终透明的数学度量，而是她在怀特黑德的描述中所描述的，它带有“世界的尘埃”，“物质的黑暗情感”，不可计算的(帕里西2009c: 266-7)。然而，有了纳米技术，似乎有一种努力，可以更接近这种暗物质，以便能够调节其潜力，更接近“情感力量，其秩序、结构或模式尚未普遍化，而是保持分散、不连续，思想和扩展模式的多样性的无限实例”(帕里西 2012: 37)。

我现在转向对物质中的思想和扩展的数学化或计算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之后，我将回到帕里西作品中更为流行的过程哲学和思辨的现实主义哲学之间的对比的讨论，我将论证这些哲学和现实主义哲学也涉及数学和技术科学，这些哲学和技术科学吸引了她进行哲学反思。当然，帕里西不仅从事哲学反思;她还关注技术科学、政治和经济纠缠在一起的含义。根据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y)的当前讨论，帕里西与其他人一起讨论了先发制人(preemption)，一种通过调节记忆和时间的经验，在每一个尺度上抢占未来的治理模式;她还介绍了她所谓的“先发制人/全面力量”，指的是纳米技术的目标是“无形地重新调整人类束缚的身体和思想的生物基础”(帕里西 2012: 48)。

毕竟，控制社会这一术语意在指出一种规范性的(如果不是强迫性的)对自我的关注，一种权力的分散，甚至是对前个体的非个人领域(如情感)的分散，伴随着对公民社会机构空间的平滑，利用公民社会机构日益增加的不愿或无法社会化，向个人灌输民族国家的理想。它还指出了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的全球延伸，以及它们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经济、国家和市场的重新配置。虽然控制社会与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的转变不约而同，后者更多地关注物种生命，用跨人口的生活能力来表达，但向先发制人/集约权力的转变是对物质的每一个尺度的控制的强化，是一种宇宙学政治。这是一次会议

用曲线控制。正如Parisi所说:“光滑空间的数学在对美学曲率或连续变化的后控制论控制中变得有效……弯曲空间的控制本身”(Parisi 2009b: 9)

这种控制的强化让人想起了福柯在他1970年代关于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演讲中讨论措施的方式。正如Tiziana Terranova所说:

> 特别是福柯的讲座，让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现实，并没有简单地将生活纳入其经济生产过程，而是实际上把生活作为一种重新定义全新政治理性的手段，在这种理性中，经济过程和生命过程从一开始就深深地交织在一起。(Terranova 2009: 235)

正如福柯所看到的那样，市场推动治理关注于通过环境确保流通，进入生活或自然以使其良好运作。保护自然，或能够人为地优化自然过程，有助于限制主权在治理中的功能，因为治理成为对环境的生命政治行动:首先是城镇，最后是更抽象的东西，比如从未达到平衡点的倾斜环境。

环境指的是福柯所描述的一系列事件，这是一种异质性的、没有起源或终点的，或者以结果和原因的可逆性为特征的连续性(福柯2007:20)，这种连续性很像德勒兹(1990)所写的系列。这个系列应该从时空拓扑的角度来理解，它解释了物体之间、一个记忆对另一个记忆之间的非线性混沌作用，这是一种量子非定域性。在这里，我们看到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治理超越了统计人口的概率，后者被福柯视为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治理的核心。这一举动是超越对概率的捕获而创造的过剩。这是向先发制人/密集力量的转变，是向曲线的转变，它唤起了0和1之间生动的区间的另一种生动的数学度量。

有了这个尺度，数字深度提供了不可计算的尺度，一种适合于超越生物力量的、针对出现或潜力的条件的潜力的尺度——全面。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的产生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的，或者是在通过生产积累的资本之外的。所谓的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或者最近的影响经济，指的是通过全面的工作来积累财富，即上文所说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影响，这是一种抽象，通过过去对工人的教育和福利的投资以及技术管理的升级而带来的，这越来越不是

被认为是反对创造和发明的。然而，通过教育、医疗保健、控制生育、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条款的私有化和稀薄化，以及随着数字网络的开放性继续对希望遏制它的政府和大公司具有吸引力，创造力和发明正在变得稀缺。而正是这种稀缺性，为概率测度以外的测度提供了动力，甚至超越了概率测度。它是一种产生对度量的迷恋的度量，将文字、数字、图像和图表整合在一起，将度量变成已经存在的未来的诱人证据，一个先发制人的未来，不仅因为它调节了人类的时间记忆，而且还调节了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时间记忆，纳米技术的可编程物质的形成。

美学，测量和对象

随着尺度变得越来越特殊和有影响力，必然会改变下一个尺度的尺度，人们对美学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是哲学回归本体论的一部分;这是将情感作为对所有实体的本体论把握的第一原则的回归。这种取向暗示了一种非人道主义，或客体的民主，它不假定人是存在和情感的中心。因此，对象取向提出，所有对象都具有相同的本体论权重，即每个对象都可以影响其他对象，也可以被其他对象影响。这当然取代了人类作为应该受到哲学关注的唯一能动者;当然，德勒兹和怀特黑德也有同样的担忧。

然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对所谓的“相关主义”提出了批评，或者假设“不可能说一个世界本身先于人类存在，而只能说一个世界先于人类存在”，正如Graham哈曼所说(2009:122);他还在对关联主义的批判中加入了对他所谓的“关系主义”的批判。哈曼反对对象是通过与其他对象的关系而构成的观点，强调对象不能简化为它们的关系。没有关系会使一个对象穷尽;它的存在超越了它的关系。在他对关系主义的批判中，哈曼采取了比德勒兹或怀特黑德更激进的对象导向。

德勒兹和怀特黑德的观点不同，但他们认为关系是客体的外在——也就是说，客体并没有被还原为它们的关系;尽管如此，对象不可能像哈曼所说的那样存在于所有关系之外。哈曼的立场指向帕里西在追随德勒兹的写作中所假设的虚拟或虚拟性，以及在追随怀特黑德时所指向的永恒客体的潜力。对哈曼来说，虚拟或潜在的假设“破坏”了对象，表明一种动态存在于它们的下面或外面，通常是在前个体的尺度上。正如哈曼所看到的那样，它也“掩盖”了对象，并导致了对对象存在虚假的指控;认为重要的东西必须在过程、事件和动态性中寻找，这些都是客体的一部分，但却是作为一种永恒回归的不确定性的过剩。虽然哈曼认识到怀特黑德与德勒兹的不同，欣赏怀特黑德对存在和毁灭的对象的规范，帕里西在她的“不可计算的唯物主义”中采纳了这一点，然而，哈曼的对象取向使他批判了怀特黑德关于永恒对象的概念，因为永恒对象指向对象之外的一种潜能。哈曼还认为，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思辨转向也对唯物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按照他的说法，唯物主义以某种破坏和过度挖掘的组合方式填补了对象之间的所有空白。这一切都是说，客体成为关联的方式和关系的方式

成为客体对哈曼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所做的工作。

很明显，对哈曼来说，客体的本体论取向意味着客体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客体的真实性;没有其他的能动者使一个对象真实，或者不属于这个真实的对象本身。因此，对哈曼来说，关于物体以及它们如何进入关系可以这样说:哈曼认为物体有四重特征，提出物体有两种类型:真实的物体和感性或意向性的的物体。真实的客体被从关系中抽离出来，尽管如此，关系仍然作为客体的感性侧面(或感性客体)的一部分同时存在。因此，真实的对象与它成为它所需要的原始品质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实的对象是类似于本质的东西，但不是永恒的东西)。真实的客体也不同于出现在对另一个客体的特定感官翻译中——或者在人类领域中我们称之为主体的东西——的次要品质。感官客体具有直接可用于关系的次要品质。然而，感官对象的所有品质的总体是被淹没的，与意向性的或感官对象不同:感官对象总是小于它的所有品质(哈曼2009:135-48)。

因此，不可接近的、被“防火墙”切断的真实客体只能通过感性客体进入关系。相比之下，感官对象只能通过现实对象进行接触。哈曼用“替代因果关系”来解释真实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由替代引起的，或者感觉对象是真实对象的替代。进一步说，这样形成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客体。感性对象允许两个真实对象发生联系，这就形成了感性对象和真实对象在其中接触的新对象。对哈曼来说，当真实的物体通过感性的物体接触时，因果关系是诱人的或有感情的，因此，所有的物体都可能对所有其他物体具有吸引力，尽管有些物体比其他物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我强调了哈曼对物体的态度，因为它把注意力转向了物体的主要和次要品质，假设后者——颜色、味道或热量——被理解为主体的感知品质。与之相反，主要品质属于客体本身，如长度、宽度和深度。但在质疑相关主义和关系主义时，主要品质和次要品质的区别就受到了困扰。有人建议，所有的品质都可以被认为是次要的，虽然在客体之间的关系中是可转换的，从人类意识的特权中移除。然而，在真实对象的撤退中，当感性对象吸引其他对象时，真实对象受到了哲学的保护，而它的主要和次要品质则被开放给深刻的转变——让我们说，通过纳米技术这样的技术科学。毕竟，帕里西提出，纳米技术正在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学技术，这些技术似乎正在呈现曲线，在物质中进行扩展，或者对永恒物体的理解，

可操作性和可体验性;纳米技术意味着消除材料的物理组成——原子、光子、质子、电子——和它们的性质(如颜色、形状、平滑度、亮度等)之间的差别，从而使材料能够瞬间改变其实体

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哲学和面向对象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揭示出劳动、技术、身体和情感在政治、经济和政府方面的特殊配置。虽然过程哲学使帕里西等批评家能够关注技术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捕获和操纵潜力的能力，从而影响生活、劳动和物质，当技术科学和资本的投资不断寻求捕获每一个度量的过剩时,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可能会被批判性地使用;当潜在和虚拟不再具有正价或只有正价时，面向对象的哲学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哲学基础。当劳动被认为是情感的工作时，哲学辩论的利害关系可能很高;这些辩论的抽象性，或许正是能够给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治理与数字的关系上的批判提供购买的东西。

备注

彼得·盖里森在介绍他所谓的“纳米制造”时提出，纳米技术正在把测量从表象变成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测量是同时进行的制造和操作。通过使用允许触摸和操纵纳米管甚至病毒的设备，技术科学家被允许进行“虚拟交互”，或者他或她获得“以大约一百万比一的比例在表面上的虚拟存在....”纳米领域的想象已经从一种被动接受的形式转变为操纵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日常日益增加的触觉工具，可以用来制造一个非常小的世界”(盖里森 2007: 173)。Gallison总结道:“我们早期形成的哲学理想可能需要赶上一种非常不同的科学形式”(2007:173)。我在这里所做的努力是要呈现一些批判性地回应这种认识的本体论基础的重新配置的作品。

卡芬齐斯还提出，物理学对劳动价值论至关重要:“物理学……为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分析和新的组织计划。”它的模型可能看起来抽象，但它们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卡芬齐斯1992: 220)。此外，卡芬齐还认为，随着图灵机的发明，热力学为工业劳动中的能量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计算机也为所有劳动(通常被认为是熟练劳动)的计算过程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而是“隐含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所有部分”(卡芬齐斯1997:52)。

在考虑劳动价值论时，肖恩·库比特的文章也谈到了包括人类劳动以外的劳动的重要性。情感劳动与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和索恩克·泽勒(Soenke Zehle)对代码文化和算法技术的批判性参与也有联系。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没有重新思考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对思维劳动、情感及其衡量的影响。

现在，信息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规律，即“信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这说明了信息的物质性。(参见C. Seife 2006)

对于Massumi来说，“准因果关系”是敏感-情感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给回应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它表达了一种从质量上感知和被影响的全球能力

改变。它注入了一种客观不受控制的程度，一种事件的边缘，一种活力”(Massumi 2002: 225)。

关于计算和什么是不可计算的，有很多可说的。我想指出David Berry的《*软件哲学:数字时代的代码和调解*》(2011)，因为它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了这些问题，适合这里讨论的面向对象哲学和过程哲学。

针对这篇文章的草稿，肖恩·库比特问了我一个重要的问题，并要求我澄清。我将在这里回答他关于单一度量和每个度量变化的度量的问题的政治含义。库比特在给我的评论中指出了度量单位的重复，但我在这里想要的(我认为，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与他在这个合集中的文章产生了共鸣)是我们认为不可测量的，因此充满活力的，支持对机会丧失的抵抗的东西可能变得可测量，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或者重新思考偶然性、不确定性或开放的未来。我的意思是，纳米技术及其数学已经在要求我们对动态物质的虚拟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进行不同的思考，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测量方式，使得对不确定性的持续操纵(如果不是捕捉的话)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重复相同的东西。政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测量必须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库比特将他的政治观点建立在那些被排除在群体或群体可能性之外的人身上。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政治上被排除在外的人往往在经济上被纳入人口(社会服务和/或警务的目标)(Clough和Willse 2011)。这是另一种方式，这些人群的情感能力或无能是开放的测量和测量情感的盈利劳动的生产率。这种对政治上被排斥的人群的经济包容的理解，是福柯在他关于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做出的贡献，库比特也在对此做出回应。

尚不清楚的是，思辨现实主义的面向对象本体论是否构成了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健康症状，还是它们为批评和政治提供了一个基础。我只想强调，这些哲学趋势应该与资本投资的技术科学发展的转变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Ansell-Pearson, K. (1999) *Germinal Life,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Deleuze.* New York: Routledge.

Berry, D. M. (2011) *The Philosophy of Software: Code and Medi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affentzis, G. (1992) "The Work Energy Crisis and the Apocalypse," in *Midnight Oil: Work, Energy, War, 1973–1992.* New York: Autonomedia.

Clough, P., Greg Goldberg, Rachel Schiff, Aaron Weeks, and Craig Willse (2007) "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Affect-Itself," *Ephemera* 7, no. 1: 60–77.

Clough, P., and Craig Willse (2011) "Gendered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Branding and Population Racism," in *Beyond Biopolitics: Essays in the Governance of Life and Death,* eds. Patricia Clough and Craig Willse, 46–6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 (1990)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lated by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 ge de France, 1977–78.* New York: Picador.

Gallison, P. (2007) "Nanofacture," in *Sensorium: Embodied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Art,* ed. Caroline A. Jones, 171–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oodman, S. (2009) *Sonic Warfare: Sound, Affect and the Ecology of Fe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osz, Elizabeth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man, G. (2009)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Melbourne: re.press.

Massumi, B. (2002)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ikka, J. (2010) *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risi, L. (2009a) "The Adventures of a Sex," in *Deleuze and Queer Theory,* eds. Chrysanthi Nigianni and Merl Storr, 1–2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arisi, L. (2009b) "The Labyrinth of the Continuum: Topological Control and Mereotopologies of Abstraction," Presented at Changing Cultures: Cultures of Change,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Parisi, L. (2009c) "Symbiotic Architecture: Prehending Digital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6: 347–79.

Parisi, L. (2012) "Nanoarchitectures: The Arrival of Synthetic Extensions and Thoughts," in *Digital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s, Affec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ed. Adi Kuntsman, 33–51. New York: Palgrave.

Parisi, L., and Tiziana Terranova (2000) "Heat-Death: Emergence and Control in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Life," *CTheory*, May 10,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127.

Seife, C. (2006) *Decoding the Universe: How the New Science of Information Is Explaining Everything in the Cosmos, from Our Brains to Black Hol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Terranova, T. (2009) "Another Life: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Foucault's Genealogy of Biopoli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6: 234–62.

Virno, P.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lated by I. Bertoletti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e).

Whitehead, A. N.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8
随便写博客

Jodi Dean

1

2007年，电子商务人士对美国青少年阿什利·奎尔斯的成功感到兴奋。到17岁时，奎尔斯每年从Whateverlife.com上赚到100多万美元。这个粉红色的网站是她设计的，用来推销MySpace的页面布局。不过，用“*市场*”这个词并不十分准确。她的布局和插件都是非卖品。它们是免费的。她的收入来自广告。由于Whateverlife.com每月的点击量超过6000万次，超过了几家最受欢迎的英语青少年杂志的发行量总和，它为广告商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商品:少女的眼球。奎尔斯，或者叫自己阿什博，在2004年创办了Whateverlife.com。到2007年，她已经把她的网站扩展成一个女孩社区，一个女孩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布局教程，以及各种各样的图像、横幅、标题、按钮和框来装饰她们的MySpace页面。除了创收广告外，Whateverlife.com(拥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设计师)还推出了一份杂志，并在阿什博的MySpace页面上提供了她博客的链接。

尽管奎尔斯的受欢迎程度不同寻常，但她的形象符合美国博主的主流特征:她不到30岁，而且是女性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关于青少年和社交媒体的报告提供了一些背景:美国只有8%的成年互联网用户创建了博客，但28%的在线青少年写博客，而这些人最有可能是女孩。奎尔斯将她的网站描述为“一个表达你自己的地方”，重复了大多数美国博主写博客的原因:希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到2007年，她从Whateverlife.com上赚到的钱足以让她从高中辍学并买了一套房子

阿什利·奎尔斯将博客描述为一种流行的技术实践，内容生产、媒体使用和多平台集成融入日常生活，使得在线和离线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与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提供的统计快照一起，这张照片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接触到一个关于博客和社交网络的真相:它们是由十几岁的女孩创建的，也是为十几岁的女孩服务的。博客和社交网络都产生了情感空间，女孩们在这里表达自己，分享自己的感受，并带着一点希望伸出援手，希望有人会被感动，并给予回应。通过网络青少年的强烈情感世界来访问，博客并不局限于一个与其他媒体分离的领域。它们位于一个由多个平台和应用程序(手机、社交网站、视频、音乐和照片分享网站)组成的丰富的交流栖息地。在那时，博客似乎是一种方式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报道、分享、体验，甚至推销我们的社交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从每一个发自内心的表达中获得广告收入。情感是可以盈利的。

通过统计数据和单个博主的经验相结合而构成的形象过于简单，即使它突出了当代网络媒体的单一和众多特征之间的并置。与其依靠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不可能的整体，我们不如将个性化媒体的兴起视为一种大众现象和实践。到2008年，博客的数量从8000万增加到1.2亿这些博客中的绝大多数在几个月内出现并消亡，几乎没有读者看到过。博客数量众多，数不胜数，是一套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独特表达方式。与此同时，博客服务提供的标准化——基本的页面布局、存档功能、标题、横幅、广告和小工具——最终使博客成为可互换的、相同的、几乎无法区分的。

使博客成为博客的通用格式是单个博主的独特作品的一个条件。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独特的产品，事实上，没有每一种声音都能被听到、每一种经历都被记录下来、每一种观点都能被表达出来的承诺，博客就没有意义。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处理同样的纠缠:博客同时提供了曝光和匿名性。作为博主，我们暴露自己，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和恨，欲望和厌恶。然而，我们经常在写作时，仿佛我们几乎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只向少数人，向我们信任的一小群人敞开心扉，也许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很清楚自己只是千百万人中的一员，所以没有那么多点击率、那么多评论，我们可能会松一口气。陌生人和对手提醒我们，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度、我们的脆弱，以及我们最终的失控。

博客可以成为有用的政治工具:他们让活动人士报告他们的活动、计划和愿望。博客帮助他们会面和协调。与此同时，他们向活动人士的反对者传递了很多信息——大学官员想知道哪些学生应对静坐负责，执法官员试图减少计划示威活动的影响，以阻止活动人士*走得太远*。隐私和消费者保护倡导者提醒我们，消费者数据的积累，这些数据很容易被挖掘出来，以满足越来越具体和个性化的广告目标。然而，这些需要保护的信息是数百万博客和社交网络个人资料的公开内容。博客让监控变得容易。*没有必要监视!我会告诉你一切——甚至更多!*简而言之，博客依赖于一种曝光的幻想，而不是与难以区分的大量独特事物相关的曝光。这就像说出一个秘密的兴奋感，而不会因为被告知而感到焦虑——没有曝光的曝光。

MySpace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也实现了类似的幻想——人们可以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因为一个人在他的网络中特别加了朋友，他可以放心，他的秘密是安全的。*如果你不能信任你*的*朋友*，*你还能信任谁*?另一方面，扩大人脉的动力*(看!我是个大人物!我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他们喜欢我;(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把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生活中不同部分的人加为好友，掩盖了对个人信息控制的幻觉。不仅一个人的数据被分享给第三方，社交网络环境中蓬勃发展的调查和游戏也扩大了第三方的访问: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典型的Facebook个人资料会显示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生日、位置、职业、高中和/或大学、关系状况、性取向、政治派别、宗教和个人外貌。再加上大多数用户会提到他们参加的活动、他们所属的团体和他们支持的事业，结果就是高度曝光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以偏转的方式回应这些看似偏执的想法——数据被收集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一个集合体。这是*我们*的模式，不是*我的*。重要的是*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参考一部新电影或点击一个广告，而不是我是否这样做。和写博客一样，我们对社交网络的参与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曝光了却没有被曝光，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但最终无法区分。

3

多米尼克·佩特曼发展了乔治·阿甘本提出的概念，从“任何存在”的角度考虑了可互换但不可替代的问题。对于佩特曼和阿甘本来说，任何存在都指向新的社区模式和新的人格形式，这是通过公民身份、种族和其他现代归属标志来消解同一性的铭文所预期的。佩特曼将角色演员描述为任何存在的典范，将这一概念解释为“没有品质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可以互换和明显地抹去所有同一性的品质。”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存在的纯粹一般潜能”的标签。[6]

阿甘本强调，在任何存在中，“无论什么”与奇点无关，与共同属性无关，“而只是与它的*存在*有关。”他写道:

> 在这个概念中，这样或那样的存在从它所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属性中被收回，这种属性使它属于这个或那个群体，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红人、法国人、穆斯林)——它被收回，不是为了另一个阶级，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普遍地没有任何归属，而是为了它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为了属于它自己。这样，在归属的条件下(“有一个这样的*x*，它属于*y*”),*始终隐藏着的*“*这样*的存在”，决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它自己就显露出来了:这样暴露出来的奇异性是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是可爱的

有归属，但不属于某一特定的东西。某种特别的东西，只要它属于什么，就属于什么。问“属于什么?”佩特曼和阿甘本认为，错误地将集合置于归属的条件之上。重要的是归属，而不是归属于哪个。

与此同时，“重要”引发了一种干预，看似只不过是另一种指定冷漠的方式。“重要”很重要。它是*爱*与欲望、欲望的感叹或*分裂*。重要的东西之所以能从众多事物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很重要。正如佩特曼所说，我爱它，渴望它，把它从无尽的、开放的、无数的、难以区分的成员中分离出来。

有超过1亿个博客。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我的。

4

在美国流行的方言中，“whatever”是一种有情感的口头回应，可以转移他人的评论。它通常不是用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是用来回应一个陈述或观察，通过这个陈述或观察，另一个人可能试图驾驭接受者或听者。

“你还没有打扫房间。”

“无所谓。”

利亚姆·林奇(Liam Lynch)的朋克流行歌曲《Whatever》有多个视频混搭，其中一个视频融合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形象、林奇的吉他配乐和布什配音。小布什大吼:

> 我是乔治·w·布什，自由世界的领袖。我要轰炸伊拉克。当全世界说“不!”我说:“无所谓!”
>
> 萨达姆已经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是啊，管它呢。

他唱着副歌，“因为这是我的美国。”

“whatever”的反应记录了另一个话语的事实，交流的努力或参与。它通过交际努力的偏转来承认交际性。发送者的信息(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意图上理解，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既不被接受也不被拒绝。相反，“随便”的回答将信息提炼成简单的话语事实。

“随便”类似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的反应，当给他一项任务或指示时，他的回答是“我宁愿不要”对于一些当代哲学家(例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来说，巴特比提供了一个拒绝、反对或抵抗的形象;一个从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权力关系中逃脱或解脱的模型。这一论证的前提是权力对抵抗的依赖:对法律的违背呼唤法律的存在。或者抗议者需要警察的暴行，以证明他们抗议的有效性。因此，巴特比提出了一条走出法律辩证法及其越界的途径。他回避了反抗，剥夺了权力对它的控制。

然而，即使巴特比通过拒绝而避开了权力和阻力的循环，他仍然依靠自己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的地位:他说“我”，指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主体——不是任何主体，而是一个有观点、有偏好的主体。就这样，他仍然暴露在权力之下。他仍然在乎。在响应请求时，巴特比不仅承认了通信，也承认了消息已经传递的事实

收到了。他的回答肯定了请求的可理解性，即使它挑战了规范的期望。巴特比并没有挑战发信人提出要求的权力，而是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是一个有偏好的主体，而这些偏好必须得到满足。

相比之下，“无论如何”中唯一肯定的是沟通本身。另一个已经沟通了。这种交流绝不意味着我有义务成为信息的接收者。通过回答“随便”，我已经表明了对沟通存在的最低程度的意识:发送信息是期望得到回应的(毕竟，我没有完全忽视你)。“随便”并没有强调任何偏好。它既不肯定也不拒绝。它也没有将主体暴露为一个渴望的主体，对他来说，某些事情很重要。

“随便”也有一个情感维度，一种傲慢、态度或挑衅，源于它作为一种无反应性反应的功能。通过承认沟通而不关注信息的内容，“whatever”否定了发送者的感觉，即她的信息已被接收，因为其内容尚未被处理。发送者受到了挑战，她作为发送者的地位受到了破坏。“Whatever”预示着一种交际性的交流，即使它采用了交际的形式。它避免确立以“随便”回应的人的主体地位，它也扰乱了发起交换的人的地位。这是口头表达上的一个小故障。

如果在当代媒体实践中，无论交流性如何标记主体性和归属感的形式，谁和什么都可能受益?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可能会在这些新的传播栖息地中蓬勃发展?

不计代价。

大量文献记录了通过媒体和通信技术产生的国家身份。苏珊巴克-莫斯的《*梦幻世界与灾难*》是对这一研究最好的贡献之一。巴克-莫斯探讨了20世纪乌托邦和以项目为基础的国家的大众身份，如美国和苏联。她强调了电影带来的梦想和幻想，以及电影所激发的对集体的想象。对于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来说，20世纪的技术项目也是同一性项目。巴克-莫斯的解释中有四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大众传媒对社会的直接称谓、大众传媒改变人群本质的方式、大众传媒的壮观功能以及大众传媒组织空间的补偿逻辑。

首先，很多人注意到了大众媒体对，嗯，大众的称呼方式。广播把领导人的声音直接带进了人们的家中，让领导人融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广播电视同样占据了一个家庭空间，因为它把观众当作一个国家的个人成员，也许被想象成一个家庭(受人尊敬的新闻播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被亲切地称为“沃尔特叔叔”)。但尤其是电影，它的大屏幕和宏大的规模，把大众作为一个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交谈。作为国家社会的国家是通过媒体演说(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电影)而产生的，在这个演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存在。

其次，在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苏联电影制作角色的细致解读中，巴克-莫斯观察到，

> 广播的声音让大众认同了政治领袖，而电影，前往城镇和村庄与观众中途相遇，代表了一种大众的动态形象，让观众认识到*自己*。这种镜像在将偶然的群体(自在的群体)转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群体(自为的群体)方面是很重要的，至少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命运

–

与观众聚集和分散的移动嘉年华不同，电影组织、定位并安排观众就座。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即屏幕上。银幕的统一从人的不统一中产生了一个单一的观众，这个观众可以看到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集体:“我们”正在观看这部电影。对于苏联人来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爱森斯坦捕捉并美化了革命群众的激烈场面，

这些影像成为了十月革命的记忆巴克-莫斯写道:

> 屏幕作为一种认知器官的特殊特征使观众不仅看到新的集体主角的物质性，而且看到其他理想实体的物质性:革命人民的团结，国际团结的思想，苏联本身的思想

同样，在美国，电影通过提供一个想象的大众主体，改变了人群的性质。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种族群体、宗教、政治组织和种族主义法律都与统一的政治同一性的形象和目标背道而驰。电影反击了这些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电影身体作为单一认同的点。通过生产一种共同的文化和集体经验，它是大规模同化的重要工具而且，正如巴克-莫斯所强调的，这个新集体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作为生产、消费还是政治力量。

第三，巴克-莫斯指出了电影中操纵的潜力。在一个让人想起盖伊·德波(Guy Debord)对景观社会的批判的论点中，她指出好莱坞和苏联电影是如何“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社会发展的某些黯淡现实”的。”[12]前者呈现了商品消费的梦幻版本。巨大的明星、惊人的产量(巴斯比·伯克利)和特效(*金刚*)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萧条时期的观众，并试图将他们的欲望引向消费幻想。后者则将制作理想化。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电影在引进好莱坞电影的同时，继续着革命时期的先锋实验(革命本身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到了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对集体项目的赞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Soiuzkino(苏维埃电影)的负责人鲍里斯·舒米茨基(Boris Shumiatskii)拒绝苏联艺术电影，认为它过于看重形式主义和美学。好莱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更好的模式，它采用了一种工厂式的艺术生产模式和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欢乐景象”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时期最成功的苏联电影之一是《查帕耶夫》(*Chapaev*)，这是一部关于在内战中击败白俄人的动作片，它超越了它所模仿的好莱坞电影的牛仔和印第安风格。

最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在大众国家认同的生产和想象中的作用的讨论的第四个方面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这对我的论点很重要。在这里，苏联和美国的文化想象是彼此的倒置:对一个人来说是幻想的实现场所的空间，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苦差事的场所。“公共公寓里强迫的亲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恐怖，影响着最平庸的做法

巴克-莫斯解释道。只要斯大林主义下的公共生活本身被呈现为目的和实现的场所，“就没有必要退回到私人领域。[14]相反，在美国，工厂工作通常表现为一种特别残酷、侮辱性的劳动。工人们在装配线上受到控制、奴役、日常的约束和贬低。工业工作不是一种成就感的来源，而是必要的苦差事。作为回报，工人以消费的形式获得补偿，在核心家庭的爱与温暖的背景下享受消费品。巴克-莫斯写道，“私人家庭的意识形态承担了巨大的负担，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合法化，在美国尤为如此。”[15]

多重交叉、日益个性化的媒体和传播技术激发了什么样的幻想、什么样的可能性、什么样的主题?换句话说，构成国家乌托邦想象项目的媒介的变化，将如何引领一切存在的方向?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和国家大众认同的讨论相比较的乐趣表明，答案至少可以在四个领域找到。

首先，如果大众传媒直接面向社会，将大众作为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对话，那么当代的网络传播就会有多个收件人——已知的和未知的收件人，朋友和陌生人。博主可能会为他们想象中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的人写作，为他们可能启发的一群无知的人写作，或者为未来的自己写作。在我的社交网络Facebook上接收我更新的那一群朋友，是我独有的。每个用户的网络都是不同的，即使它们有重叠和交集。博客和社交网络并没有提供广泛共享的象征性身份，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博客并不能全面地解决社会问题。它们邀请独特的读者来思考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或者它们只是让自己可以被搜索引擎的爬虫找到。与大众媒体号召集体、公众和国家的形成不同，博客并不能将博主和读者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更像铅笔而不是电影。它们在多样性上保持着特殊性。

第二，大众传媒使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被他们自己看到，为人群提供了一个想象的集体，而网络传播和娱乐使特殊性作为特殊性被他们自己看到。我可以在推特上发布我当前的位置，向朋友更新我当前的心情，查看什么是趋势。有了多重汇聚和动荡的媒体，我不必固定在任何一个方向或主题上。我可以活在当下。这些多重的、循环的冲动不仅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永久的优柔寡断或拖延，缺乏承诺——*还有什么呢?但*这种支离破碎的、联网的冲动把我的身体、我的脸变成了一幅蒙太奇:这里有一条皱纹，那里有一个肿块，鼻子太大，嘴唇太小。幸运的是，我可以随时更新我的照片——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动画!没有我们。没有我(虽然我可以谷歌自己，看看我是否出现)。巴克-莫斯认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个群体存在，而这个群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存在。[16]我的观点是，博客——交际资本主义的网络化信息和娱乐媒体的代表——不仅没有为大众创造这样一个空间，而且消解了它的任何意义。它们取代了它，反而产生了不断加速的图像、冲动、片段和感觉的循环。博客不可能

计算;他们抵制被纳入集合或类别。是的，电影仍然存在，有时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可以发推特谈论它。博客映射项目试图让多个完全不同的博客呈现为一个球体，一个集体，作为共享空间中的点。但它们所映射的空间是在研究者的想象中，而不是在博主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在他们面前。

第三，好莱坞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电影奇观一般寻求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相比之下，博客则坚持一种完全媒体化的设置: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说，看到。以公共性作为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可以被说;没有什么是需要否定的。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反思、批评和嘲笑——然后这些反思、批评和嘲笑本身又被反思、批评和嘲笑……*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在这样的设定下，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被评论或评论的。平凡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某人来说都很重要——*就像一秒钟*。博客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都很重要——就其本身而言。在这种反射性的环境中，即使我的帖子很无聊，我在博客圈的小版块里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价值，TMZ捕捉到的名人的越轨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已知和讨论的。大多数时候，博客戏剧的重复强度是对政治的倒转，迅速循环的分歧和调整确保了一切都没有改变。有时，这种强度会累积起来，”不时出现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17]市场繁荣与萧条;恐怖袭击;一本童书轰动全球。电路调整和重新校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陷阱中再次捕获新的东西。

第四，正如官方关于通过工厂劳动实现的神话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而崩溃一样(人们不必再假装这是真的;他们仍然要去工作)，理想化家庭生活的神话在美国崩溃了，部分原因是女权主义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离婚、不忠、成瘾和虐待的现实使其幻想无法维持。电视和女权主义都使个人政治化，抹去了公共和私人之间脆弱而虚幻的界限，这条界线在社会主义兴起后几乎没有意义。在理想化家庭生活神话的残余物中，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的理想得到了推崇。个人的满足取代了家庭责任。换句话说，家庭生活应该是个人的回报(而不是责任或期望)。当家庭生活不能令人满意时，就会对其进行检查和诊断，并提供补救和补充——家庭*最好能*成功，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竞争既不能提供庇护，也不能提供喘息的机会。交往资本主义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形式和载体

个体的消费、参与和创造性需求的表达，迫使个体得到满足。

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总是很微妙的区别的消除相关的是工作和娱乐之间界限的消失。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电子产品热潮到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相关的更大变化，信息化给那些从事符号和思想工作的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舒适。早期的版本颂扬远程办公和无纸化办公。后来的版本则利用了人们对落后的恐惧，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圈子之外，没有竞争对手那么快。咨询师们敦促企业调整工作结构，鼓励创造力和团队建设，让工作更像娱乐。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游戏和互动转移到网络和屏幕上，玩耍似乎更像工作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循环中，驱动力的重复暗示着没有工作的工作(以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的形式)和没有游戏的游戏(以人们有偿的游戏和人们有偿享受的游戏的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博客并不是逃避生活中一部分苦差事的方式。它们不是虚拟现实中的梦幻实验。相反，博客是从任何生活的任何方面延伸、放大和反思的。

7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终结，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衰落，全球化，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交流资本主义的开始。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描述这种新形态时，强调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过渡。他们以美国、英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为重点，指出学科逻辑主要是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制度内部产生主体的。到20世纪末，这些中介机构——核心家庭、监狱、学校、工会和地方教会——陷入了危机。先前凝聚成社会和经济机构的空间、逻辑、实践和规范已经崩溃和瓦解。它们的效力现在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制度逻辑从其空间约束中释放出来，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与这种普遍的消解和不确定性(其本身必然与信息化的经济变化和网络通信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相关联)相对应的是“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的不确定性”。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旧的政治主体——自治政治领域的公民主体，公民社会的纪律主体，愿意在公共场合投票然后回到他的私人家庭的自由主体——不再能够作为理论或行动的前提。种族、民族和性别认同同样不那么固定、不那么稳定、不那么可用，作为决定性的主体立场。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发现了流动的、混合的、流动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没有纪律，没有内化具体的规范和约束，现在只能被控制。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象征性同一性在控制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由过度的欢愉——*也就是说*，通过享受的禁令——维持的想象的身份。更具体地说，象征性同一性涉及到主体对自我理想的认同——也就是说，主体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看法。想象的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所采用的形象。我们可以说，象征性的认同建立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哪些形象会出现，以及有些形象如何比其他形象更引人注目或更吸引我们。想象的认同只指我的自我形象。

在规训社会中，规范性期望围绕着确定的社会角色凝聚在一起。假设学校、教会、家庭或国家的目光，一个人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不同的位置，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制度规范。我可以做一个认真的学生，忠实的信徒，孝顺的女儿，好公民。我也可以是一个不学无法、背信弃义、一文不值的叛徒。即使图像不同，凝视的象征性同一性仍然是相同的。随着象征效率的下降，纪律社会的解体，这种凝视失去了其先前的力量。我们不确定它是否有效，如果别人相信它:好学生是一个齿轮，没有创造力，*在盒子里思考*，*伪善的人吗*?他者是否真的欣赏和赞赏越轨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越轨是不是更越轨，因为这是他者想要的?面对当代反身性的无限可能性，后学科主体被推动着穿越各种想象的身份。我们以一种方式想象自己，然后是另一种方式，永远不确定我们是如何出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出现在谁面前。

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是什么样子，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失去了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或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同一性，但我们缺乏选择的依据，也没有意识到一种同一性一旦被选择，就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遵循规范——哪些规范?*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他们*成为专家?我们在流行趋势中循环往复，无论是来自时尚、饮食建议，还是对特定亚文化锚的希望。控制社会限制了当代混合身份的流动性和流动性，但这些限制并不是由一个主能指或象征法则所设置的。主体对这些限制的体验，要么是毫无根据的侵入，要么是对享受的非理性障碍，要么是假设性的或工具性的禁令，作为后来获得享受的手段。陷入自反网络——总是另一个动作，另一个层次——我们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们的网络是自反性的，所以我们不必如此。

我们不是博主。我们不是Facebook。交流资本主义的网络互动并没有提供象征性的身份，我们将自己视为集体行动的地点。相反，它们为我提供了想象自己的新方式的机会，一种我可以不断尝试的各种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和可变性使我想象中的同一性极其脆弱——赋予它意义和价值的参照系永远在变化;其他能够打破这个身份的人随时可能出现，他们的成功、成就和享受的能力让我的身份受到质疑:*我本可以拥有更多*;*我本可以真正地享受生活*。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心理上的;这是对坚持全球化、反射性的金融和信息网络的斗争的合理反应。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数字媒体大师所推崇的新经济——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遵循幂律分布。少数幸运儿将得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一无所有。

哈特和内格里用人类学的出走来描述在学科主体性的余波中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流动的、流动的奇点。因此，他们强调了这一点

，那些反对“帝国的剥削和统治”的人也必须不断地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身体和新的生活。[20]交流资本主义促进和煽动了这些尝试，采用不断创新的升级来确保这些尝试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加速进行。哈特和内格里承认，人类学出埃及的方法就是帝国的方法。但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回应也是帝国的回应: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激进化，创造新的东西，把工具变成假体，迁移和变异成信息技术。他们写道，“反抗的意志真的需要一个完全无法服从命令的身体。[21]一个无法服从的无纪律的身体是一个即时和享受的身体，被驱使着从一个图像移动到另一个图像，强度到强度。缺乏自律，它怎么能反抗，怎么能形成意志呢?这样的主体非但不能建构新的东西，反而排除了自我治理的可能性和希望。

控制社会中的网络媒体放大了后福特主义对集体同一性的挑战。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签署请愿书。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捐款。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是的，*奥巴马有上百万的脸书好友*。但这些点击和链接的特定动作，并不会产生象征性的身份;它们是我表达自我的方式——就像购物、查看朋友的更新或关注TMZ.com上的小报新闻一样。我可能会想象其他人像我一样，一个虚拟的当地人，但这个当地人仍然是像我一样的人之一，我的链接列表或追随者，那些符合我的人口统计资料，我的~~用户习惯~~。我不需要假设一个其他人的集体，我可能需要与之合作或斗争的人，我可能有义务的人，可能对我提出要求的人。网络化联想的即时连接，让我在感到有点不舒服、有点被排挤的时候，可以马上继续前进。请愿、社交网络小组(脸书上的一个旨在让100万人表达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小组有24,672名成员)、博客——它们是政治上的即时生产，快速反应作为交流资本主义流动的贡献而流传。在她对快闪族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凯莉·索罗坎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索罗坎反驳了将快闪族狂热地视为民主参与的新例证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从任何有意义的政治项目中剔除的纯粹参与的盲目崇拜”。她总结道:“希望快闪族可能代表一种未来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反映了一种对便利政治的渴望，在这种政治中，与他人聚在一起很容易，不涉及冲突、承诺和斗争。[22]在交往资本主义的循环中，便利胜过承诺。

阿甘本将任何事物与人体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其在景观中的形象的科技化联系在一起从广告和色情作品中涌现出来的摄影图像“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人的，既不是神的形象，也不是动物的形象”。在这些照片中，身体“现在变成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阿甘本在这里引用的“无论如何”暗示了一种对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新方法，一种从景观中收回语言中存在的积极属性和被它剥夺的共同属性的方法。对阿甘本来说，无论存在是什么，都是未来社会的存在模式。在资本主义景观中产生的任何存在都预示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景观的统一将最终克服分裂。因为阿甘本想要从被困在场景中的人性的转变中挣脱出来，他提出了一长排跳舞女孩的腿的“几何辉煌”。

另一种思考“既非共性也非个体性”理念的方式，是将其与规训权力的规范化、聚合性方面联系起来。现代规训机构，无论是家庭、学校、工厂还是国家，都把个人作为类型，作为社会角色或地位的占有者来生产。回想一下莱维敦的照片，训练中的士兵的照片，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的毕业生的照片。作为学科的结果而被理想化的自我管理、反思的主体，或许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个体，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形式的实例。自主性通过个性出现。

阿甘本将地球上的小资产阶级与对植根于身体特征或语言、传统或文化差异的身份的挫败感和不得体联系在一起。他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已经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看到了“旧社会主体的衰落”。然而，他很快跳过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大众同一性，因为他主张一种新的全球同一性拒绝。

通过这种跳跃，阿甘本忽略了大众作为一种既非一般也非个体的现代集体力量。群众是行星资产阶级和任何存在之间被取代的调解人。在鲍德里亚的表述中，“质量是没有属性、谓词、质量或参照物的。”阿甘本的“任何存在”都表现为整体的奇异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它们与被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的大众是不一样的:大众是主体的大众，是人们的组合、聚集和积累，他们跨越并反对现代性对他们的分离和秩序的企图。如果群众产生于一种忽略了的身体的组合

它们的特殊性，无论什么存在跳过聚集的步骤来对待无区别、无品质，不是作为属于质量的结果，而是作为属于质量本身的条件。

阿甘本版本的共同归属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分子的政治想象:许多人害怕被抹去，被商品化，无法区分，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他们拒绝大众社会和大众媒体的术语，拒绝将他们的自我认知强行集体化到“我们”的信封里。阿甘本接受了没有集体形式的质量，从而将分解的瞬间快乐重新格式化为一个整体，作为归属的独特性。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质量的体验中摆脱或克服自己的身份。他们本来就缺乏身份。他们可以简单地保持现状。质量是缺失的环节——移位的中介——它的功能是性质的交叉反转。鲍德里亚写道:“平庸、惰性、非政治主义曾经是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处于变成革命的过程中——没有改变意义，没有停止具有意义。鲍德里亚在20世纪70年代对左派的警告在今天击中了它的目标:政治的撤离是如何体现政治本身的?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小资产阶级取代或代表了大众，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不受“归属”的划分和特殊性阻碍的归属形式的机会。阿甘本写道:

> 因为如果人类不再继续在已经不恰当和毫无意义的个体性形式中寻找合适的同一性，而是成功地归属于这种不恰当的形式，创造出合适的存在——因此不是同一性和个人属性，而是一个没有同一性的独特性，一个共同的和绝对暴露的奇点——如果人类能够，也就是说，在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传记中，不是这样，而只是这样，他们独特的外在性和他们的面孔，那么他们将第一次进入一个没有预设和主体的共同体，进入一个与不可交流的交流

—

我们被制造成不太可能联合起来的主体，是抗拒团结和怀疑集体的主体。这种生产的核心是培养和滋养一种独特和特殊的个性感。每个精子都是神圣的:我们独特的细胞生命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或者说，每一个潜在的基因组合都承载着我们在个性化自我中发现的非凡潜力。每一个声音都必须被听到(但它们不会组合成一个合唱)。每一张选票都必须被统计(但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动作)。每个人都必须是可见的(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一个群体)。个性化的参与式媒体之所以是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参与的个性化。更重要的是，它的禁令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个性化:制作自己的头像、视频、个人资料、博客、暴徒、视频、应用程序。参与变得

与个性化难以区分，是对一个人的持续培养。留下自己的印记。

如果我们停下来会怎么样?阿甘本对独特性和归属感的唤起，脱离了培养个人同一性或认同特定群体的强迫，为另一种形式的归属感开辟了潜力，这种归属感不受这种或那种划分和限制的限制。此外，他还提出，这样归属的存在物并不是欧洲哲学或精神分析学可能理论化的那种意义上的主体。如果某种同一性作为伦理人格的轨迹，并且对这种同一性的寻找已经被配置为一项重要的伦理任务(也许，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是每个人一生的任务)，那么任何不受这些任务约束的人都会出现。不受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义务的负担，不受选择、言语或对意义的期望的束缚，任何存在都可以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流入并通过共同体。

阿甘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什么奇点的政治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可以伴随“一个共同体不是由任何归属条件(成为红色，成为意大利人，成为共产主义者)……而是由归属本身作为中介的存在”。[28]因为他在阐述任何存在的过程中，把他带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和作为未受洗儿童灵魂栖息地的地狱边缘，政治问题似乎特别令人烦恼。那些在地狱边缘的人缺乏上帝，但他们并不因缺乏上帝而受苦;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既不像被拣选的人那样有福，也不像被诅咒的人那样绝望，他们充满了无法发泄的快乐。limbo长期以来是某种困境的同义词，是一种既非此地也非彼地的坚持的中间状态，是一种无法前进或后退的状态，因此很难找到一种我们可能钦佩或寻求的政治。

更具体地说，我在这里既找不到我所仰慕的政治，也找不到任何形式的斗争。什么能激励一切生灵?什么能感动他们?按照阿甘本的设想，他们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缺。他们共同归属，没有斗争，也没有对抗。这样看来，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是政治人物;他们的存在是非政治性的，超越了政治。他们既不攻击，也不反抗;既不内也不外。那么，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任何生物的政治，也许会更有意义。他们被感动和推动;他们在当代网络中循环。

地狱边缘的灵魂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这种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的状态不是地狱。这也是阿甘本对国家绝对敌意的政治模式。阿甘本写道:“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可表征同一性的存在与国家绝对无关。”“因此，国家，或者更好地说，国家，将继续存在，不受人民需求的干扰和限制。国家可以攻击和监禁，利用和忽视——未来在军事化的掠食性机器人无人机中展开。任何生物都不缺任何东西，因此也不需要任何东西(而且，据推测，它们都相处得很好)。不

奇怪他们与国家无关。*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管它呢。*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国家的主要敌人”，而不是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铺平道路。他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奇点在没有确定同一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社区，人类在没有任何可表征的归属条件下共同归属。”[31]撇开这种不宽容是国家的属性，还是构成分裂的人类主体性的更复杂的问题不提，似乎足够清楚的是，国家不时地容忍和利用群众，这是一种没有可表征条件的共同归属形式。群众可以威胁国家，也可以支持国家，可以颠覆国家，也可以维持国家。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中，质量既不是群体主体，也不是客体。一方面，群众一般不能成为有意识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拒绝让他们说话的企图。调查和统计可以模拟它，但群众仍然是不可把握的，特别是因为这些调查本身就牵涉到它们所调查的群众的反身性构成中。鲍德里亚说，群众的缺席“仍然是无法忍受的。它推动了民意调查和测试的重复过程。因此，国家不仅能够容忍不能确认同一性的共同归属形式，而且同一性的缺失本身也会产生监视和煽动言论的过程，这些过程有助于产生和维持权力。

阿甘本将景观视为语言或交际性。它是一种对语言存在的剥夺形式，一种使人与语言疏离的形式。在这里，他从德波所表达的困境出发:在景观社会中，“真正交流的语言已经丢失”，“新的共同语言尚未被发现”。[33]德波写道:

> 壮观的消费以凝固的形式保存了旧文化，甚至恢复和扩散了它的消极表现;这样，景观的文化部门过度表达了景观在其整体中隐含的东西——*不可交流的交流*

阿甘本的回应是将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案，并以此在景观中找到“一种可以用来反对它的积极可能性”。[35].不可交流的交流消除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不可沟通的东西也可以被沟通，不能被分离。因此，景观作为语言存在的异化的极端表达，使其能够自我克服。在景观中对语言的剥夺，开启了一种关于语言和语言存在的新体验:“不是语言的这个或那个内容，而是语言*本身*，不是这个或那个真实

命题，而是人说话这一事实本身。交流的失败提供了它自己的满足，语言本身的享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驱力的循环运动描述为围绕自我的回转和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变用语言来表达，主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被被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所取代。阿甘本对交流的反身性处理，他从*说什么*转向*说什么*，运用了这种动力。不仅消极的条件(与语言存在的隔阂)被视为积极的开放(归属感的新体验)，而且它的积极性是反身性的结果。语言开启了*自身*。无论什么存在，都把注意力从语言的内容，从试图交流什么东西，转向作为会说话的存在的自身。他们从关注自身之外或超越自身的事物，转向关注自身。驱力的主体，任何被动的存在。他们交往活动的过度，正是被动性的形式。

当代网络媒体以这种方式表演并重复着交际性，即语言的替代。作为表达任何想法或观点的工具，博客继续将表达与内容和作者分离开来。思想和观点联系在一起，流传开来，它们本身的表达既不完全是一般性的，也不完全是个体性的。帖子可能会链接和手势，但它们不代表自己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们是表达，就是这样。测量和计数，点击量和排名提醒博主们，我们身处密集的、反射性的交流和娱乐网络中。似乎让大众发言、对大众进行民意调查的冲动，现在把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当成了目标。博客统计并不追踪事实或意义。它们追踪的是博客、新增的帖子、回复和页面浏览量。换句话说，它们追踪说话人的事实，因为它们引导我们远离所说的内容。

没有指称物的语言的一个更好的例子，即只指“有人说过”的语言，是词云，一种根据单词使用频率来理解文本内容的图形表示。例如，在200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辩论后形成的一个词云显示，麦凯恩经常使用“*知道*”、“*支出*”和“*得到*”等词。奥巴马使用了“*思考*”、“*制造*”和“*前进*”等词。他还频繁地使用了*got*这个词。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他们使用了文字，发表了演讲。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语言本身的语言，作为语言自身反映出来的语言——阿甘本对即将到来的社区的理想——采用了图像的壮观形式。

在词云中，频率和接近取代了意义。哪些单词与哪些单词一起出现?这些元素的组合决定了强度——只出现一次的单词要么不算数(它们不被计算)，要么显得非常微弱和微小，就像大气一样。文字很重要，而不是故事和叙述。词汇是交流的索引——它们标志着它们正在被交流。词云脱离了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意义空间，脱离了一种由句子构成的语言，这些句子是根据可识别和有争议的规则在上下文中说出的。

丢失了什么?区分争议性言论和霸权性言论的能力。反讽。调性。规范性(如果言语不是言语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从言语行为中的位置被提取出来，成为人工制品和玩具，那么怎么可能有言语的伦理?)批判(Critique)。话语中突出的术语可以辨别，但不能辨别它们的意思，甚至不能辨别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支配真理和谬误的规则，这可能意味着没有规则(除了。

频率、接近度和持续时间的规则)。请注意，频率可以是引用的，也可以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来自循环，也可以来自自我重复。消息力乘数比消息本身更重要。词云抓住了从信息到贡献的转变，这是沟通资本主义的特征。

词云的词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中就有预示。立体派把文字作为图像纳入其中。更具破坏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和苏联革命艺术家的海报。一方面，他们的文字艺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革命冲动，它对俄罗斯晚期绘画现状的挑战。它表演了革命，打乱了先前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的表演效能依赖于它的语境，它强化了象征意义的事实。它的破坏不仅是索引语言，而且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意义域。重点不是要摧毁意义。而是要改变它。

词云并不是革命性的。它们是交流资本主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加剧了意义和论证的崩溃，从而阻碍了论证和反对。任何话语都可能被遮蔽。在worldle，你可以用肯尼迪、赫鲁晓夫、安·库尔特或肖恩·康姆斯(Sean“Puffy”Combs)的演讲来制作一个新版本。任何你喜欢的人。

词云图并不代表或提供一个假词。它标志着一种感觉，一种强度。它并不要求观众理解它。观众所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个词曾经出现过，它曾经出现过。“成为形象”这个词是一种感觉冲动，就像一枚徽章。它是同一性的，依赖于单词和物体之间的同一性。意象这个词就是这个脉冲同一性。

一个字云是无法争辩的。它没有立场。它标志着一个时刻。它记录了那个时刻的强度:在这个等式中，重复带来了强度。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或是否需要它，也不知道它与什么有关。它只是很激烈。词云可能会传递这种强度，它可能会激发一种感觉或一种反应，但它不会邀请人们对这种反应或引起这种反应的原因进行询问。它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提供表象:问题就在那里。词云就像一条MÖbius条，元数据变成了噪音:“她说了很多关于政治和科技的东西。”管它呢。

备注

1 The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reported on July 19, 2006, that the majority of U.S. bloggers (54%) are under thirty; Amanda Lenhart and Susanna Fox, "Bloggers: A Portrait of the Internet's New Storytellers," http://www. pewInternet. org/pdfs/PIP%20Bloggers%20Report%20July%2019%202006.pdf.

Pew reported on December 19, 2007, that "girls dominate the teen blogosphere; 35% of all online teen girls blog, compared with 20% of online teen boys"; Amanda Lenhart et al., "Teens and Social Media," http://www.pewInternet.org/pdfs/PIP_Teens_Social_Media_Final.pdf.

2 Lenhart and Fox, "Bloggers."

3 See Chuck Salter, "Girl Power," *Fast Company*, September 1, 2007, http://www.fastcompany.com/magazine/118/girl-power.html?page=0%2C0. See also www.whatever-life.com.

4 "State of the Blogosphere/2008," http://technorati.com/blogging/state-of-the-blogosphere/.

5 See also James Grimmelmann, "Saving Facebook," *Iowa Law Review* 94 (2009): 137–1206, http://works.bepress.com/james_grimmelmann/20/.

6 Dominic Pettman, *Lov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7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1.

8 Herman Melville, "Bartleby the Scrivener," was first published in *Putnam's Monthly Magazine* in 1853.

9 Susan Buck-Morss,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140.

10 Buck-Morss, 147.

11 One significant study of film as a vehicle for assimilation is Michael Rogin, *Blackface, White Noi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2 Buck-Morss, 161.

13 Buck-Morss, 159.

14 Buck-Morss, 201.

15 Ibid.

16 Buck-Morss, 147.

17 Mark C. Taylor, *Confidence Games: Money and Markets in a World without Redem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94.

18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7.

19 Zygmunt Bauman, *Liquid Lov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50–1.

20 Hardt and Negri, 214.

21 Hardt and Negri, 216.

22 Cayley Sorochan, *Flash Mobs and Urban Gaming: Networked Performances in Urban Spac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23 Agamben, 47–8.

24 Agamben, 63.

25 Jean Baudrillard, *In the Shadow of Silent Majoritie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John Johston, Paul Patton, and Andrew Berardin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38.

26 Baudrillard, 61.

27 Agamben, 65.

28 Agamben, 85.

29 Agamben, 6.

30 Agamben, 85.

31 Agamben, 87.

32 Baudrillard, 56.

33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133.

34 Debord, 136 (emphasis in original).

35 Agamben, 80.

36 Agamben, 83.

37 Sigmund Freud, "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4 (1914–1916):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15), 109–40; 127.

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

9
疏离自由劳动

马克·安德烈维奇

如今，我们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观察到，在线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之一，依赖于消费者是否愿意接受越来越详细和全面的监控形式。正如主流右倾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所言，“互联网上最酷的东西实际上付出了令人瞩目的代价:你的隐私。”[1]由于数据挖掘新领域的发展，从实时挖掘社交网络的初创企业，到大量从用户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收集数据的移动应用程序，这个代价还在继续增长。

如果说追踪网络行为的能力一开始是偶然的，是一串允许网站记住以前的访问者的代码所提供的便利的副产品，那么现在监控正在被设计到系统中。例如，交互式服务的整个应用程序层，在提供创新便利的同时，也为计算机监控提供了许多新的维度。如果你下载了一个冲浪或编织的应用程序，你就同时加入了一个新的人口统计群体，以进行目标营销。越是有针对性或独特的服务，它提供的用户信息就越详细和独特。甚至支持网络的计算机语言(超文本标记语言或HTML)的升级也包含了在线监控和跟踪的新功能。正如一篇新闻报道所指出的，

> 新的网络语言及其附加功能提供了更多的跟踪机会，因为该技术使用了一个过程，可以在用户在线时收集大量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硬盘上。专家说，由于这一过程，广告商和其他人可以看到用户数周甚至数月的个人数据

这些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和媒介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在互动平台上进行他们的社交、职业和个人生活。试图将收集到的关于用户的无数形式的信息编目是徒劳的;我只想说，人们使用智能手机或互联网连接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而且将会被跟踪、分类、存储和汇总。随着界面的发展，那些尚未被交互式设备捕捉到的个人活动的维度很快就会被捕捉到

更复杂和多维度——最终能够识别(并因此记录)表情、评估情绪、监测生命体征和跟踪眼球运动。

这种类型的监测已经轻松地渗透到数字媒体领域，这是令人惊叹的，也许部分是因为这项技术及其应用的新颖性。智能手机的便利性和小配件带来的诱惑，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它作为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监控和跟踪设备使用的担忧。如果把它转到一个不那么新奇的领域，这种转变可能会显得更令人反感。然而，事实是，目前对商业数字文化的拥抱意味着公共和私人机构收集、分类和存储公众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新商业技术的华丽魔法充当了一种分散注意力或误导的形式，避免或推迟了我们正在构建一种文化的事实，在这种文化中，商业监控已成为我们沟通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这种监视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开发基于监视的商业基础设施时，我们实际上押注了这样一种前景，即它将被证明在操纵和引导消费者行为方面是有效的。

隐私问题

的确，流行文化对新兴监控经济的描绘开始出现——例如，《*今日美国*》的文章标题是“在线跟踪出现可怕的转折”——但他们倾向于从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文章指出:“随着数字阴影的升级，人们对传统隐私观念受到侵蚀的担忧也在加剧。“关于在线跟踪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隐私的命运和与之相关的权利上。这是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定义隐私的方式是复杂的(因此，对消费者做出的选择的挑战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自由的蔑视)，并忽视了他们的信息已经成为从事这项工作的商业实体的私人属性的方式获取信息的方式。它还倾向于援引相反的论点，认为几乎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在互动环境中发生的许多形式的监控都是匿名的，这意味着聚合器及其客户对被监控者的个人同一性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会亲自检查他们的详细信息个人资料(好像没有人阅读我们的个人电子邮件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没有理由担心这些电子邮件正在被电子扫描，以确定如何最好地操纵我们)。简而言之，隐私倾向于把讨论框定在个人的、个人的范围内。

由于隐私作为一种解决监控问题的手段存在潜在的缺点，本章提出了一种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方法，该方法借鉴了一种更有利于集体行动和对社会关系所起作用的认识的概念:剥削。剥削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用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批评中，以破坏自由选择的概念，而自由选择正是《*今日美国*》所描述的那种交换的基础:作为个体消费者，我们自由地放弃自己的某些东西(我们的隐私——以个人信息的形式)，以换取我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的过程。诚然，这个提法中的“或”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词——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在谈论需要还是欲望，是在谈论生计还是便利，它会造成世界上所有的不同。也许——尽管，正如马克思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构成可接受的生活标准(超出物质生存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概念是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虽然区分维持生计和饥饿是可能的，但要明确划定需要和欲望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种区别，而是要断言它的社会条件特征，作为考虑与剥削概念有关的类似问题的一种方式。正如我将在以下几页中论证的那样，有可能证明商业信息的商业挪用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但这样做有可能将同样名称下的残酷工作场所剥削形式与看起来良性得多的东西混为一谈:人们在网上购物或建立人际关系。认识到剥削的类型和程度之间的差异，并据此优先考虑关键的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就像人们可能会区分不同类型的物质剥夺一样。然而，动员剥削的概念提出了关于网络经济特征的社会关系的问题，以及它们在生产资源私有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化形式的再生产中的作用。

剥削与自由劳动

尽管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在线活动形式不属于雇佣劳动的范畴，但它们仍然可以产生价值。因为获取个人信息是用来创建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所以在线营销模式创造了一个反馈商品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息被互动公司直接用于定制广告;在另一些情况下，它被买卖给营销人员。正如《*华尔街日报*》关于数据挖掘的调查报道在描述一家剖析互联网用户的公司时所说，“口味可以批发出售(一批电影爱好者每千人1美元)，也可以定制出售(《*初恋50次*》*26岁的南方粉丝*)。”[5]即使信息不直接买卖，互动经济也依赖于获取用户所产生的价值，这些用户的贡献有助于建立Facebook等社交媒体服务的经济价值，或者更早的时候，美国在线等互联网门户网站的经济价值。

互动平台所捕获的活动价值，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剥削所谓免费劳动力的文献。在关于聊天室版主提供劳动以换取在线服务的讨论中，Tiziana Terranova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生产性活动既可以被描述为自愿的，也可以被剥削:“自由劳动是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消费被转化为生产活动的时刻，这种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又经常被无耻地剥削。[6]类似地，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对网络经济的讨论中指出，“在那些文化和传播的网络中，产生了集体主体性，也产生了社会性——即使这些主体性和社会性可以直接被资本利用。”[7]彼得森(2008)对用户生成内容的剥削的论述认为，商业的“参与架构变成了剥削和圈地的架构，将用户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8]

对于Ritzer和Jurgensen(2010)来说，在线获取价值代表了资本逻辑向新空间和时间性的延伸:“资本家似乎找到了另一群人——超越工人(生产者)——来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新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仅仅是
做了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找到了另一种扩张方式。[9]对科摩罗来说，互动参与的形式加强了而不是彻底改变了剥削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只要私有属性、合同和交换价值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差异和经济的主要调解人。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s will remain largely unchallenged—unchallenged, at least, through the auspices of 臆断。[10]

简而言之，剥削的概念在最近关于网络生产力的论述中已经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批评大多指的是用户在工作场所范围之外有意识的生产性活动，比如粉丝劳动、聊天室管理、以及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用户自愿参与，但也为能够利用用户活动的商业实体创造价值(有关粉丝劳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卷中Abigail De Kosnik的章节)。人们倾向于将这种创造性活动定位于拉扎拉托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范畴，即“生产商品的‘文化内容’的活动”，注意到它“涉及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定义和固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以及更具战略意义的公众舆论的活动。”[11]

然而，区分这些不同形式的价值产生可能是有用的——包括用户积极参与对自己的营销，占用用户生成的内容，以及获取可以转向用户的信息。这并不是说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免于剥削，而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稍微不同地思考在这些不同的实例中剥削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网络环境中动员剥削概念的挑战之一是，它采用了传统上与工业劳工血汗工厂条件相关的关键概念，并将其转换为相对富裕和繁荣的领域，即，一个由那些有时间和机会参与在线活动的人居住的领域。有充分的理由，与血汗工厂对劳动力的掠夺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相比，用户生成内容网站所谓的剥削条件更难让人激动。就用户生成内容而言，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谈论的是富裕的消费者参与的可能被描述为可选的活动:你不必加入Facebook或Twitter，获得Gmail账户或在线购物不是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目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剥削批评的反驳通常会提到缺乏强迫和参与的乐趣。正如Nancy Baym和Robert Burnett(2008)在他们对独立音乐迷所做的宣传工作的描述中所说:“我们不愿意忽视他们对情感愉悦的主张，以及他们想要传播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东西的愿望，以此作为剥削的证据。[12]他们的研究引用了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交互式技术的前景的描述非常相似，即乐迷的活动重新获得了前大众社会的快乐:“他们对音乐乐趣的社会反应位于深刻有意义的社会现象中，这些社会现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音乐历史的各个阶段，在音乐产业出现之前的各个阶段，音乐总是在社区里由当地人为当地人表演，而不是由远方的名人为崇拜的乐迷表演。[13]这种形式的享受，那么，据说，与歌迷被剥削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声称这些人被剥削，就是忽视了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在全面发展的人类的福祉中有多么重要。”[14]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描述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批评是否与享受或愉悦的感觉不相容。剥削的事实并不妨碍工人从他们的手艺中获得快乐，或者从合作努力的成功中获得快乐。对剥削的描述也不一定诋毁这些活动或它们对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可能具有的意义，而不是诋毁那些支持剥夺和异化的社会关系。对剥削进行批判的重点既不是贬低工人的快乐，也不是贬低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不然的话，就会陷入一种范畴混淆:试图将结构性条件重新定义为个人快乐和欲望的问题。对剥削的批判并没有贬低个人的快乐，正如这种快乐并没有使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无效一样。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定义非雇佣劳动背景下的剥削可能意味着什么，以支持对数字经济中剥削的批评，并解决它经常被忽视的方式(因为没有承认那些从事各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人所获得的利益和快乐)。

数字异化(Digital Alienation)

剥削的分析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无报酬的参与形式，这些参与形式产生的价值被那些控制这种参与所依赖的平台的人所占有?霍尔姆斯特罗姆对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做了一个清晰的总结:“那么，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家的利润是由剩余的、无偿的和强迫的劳动产生的，生产者无法控制这些劳动的产品。15这样一种解释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强迫是嵌入在构成所谓自由选择的关系中的。也就是说，强制并不需要有人拿着枪或其他武力威胁站在工人面前。要进一步指出的一点是，剥削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也是为了异化。正如霍尔姆斯特罗姆所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真正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劳动力。”“异化不仅存在于对生产活动的自觉控制的放弃中，因此也存在于生产活动的产品中。因此，剥削不仅仅是货币价值的丧失，而且是对一个人的生产和创造活动的控制的丧失。再往前推一点，推动批判的是后一种剥削感，因为对经济资源的剥夺，最终是对稀缺形式的再生产，这种形式迫使人们自由地给予服从。

大卫·赫斯蒙达尔(David Hesmondhalgh)在批评将剥削概念应用于自由劳动的尝试时，引用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提出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解的三个原则:

> 首先，当一个阶级的物质福利因果地依赖于另一个阶级的物质剥夺时，剥削就发生了。没有工人阶级的被剥夺，现代社会的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存在。其次，这种因果依赖反过来取决于工人不能获得关键的生产资源，尤其是属性。第三，这两种特征(因果依赖和排斥)运作的机制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占有

虽然赫斯蒙达尔可能不同意，但我认为这一定义强调了新兴在线经济的关键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是新形式的创造力、交流和信息共享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数字媒体有一点一点也不新鲜，那就是它再现生产资源私有制逻辑的方式。即使它培育出了新的形式

它在facebook和YouTube等私人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平台上这样做。

许多网站不受商业控制，但它们仍然依赖于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随着检查通过私人服务器和路由器的数据的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基础设施的管理可能会变得更加严格。即使在比特和字节的世界里，物质仍然很重要——对物质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是如此。像埃斯特·戴森和阿尔文·托夫勒这样的未来学家断言，

> 20世纪的中心事件是物质的颠覆。在技术、经济和国家政治中，财富——以物质资源的形式——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思想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压倒了物质的蛮力

—

这是一种数字意识形态，它掩盖了支持生产和分配“精神力量”果实的物质基础设施。

那么，批判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就会凸显出新的生产资源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非常真实的方式，允许他们从许多人的活动中占有和获利，而这些人必须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以确保获得数字时代的生产和信息资源。

我怀疑赫斯蒙达尔的症结将是赖特公式的第一个要素:特别是对多数人的“物质剥夺”。我们当然有可能认为，将个人数据的获取与血汗工厂劳动等其他更严重的身体剥削形式混为一谈，可能会使前者耸人听闻，而使后者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也有可能争辩说，尽管在贫困方面的影响大不相同，但存在结构上的、分析上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以值得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关注和干预的方式跨越和联系了资产阶级关系。互联网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是一种物质剥夺和封闭的形式，因为它将用户与支持其交流活动的基础设施分离开来。它强化和复制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小群人控制着许多人使用的生产资源，并允许经济优势从这种控制中积累。如果没有获取和控制生产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包括Facebook、bb0、雅虎等创始人在内的所有权阶层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所占有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捕捉那些访问他们资源的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的能力，而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与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直接相关。说白了，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利用这种活动的商业目的的能力

few would disappear if these resources were commonly owned and controlled.

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是，上网交谈、购物、探索和交流显然不是一种雇佣劳动，即使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补偿，免费获得有用的资源，以换取服从详细形式的价值生成监控。这种活动不是一种工作(至少对大多数上网的人来说不是):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活动交给主管的直接指挥，他们也没有得到工资。剥削显然可以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发生，但在用户不牺牲对其生产活动的控制权的情况下，剥削是否保留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数字环境促进了所谓的创造性或生产性活动的加倍。当我们创建一个博客或在Facebook上发布一个项目，甚至是购买一个项目或浏览一个网页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不受监督和最低限度控制的方式进行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产生了关于我们的活动的信息，我们牺牲了对这些信息的控制，以换取对基础设施和它所支持的服务的访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失去了对我们在线生产力的某些方面的控制，即使这仍然摆脱了我们熟悉的监督和控制形式。

正如我们在进入工作空间时牺牲了对生产活动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一样，当我们同意特定网站或在线服务的服务条款时(甚至当我们浏览互联网时)，我们也牺牲了对如何使用我们的活动的一定程度的控制。它们会在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收集我们的活动信息)。那些控制网络社交手段的人有权设定访问条款，这些条款包括对用户提供的信息建立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往往以粗略的、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有限度的方式概述。分离(对网络社交资源的私人控制)导致分离(对用户产生的信息的使用权的建立)。社交网站发布的各种“使用条款”和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确立了他们对在线收集的信息的使用、销售和转让的权利。

也就是说，曾经依赖于其他资源的社交、互动和交易形式，以及新的社交形式，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说，引入第三方是完全新奇的事情。当然，以电话公司为例，它充当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中介(尽管不是靠广告支持的中介)。相反，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识别出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使用商业支持的中介基础设施:例如，在线购买取代了在商店的现金购买;倾向于在隔壁宿舍或办公室给朋友或同事发短信，而不是敲他或她的门;以及新的社交形式的创造

与开发商业基础设施(如在Facebook上“加好友”某人)紧密相连，等等。当我们与社交手段分离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使用它们;相反，我们开始依赖于他们提供的社会化技术，这些技术将我们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所依赖的信息分离开来。互动的关键资源不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是存储在由商业实体拥有和控制的服务器中。

我们不必走得太远就能弄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愿意使用这样的网站:它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方便的、娱乐的方式来丰富、扩展和保持我们与他人的联系。需要更多解释的是，我们如何在一项自愿的、有益的活动中发现剥削的痕迹。Facebook促成的分离形式的结果不是对用户的剥夺，而是他们在线社交活动的产品的可让与性:这种活动的成果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其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或者，考虑到对收集到的用户信息价值的提取依赖于同样的资源圈地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构成了“自由地”同意交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那么更突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

剥削的概念是为了唤起社会正义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角度来看，对剥削的指控既是一个批判的术语，也是一个行动的呼吁:正如霍尔姆斯特罗姆所说，剥削是“邪恶的”，因为它“以多种方式涉及武力和统治，因为它剥夺了工人本应属于他们的控制权。”[19]这种力量并不经常直接表现在强迫放弃对劳动力的控制上，而是被建立在不对称的社会关系中，当这些关系受到挑战时，它就会公开表现出来。同样，许多数字媒体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也不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而只是通过将现有的属性关系扩展到数字领域来复制它们。强制的背景被内置于使私有化进程成为可能的法律结构和监管制度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强制的间接影响，假设如果有选择，用户更有可能不愿意为了访问在线和网络资源而接受全面形式的监控，正如最近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调查表明反对基于监控的分析和

对网上信息收集的高度关注他们并不是为了方便而自由地选择交换个人信息，而是在网络资源私有制和随之而来的对实际跟踪行为的低水平认识所构成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对工作场所剥削的担忧既在于支持这种剥削的强迫形式，也在于它给工人带来的身体贫困(疲惫甚至更糟)和对创造性活动失去控制(霍尔姆斯特罗姆称之为异化)的代价，那么就做这些吧

这些担忧会延续到对剥削自由劳动力的批评中吗?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区别——免费劳动并不像某些形式的工作场所剥削那样带来同样的身体损失，尤其是因为用户可以在他们希望的时候停止，而不会有失去工作的威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然而，他们确实失去了对生产活动各个方面的控制，用异化批判所提出的术语来说，这种控制是反过来对他们的。全面监控的目标是发现那些允许营销人员根据商业需求引导消费者行为的杠杆——在加速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中，将消费者降级为反馈机制的角色。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对基于反馈的营销的力量用一种苦涩的赞歌所说:

> 宗教、色情和伪科学的某种精确混合将会卖出一份插图报纸……为了确定这些，我们有我们的粉丝评分、草编投票、意见抽样和其他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心理调查机制....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些谎言的商人，这些易受骗的剥削者还没有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以至于一切都按他们的方式进行

—

当然，市场营销者和其他易受骗者的目标是意识到维纳提法中隐含的威胁:克服“*尚未*”。

更具体地说，正如伊恩·艾尔斯(Ian Ayres)在他关于数据挖掘的书中所说的那样，营销人员的目标是“预测你想要什么，你会做什么”——即使你自己不知道或不确定这并不是指预测某种不可避免的未来;而是学习如何操纵条件、诉求和情境，以产生期望的行为或行动。它意味着利用收集到的关于人们的详细信息来加速和引导消费过程。只有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更丰富、更迅速地消费。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哪些触发因素能最有效地刺激消费者行为，以及如何克服可能阻碍消费的保留和担忧。这是为了发现什么样的吸引力——无论是对一个人的不安全感、焦虑还是对健康的担忧——在驱动行为方面最有效，以及什么样的潜意识因素可能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影响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参与了产生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被输入到操纵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对剥削的指控进行调整，以突出个人信息的获取使我们自己的活动与我们自己对立的方式。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异化或异化:

> 工人在其产品中的*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一种客体，一种*外在*的存在，而且

它独立地存在于*他之外*，对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它本身就成为一种力量，与他对抗。这意味着，他赋予对象的生命作为一种敌对的、异己的东西与他相对立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背景下的雇佣劳动产品，但它是一个公式，阐明了由消费者产生的信息商品的轨迹，然后为了操纵他们的行为和欲望而转向他们。

互动营销者所设想的异化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所有的行动(以及它们被聚合和分类的方式)都被系统地反转到我们身上。最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愿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赖以活动的氛围已经变得私有化和商业化。我们写的每一条信息，发布的每一个视频，购买或观看的每一件物品，我们的时空路径和社会互动模式，都成为算法中的数据点，用于排序、预测和管理我们的行为。其中一些数据点是自发的，是消费者意向性的行为的结果;另一些是诱导的，是正在进行的随机实验的结果。算法的复杂性和相关性的不透明性使得那些无法访问数据库的人几乎不可能确定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因为特定的政治竞选信息而被拒绝贷款，或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广告饱和，而他们已经被揭露出最容易受到营销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能力能否转化为管理行为的能力，但这是营销人员正在下的赌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社会在转向基于监测的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系统作为支持其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手段时所做的赌注。

在某种程度上，剥削是否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问题取决于是否试图将休闲、消费和家庭生活领域与工作场所分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现在一个明显的现代分化领域的背景下。雇佣劳动的发展依赖于在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保持明确的区分——尤其是出于监视和监控的目的。交互式数字技术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去分化，挑战了这种明确的区分:我们可以在家工作，在工作场所社交，这要归功于移动电话、短信、便携式电脑等等。与此同时，与所谓的非物质劳动的发展相关的文化和经济转变利用了对活动的捕捉，这些活动模糊了休闲、劳动和家庭生活领域的明确区分。正如特拉诺瓦引用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所说的那样:“‘社会工厂’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作过程已经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启动了一个真正的

复杂的机器。当我们在家、在火车上或在海滩上工作，帮助建立Facebook的价值时，我们就参与了这个社会工厂。

与此同时，在许多专业环境中，在线创意与工作场所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学者、政治家和电视制作人都被鼓励写博客、发推特和在线网络来宣传自己和他们的工作。一位研究公共广播的研究人员最近告诉我，从前，电视制作人把他们的工作放在“罐头”里，然后在播出时可以去其他地方，现在他们被期望在线，关注在线讨论，并在节目播出时发布推文回应观众的评论。

在某些情况下，网络直播的义务正变得制度化，并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价值来源。例如，考虑一下应用程序的开发，这些应用程序允许雇主利用从员工的社交网络中收获的联系人。例如，一家名为Appirio的公司的新闻稿概述了员工社交网络数据作为招聘、销售和营销资源的三重价值——所有这些都无需为提供数据的员工支付额外的费用。Appirio的营销应用程序借助Facebook，通过利用员工可能已经拥有的关系，扩大公司“虚拟账户团队”的规模:

> 员工可以看到朋友是否成为了潜在客户，是否购买了产品，是否参加了活动等等。如果员工愿意，他们可以通过Facebook联系他们的朋友，建立联系，最终为公司的底线做出贡献(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奖金!

同样的数据可以为潜在的雇员和客户提供线索，通过为有针对性的营销诉求提供数据，可以起到三倍的作用:“基于对朋友资料中的关键字的搜索，该应用程序会推荐可能对该提议感兴趣的朋友，然后用户可以选择采取行动。[26]该应用程序将来自员工个人社交网络的数据与专有的消费者关系营销数据库链接起来，以便“跟踪线索，提供后续优惠，并报告活动成功情况，以了解他们的病毒式营销活动与其他营销计划的对比。”[27]

这些应用程序所设想的未来是，在线活动为雇主提供多种价值来源，雇主寻求通过员工下班后的活动创造价值并将其货币化，商业实体也可以在网上收集详细的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双重占有逻辑在起作用:工作场所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和通信资源的私人所有权都被用来从工作场所之外发生的活动中提取价值。的类型

雇主可以从雇员那里榨取的让步，是围绕生产资源不对称控制的工资劳动合同展开的持续斗争的一部分。Appirio设想了一个未来，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服从于工作场所的优先事项，成为谋生的条件之一。

如果像赫斯蒙达尔所说的那样，剥削的概念既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和分析性的概念，那么很容易注意到它有助于解释数字经济特征的预期生产力形式的方式。网络资源私有化所产生的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从用户那里提取生产数据的能力——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广告商、雇主、政治运动和警务的资源。与更多的物质商品不同，只要能够开发出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处理的自动化系统，数据的消费就没有明确定义的饱和点。个人对数据的吸收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数据库却没有。可以提取的信息量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它随着交互、交易和通信的机会而增长——即使数据收集的成本不断下降。至少在某些方面，数据收集和挖掘的预期生产力是拒绝对其进行更严格监管的理由。喜欢所谓自我监管的公司带来的威胁是，加强隐私立法将制约不断增长的在线经济。这一威胁是由一位隐私律师提出的，他声称要求网站包含“不跟踪”选项的提议“可能会导致互联网经济——为数不多的经济亮点之一——被束缚。”[28]

以隐私为基础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捕捉到基于监测的营销承诺中生产力和工作控制的要素。如果侵犯隐私构成了一种侵犯——对自我披露过程失去控制——那么市场监测就包括了控制和管理的另一个因素:系统地利用个人信息进行预测和影响。对剥削的批判针对的是权力和控制的这一要素。市场监督的捍卫者会辩称，个人消费者的行为仍然是不受强迫的。然而，批判的方法不仅将强制定位在离散的个人决策层面，而且还将强制定位在构建这些决策的社会关系层面。在这方面，对剥削概念的援引与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在他为本卷所作的贡献中所声称的相似，即“对劳动的兴趣应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平台的物流，并将其视为在劳资斗争中形成的技术，从而通过并为了对劳动的征用。”

考虑到后福特主义形式的生产消费与工业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剥削的批判方法。本章认为，考虑剥削的组成部分(对无偿剩余劳动力的攫取、强迫、

和异化)在技术促进的商业监视形式的背景下运作。虽然这些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异化意味着强制的背景形式的存在——但它们在消费者生产力或集体社会劳动的非物质形式的领域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些批评家关注的是无偿劳动的要素，另一些则关注异化的要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通信资源控制关系及其促进的生产性监督形式中嵌入的强制背景下，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思考。